

贝林格

(意) 托马索·吉利奥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贝 林 格

[意] 托马索·吉利奥 著
赵泮仲 王彦林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20910

新 华 出 版 社



1120910

目 录

贵族家庭	(1)
酒店的朋友	(7)
面包运动	(14)
与陶里亚蒂相识	(22)
妥协婚姻	(29)
海岛主人	(37)
“土耳其青年”	(44)
陶里亚蒂之不幸	(50)
陶里亚蒂之死	(55)
隆哥时期	(59)
选谁当总统?	(64)
由谁接班?	(71)
贝林格的晋升	(77)
入侵布拉格	(81)
莫斯科文件	(88)
开除宣言派	(95)

举棋不定·····	(100)
火的考验·····	(106)
受非难的“妥协”·····	(111)
阿涅利登场·····	(117)
权力之争·····	(122)
党内反对派·····	(126)
阿涅利的泡影·····	(132)
贝林格的“小神甫”·····	(137)
贝林格方案·····	(143)
欧洲共产主义的诞生·····	(149)
同莫斯科的对立·····	(155)
欧洲共产主义的黄昏·····	(160)
知识分子的离散·····	(166)
历史性妥协的尾声·····	(173)
严峻政策的神话·····	(180)
菲亚特的大门口·····	(188)
政治转折·····	(194)
危机的根源·····	(197)
新的社会力量·····	(201)
前途未卜·····	(208)

贵族家庭

1944年4月12日，恩里科·贝林格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上。那是一条微不足道的消息。《团结报》说，在萨萨里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镇压事件，警察逮捕了当地共青团书记、青年学生恩里科·贝林格。

这条消息在意大利其他地方没有引起多大的震动，但在撒丁岛却成为人们长期谈论的话题。年轻的恩里科属于撒丁岛最显赫的家族之一，他的被捕不能不引起轩然大波。贝林格的姓氏在撒丁历史上不是无足轻重的。

据历史文献记载：贝林格家族是十六世纪末由西班牙移居撒丁岛的，当时撒丁岛隶属阿拉贡王朝。起初，他们定居在阿尔盖罗，那里有个加泰隆移民区。后来迁居萨萨里，四百年以来从未离开那里。当时他们姓贝冷格。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这个姓氏在十七世纪变为贝伦格，到一百年后的十八世纪又成为贝林格。

在此期间，阿拉贡王朝的统治垮台了，撒丁岛落入萨沃依王朝之手。1773年，律师乔万尼·贝林格上书萨沃依国

王，要求封为贵族。律师贝林格要求晋封贵族头衔的主要依据是他第一个在萨萨里引进风车榨取橄榄油。这样以来，贝林格家族中第一个成为贵族——侯爵的就是这位乔万尼律师。乔万尼这个名字在贝林格家族中长期使用。事实上，现任共产党书记的弟弟就叫乔万尼，他也是意大利共产党员。当然，乔万尼·贝林格要想成为向萨萨里引进并非一架，而是多架风车的功臣，他必须有许多土地。事实上他是撒丁岛最大的地主之一。

十九世纪初，贝林格家族同当地另一个大家族——塞尼家族联姻。后来成为意大利共和国总统的安东尼奥·塞尼就是这个家族的后代。恩里科的曾祖父杰罗拉莫·贝林格娶女诗人乔万尼娜·塞尼为妻，她的诗集至今保存在萨萨里大学里。杰罗拉莫是宪兵军官，他的最大功劳是逮捕了凶残的土匪头子卡努，並为此荣获金质奖章。

萨萨里宪兵军营迄今仍以杰罗拉莫·贝林格命名。可以想象，这位著名宪兵军官的重孙被捕的消息会引起什么样的震动，而且这位青年学生的名字在意大利贵族名册上叫“唐·恩里科”。长期以来，贝林格家族的人一直是严格的保守派；他们忠于自己的统治者，无论统治者属于阿拉贡家族还是属于萨沃依家族；他们同撒丁岛最有影响的家族结亲，通过联姻不断扩大自己的土地和财产；他们的典型职业是作有威望的律师或投身戎伍。

打破全家严格遵循的保守模式的人是恩里科·贝林格，但不是我们今天认识的恩里科，而是他的祖父。恩里科如同

所有出身名门的撒丁人一样，被送往首都都灵求学。他在都灵认识了朱塞佩·马志尼，并成为他的朋友。他还认识了加里波第，也成为加里波第的朋友。他不喜欢加富尔建立的温和的君主制意大利。他反叛了家族的一切传统，成为共和派。在当时，共和派同颠覆分子是同义词。他回到撒丁岛之后，宣传引起轰动的思想，使该岛的政治生活陷入混乱。他还创办了报纸《新撒丁报》，吸引了一批思想最激进的人。是他首先提出民族复兴运动被出卖了的看法的，这是贝林格全家人经常讨论的政治话题之一。大概祖父恩里科不仅仅是马志尼的追随者，因为孙子恩里科在他的书房里还找到了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书籍和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这些书籍是他的主要的启蒙读物。毫无疑问，早在1902年，这个恩里科·贝林格就受到极大的怀疑，因为中央政府曾要求萨萨里省督监视他，并提供有关他的情报。但是，省督是他家的朋友，他回答说：“他性格温和，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才思敏捷，具有高深的文化修养；他是位优秀的劳动者，公认的优秀律师，他以职业收入使自己和家庭过着体面的生活。”

祖父恩里科把自己创办的报纸《新撒丁报》传给儿子马里奥，因为马里奥的政治思想和气质最接近他。马里奥就是意大利共产党现任书记的父亲。他的思想先进，是个坚定的世俗派，撒丁公众舆论中的保守派根本不喜欢他所表达的意见。他作为“立宪集团”的代表当选为众议员。当恩里科·贝林格抛出历史性妥协的建议时，如果他能想起父亲的政治修养，那就太好了。如果他使用“立宪集团”的提法，党内许多

人就不会不服气，首先是路易吉·隆哥，他抱怨贝林格使用的提法是不幸的，在意识形态上是模棱两可的，如果用“历史性集团”，那就确切多了；如果使用“立宪集团”，那大概会更加确切。

当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时，撒丁岛的保守派便开始支持他。他们认为，解决政府无能、议会空谈和不断罢工造成的混乱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实行法西斯主义。不仅富人，甚至中产阶层也对那个答应干一件微不足道但却是具体的事情——使火车正点的墨索里尼抱有极大的好感。意大利资产阶级经历过艰难的恐惧时刻，特别是在占领工厂时期。现在，他们把正在捣毁工会办事处的法西斯行动队视为救星。

马里奥·贝林格采取了反法西斯主义的立场。儿子恩里科出生的1922年，是他非常艰难困苦的一年。起初，他受到一系列威胁。后来有一天晚上，一群法西斯分子闯入他的报社，洗劫一空：办公设备被砸毁，印刷机被毁坏。经济损失惨重。马里奥·贝林格不得不逃离报社，躲藏在家里。但在家里也得不到安宁。法西斯分子包围了他的住宅，在楼下对他和全家谩骂威胁了几小时。马泰奥蒂谋杀案发生时，马里奥·贝林格参加了议会反对派，他们退出议会，撤至亚文丁山^①。法西斯势力当时陷入严重危机，受到绝大多数公众舆论

^① 亚文丁山为罗马“七丘”之一。由自由党，人民党和社会党议员组成的反法西斯政府联盟，仿效古罗马平民抗议贵族撤至亚文丁山的行动，1924年7月撤至该山。（本书注均为译者所加）

的反对，墨索里尼处于垮台的边缘。但是，没有任何持久的政治力量能够利用国家的混乱来扭转政治局势。亚文丁集团也仅限于空谈，不能做出任何决定，因而给了墨索里尼喘息的机会，使他重新控制了局势。

贝林格的父亲前往波洛阿盖召开反对墨索里尼的政治会议。法西斯分子打断他的讲话，冲上前去毒打他，并企图用匕首杀害他。1月3日，墨索里尼发表了那篇臭名昭著的政变演说：取缔反对派，开始实行法西斯专制统治。

贝林格一家人的日子艰难起来。要么同当局同流合污，要么完全脱离公共活动，甚至脱离社交活动，此外别无出路。马里奥·贝林格当然不是那种同当局同流合污的人。反法西斯主义后来成为他与全家生活的准绳，甚至不惜做出任何牺牲。这样一来，他就成为一个可疑人物，以致于处事谨慎的人都尽量避免同他接近。经济上也遇到了重重困难。小小的恩里科就是在这种严峻的政治气氛中成长起来的：家庭内经常谈论的话题仍是民族复兴运动被出卖，这是祖父留下的思想遗产。现在又增加了父亲的话题——憎恨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

恩里科从幼年起就受到对其家庭政治敌视的气氛的熏染，这使他的性格变得内向。他很少讲话，一生保持这个特点。甚至今天党内的同志谈起他时还说“他不放弃任何保持沉默的机会”。母亲去世时他才七岁，丧母的痛苦大概使他变得更加多思、内向。在他看来，母亲去世也是不公道的，是世界上不应该发生的又一悲剧。他希望一切都变得更

加公正，更加合理。这就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合理的事情，难道就没有办法挽救吗？在他整个孩提时代，内心深处一直孕育着一种反抗情绪。

1930年，当时贝林格才八岁，他的反抗情绪第一次公开表露出来。那一年全家去海滨小镇度假。那个地方很漂亮，可惜不太洁净。家里人满腹牢骚，说应该有所行动，不能生活在如此肮脏的地方，但是谁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恩里科思忖着家里人的话，很快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准备了一些抗议标语牌，把自己的小堂兄弟们集合到一起，带头在小镇街头游行，要求设立小镇清洁队。看来他是有当头头的天赋的。

酒店的朋友

当恩里科·贝林格到了上高中的年龄，他被送入阿祖尼学堂。这是他父亲学习过的学校，也是陶里亚蒂的母校。事实上，陶里亚蒂是他父亲的高中同学。但是，在学校里贝林格的成绩并不像陶里亚蒂那样优秀。他在文科高中的毕业成绩是：意大利语六分，拉丁语六分，古希腊语六分，历史八分，哲学八分，科学六分，数学六分，艺术史七分，宗教及格，体育七分，军事六分，品行八分。但是，陶里亚蒂在文科高中的毕业成绩比这要好得多，他获得荣誉毕业文凭，这就是说，有一半以上功课的成绩超过八分。而贝林格只有两门功课——历史和哲学——获得八分。多年以后，当奥里亚娜·法拉奇^①问他如果他不是投身政治的话，他这一生乐于成为什么人。贝林格毫不迟疑地回答：哲学家。

萨尔瓦托雷·阿泽纳是贝林格的同班同学。他这样回忆说：“我们一起去上学，夏天一起去海边度假。但是，不管在学校还是假期，恩里科总喜欢尽量自己处理自己的事。他

^① 意著名女记者。

那时很腼腆，内向，不活跃。可以说，他在同龄人中没有朋友，甚至在同班同学中也没有朋友。他的生活是孤僻的，远离我们。他读书很多，但成绩并不特别优秀。”

他对学校的功课并不卖劲，能够升级就行了。他更喜欢在祖父和父亲的书籍堆里度过时光，因此他在学校并不突出，再加上他腼腆拘谨，当然不能说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青年。他同别人的交往主要在体育活动上。他非常喜欢踢足球，而且还是个不错的前锋。当他夏天去斯廷蒂诺度假时，常组织体育比赛。他特别喜欢以这种方式同别人接触，但应由他组织和领导。每逢这时他的羞愧和腼腆就跑得无影无踪。他的这位老同学说：“恩里科一直热衷于组织和领导体育比赛。假期中，他总是称之为斯廷蒂诺奥运会比赛的发起人。所谓的体育场是海边的一块宽阔地带，冬天被海水淹没，夏天露出水面，在阳光照射下地面变得干硬，象石头一样。除游泳外，在这里举行正式奥运会的所有其他项目的比赛，因为恩里科不大喜欢游泳运动。附带说明一下：贝林格对组织体育比赛的爱好一直延续至今。我的意思是，他今天已成为意共书记，^①但仍保持了这种爱好。例如：有年夏天，他兴致勃勃地组织了一场斯廷蒂诺队对世界队的足球比赛，即常来这里度假的意大利人同外国客人之间的比赛。”

斯廷蒂诺是个小渔村，距萨萨里五十多公里。过去和现在都是萨萨里的各名门望族度假的地方。他们住在渔民的家

^① 应为总书记。原文均为书记，是意大利的习惯称法。以下同。

里，乘自己的游艇去海上或附近的岛屿游泳，过着简朴而安静的生活。他们有一条良好的不成文法则：不追求衣着漂亮，不炫耀豪华。在斯廷蒂诺的历史上，安东尼奥·塞尼曾以二十年穿同一件衣服去度假而闻名。

贝林格一家经常租住一位渔民的房子，它有一个面向街道的绿色凉台。老同学萨尔瓦托雷·阿泽纳回忆说：“我经常看到恩里科手捧书本坐在那里，坐在那个绿色凉台上。他好似悬在大街的上空，全神贯注地读书。他受到各种嘈杂声，甚至是有组织的嘈杂声的干扰，例如节日的吵闹或家庭聚会的喧哗。贝林格的舅舅们也住在这位渔民家里，其中一位吉他弹得很动听。他周围经常聚集着许多人，许多朋友。他们想听他弹吉他，并同他一起唱歌。总之，那里吵闹声不断，但恩里科几乎从未下来同他们一起喧闹，相反吵闹声经常使他感到厌烦，因为影响他专心致志地看书。”

他升入大学法律系，从未有人怀疑他会选择别的科目。当律师已是家中几代人的传统职业。在撒丁岛，贝林格家族向来是法庭正确法则的代表。恩里科·贝林格升入法律系，如同履行家庭义务一样，况且他并不是不喜欢成为律师。小时候，他不知有多少次逃学，去法庭聆听他父亲的辩护演说。他知道，他将来要取代父亲的位置。他非常尊敬父亲，甚至崇拜父亲。但他从来没有取得法律系毕业文凭，因为战前和战后的政治活动使他无法正常地参加考试。然而，他却为取得文凭尽了最大的努力，多年来他时常参加考试，结果只剩下三门功课未考和撰写毕业论文了。但他不得不服输。

最后一次考试是1967年通过的，那时他已四十五岁。后来他当选为党的副书记，从此他再也没有时间考虑文凭的事了。

安东尼奥·塞尼曾是他的大学老师。梅利斯·巴苏是他的大学同学。他说：“1942——1943年冬天，恩里科·贝林格同我一起听安东尼奥·塞尼的商业法。塞尼当时主讲民事诉讼法，但也讲商业法，因为当时教员很少。除恩里科之外，我们大家都参加了法西斯大学生青年团。这可能是我们没有同他完全打成一片的原因之一。”

贝林格觉得与其同其他同学来往，还不如同弟弟乔万尼一起去罗马街的酒店消磨夜晚的时光。那是一家大众酒店，如同意大利所有大众酒店一样，在那里可以打台球、玩扑克和地滚球。恩里科·贝林格喜欢打台球，但更乐于参加那里人们的议论。酒店的墙上还贴着战时那个赫赫有名的告示：“莫谈政治或高级战略”。但是，前线的形势每况愈下，现在不仅意大利人惨遭打击，德国人也开始遭受打击。人们不再象从前那样担惊受怕，谈话更加随便了，存在着普遍强烈的不满情绪。另外，光顾酒店的人大多数是过去的移民。很久以前，即法西斯上台以前，他们就远离家乡去过都灵和米兰找工作，甚至到国外——比利时和瑞士找工作。他们过去都是矿工、工人或泥瓦匠。有的人还记得在都灵曾见过葛兰西，经历过当时的斗争和罢工，记得波尔迪加同屠拉梯的斗争。许多人记得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波尔迪加，把他说成是位伟大的领袖。他们当中也有的人过去曾是共产党人，现在仍直言不讳，甚至感到比过去更加坚信自己的信仰。反正现在已

经十分明显，法西斯政权即将垮台。恩里科·贝林格着迷地聆听他们的回忆，这是对一个在他看来是神秘的时代的回忆。

皮埃罗·萨纳是酒店的顾客之一。他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他说：“我们当时称贝林格兄弟为皮林吉埃里兄弟。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他们的姓氏太难读了，所以就给他们起了这个绰号。好吧，贝林格兄弟经常到罗马街的酒店来。兄弟二人性格差别很大。乔万尼性格开朗，为人随和，爱玩地滚球和 三色台球，有时也打牌。恩里科·贝林格也打台球。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更喜欢同我们交谈。说什么？当然是谈政治，谈共产主义。在讨论问题时，他总是严肃的，冷静的，与同庚人相比显得过于成熟。我是在都灵加入的共产党，那时葛兰西也在都灵。我曾旅居大陆^①，因为在萨萨里难以找到工作。有一天，我被当做反法西斯分子逮捕了，被投入监狱。释放后我被迫回到萨萨里的家里。从此，我常去老朋友聚会的罗马街酒店。后来，贝林格兄弟也来了，我们成了朋友。恩里科常带我们去他家听伦敦电台的广播。就这样，我们可以把伦敦电台的广播同法西斯报纸刊载的消息加以比较。”

常去酒店的另一个老共产党员布鲁诺·穆拉对当时的情况也记得十分清楚，因为正是他后来介绍恩里科·贝林格加入了共产党。

布鲁诺·穆拉回忆说：“恩里科性格孤僻。但是，他自我

^① 撒丁人称亚平宁半岛为大陆。

孤立的原因之一是，他的所有同庚人都加入了法西斯组织，有的人是自愿参加的，有的人则由于形势所迫。他不愿意同他们来往，而宁愿同年长人在一起，他了解他们的政治思想，或者自己关起门来读书。”

就是这位布鲁诺·穆拉决定让贝林格参加在市郊一个农场里召开的更为重要的会议。萨萨里的共产党人在那里聚会，讨论如何组织起来，建立本地区的党组织。贝林格的大学同学梅利斯·巴苏律师说：“我知道，1943年初在萨萨里曾试图建立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我曾有幸看到参加者的名单。但我不得不说，在那个名单上并没有恩里科·贝林格的名字。”

“是的，”布鲁诺·穆拉说，“贝林格当时还没有入党，但我们已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同志，因为他多次同我一起参加过在市郊农场召开的会议。”他又说：“法西斯政权垮台后，我们召开了第一次真正的建党会议。会议是在一个家畜棚里举行的，因为萨萨里还被德国人占领着。恩里科·贝林格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但是，他对那次会议感到疑惑不解，他认为我们过于温和，要求马上行动起来。后来他还参加了第二次会议，他对这次会议仍然疑虑重重。看来他非常犹豫。但几天后，他来找我们加入了党组织。”

贝林格负责组织青年人的集会和讨论会。他还主讲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最后一次课是这样结束的：“贫困和失业日益严重，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濒临崩溃，马克思主义关于通过所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彻底解放劳工的理

论正在迅速地和胜利地传播，所有这一切在战后不久就导致了体现整个劳动阶级的愿望和要求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加强。但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已经预感到全体劳动者的愿望和团结将给他们的利益带来的危险，他们把国家政权毫不犹豫地交给了资产者和剥削者的政党，交给了反民主、反社会主义和反共的政党，也就是说交给了法西斯党。这个党反对劳工权利，维护压迫阶级的特权。但是，由于全世界道德和物质力量的觉醒，法西斯主义在国内外已是日薄西山。今天我们应当感到有权利和义务团结起来，防止在战后出现任何形式的新的政治和社会压迫，也就是说防止意大利再次落入一小撮企图阻止无产阶级前进步伐的大资本家和暴君之手。打倒法西斯主义！打倒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压迫！”

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恩里科·贝林格的风格：教授式的口气，书面语言，过于复杂的句子。至今他仍然保持着这种风格。正如詹尼·里韦拉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的内向性格也反映在他的文风上，他从不开门见山，直来直去，文章总要发挥一下。

面包运动

7月25日^①，法西斯政权倒台。但是，巴多利奥^②宣布，战争仍在继续，尚不允许各政党重建组织。直到9月8日德国人撤离撒丁岛，盟军在岛山登陆后，各政党才可以恢复组织活动，共产党人也开始合法地组织起来。曾经参加过酒店里的讨论的老同志重新登上舞台，但他们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二十年代，那时党的领导人是波尔迪加，口号是“像俄国一样行事”。葛兰西的名字只有少数人才知道，而且主要是因为他是撒丁人。陶里亚蒂甚至被认为是个可敬的陌生人。共产党重新组织起来，但没有一个真正的领导人，没有一条政治路线。撒丁岛尤其是如此。当时在撒丁岛掌握党内实权的是安东尼奥·卡西塔，他是位旧式领导人，卓越的演说家、波尔迪加的忠实追随者。在他的讲话中不乏“革命”和“苏维埃共和国”之类的词藻。各色各样的人物：极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等都纷纷进入这样一个党内。

^① 1943年7月25日。

^② 法西斯政权倒台后的第一届内阁总理。

盟军进入撒丁岛才几个星期，岛上的形势就令人失望：所有东西都严重匮乏，首先是缺面包。煤也缺，而当时正值严冬。等待革命到来的党内老同志同平民居住区的群众接触最多，他们认为群众的失望情绪已经达到顶点，第一次公开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必须组织一次抗议示威，如果不采取行动，什么时候也不会有面包。有人说，储存的煤堆积如山，当局却不愿意分发给群众。群众的情绪被鼓动起来。然而，共产党还不宜在这样的游行中抛头露面，因为那样做可能被认为是盟军的公开挑战，不应忘记，战争还在继续。意大利战败了，是个被占领国。

怎么办呢？当时省委内许多同志不知所措。一些老同志、忠实的波尔迪加分子和近于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想绕过困难，让青年人按自己的想法行动，这样就不会把党卷进去。当然，青年人在老同志的鼓动下是不会后退的。就这样，贝林格作为青年人的负责人被卷入了他力不能及的政治行动。他清楚地知道，省委内许多同志对这个行动疑虑重重。但他也知道，很难顶住那些老同志的压力，因为正是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使他入了党。总之，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他，他不愿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畏缩不前。另外，游行示威已经准备就绪，老同志无论如何是不会偃旗息鼓的，问题仅仅在于青年人是参加，还是在旁边观望。

1月12日晚上，恩里科·贝林格召集青年人开会。游行已定于第二天举行。平民居住区的妇女们，特别是制革工人居住区的妇女们，将走上街头抗议食品匮乏。青年人必须决

定怎么办，以什么方式进行合作才能使抗议示威取得成功。

讨论会逐渐活跃起来。有人站起来说，对游行示威仅仅表示支持是不够的，必须采取更多的行动。还有人说，不应局限于普通的游行示威，而应当使游行成为一次暴动，现有的武器和人员已经足够了。恩里科·贝林格在会议结束时说，是的，“我们要夺取政权，取消剥削制度，实现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但是他不同意那些甚至提出要使用武力的同志的意见。当然，支持和参加游行是对的。在会议参加者中混有警察局的密探，他叫斯帕努，巧妙地做了记录。

第二天上午，游行开始了。真正的组织者非常精明，他们让妇女们在青年共产党人办事处门前集合，从那里开始游行。妇女们挥动着红旗，高唱《国际歌》，打碎商店的玻璃窗，抢劫商店和仓库。身着裘服的贵妇人遭到劫掠和殴打。警察开始干涉，并使用了警棍。贝林格率领的青年人以石子进行还击，这样就酿成一场战斗。

第二天，男人们走上街头。他们再一次举起红旗，冲入商店，劫掠一空，并同警察发生了更加猛烈的冲突。各方受伤者不计其数。贝林格率领的青年人一开始就没有掌握住形势，这时完全失去了对形势的控制。警察局开始大批逮捕，从而结束了萨萨里著名的面包运动。贝林格父亲参加的反法西斯委员会宣布同这些事件毫无关系，并发表了谴责所谓面包运动的公报。公报最后说：“混乱和动荡只能恶化经济形势，同反法西斯主义的各民主党派的主张和目标毫无共同之处。各民主党派公开谴责这次动乱，因为它是由不负责任的

分子掀起的，有时也受到法西斯分子的煽动。他们散布虚假的消息，说仓库里有粮食储备，实际上并不存在。”萨萨里的报纸《岛屿报》严厉谴责那些“天真和想入非非的人，他们为那些有害而应受到诅咒的行动所左右”。

贝林格的父亲同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起去找盟军司令部，说现在形势已经恢复平静，要求他们宽恕、释放所有被捕的人。盟军答应进行干预，将向意大利警方要求释放所有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恩里科·贝林格在街上等待父亲回来以了解谈判的结果。当父亲告诉他将释放被捕的人时，他如释重负。

然而，警察第二天来到贝林格家里逮捕了年轻的恩里科。作家阿尔贝托·翁加罗对萨萨里事件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他这样评论这个事件：“恩里科·贝林格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不同：他们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坐过牢，而贝林格是在意大利解放后进监狱的。”贝林格被关押了一百天，正如拿破仑被囚禁在厄尔巴岛上一样。

萨萨里警察局长不仅反对反法西斯委员会提出的释放被捕者的要求，而且还向盟军司令部写了一个报告，说“那不是一次游行示威，而是一场货真价实的游击战”。报告说，在这场动乱中有三十名警察、一名军官和一名警官受伤。警察局调查证实，暴动者企图把省督从凉台上扔出来杀害他，企图宣布萨萨里为苏维埃共和国，他们为此还鼓动农民进城支持暴动者。

由于暴动的真正负责人是在幕后活动的，他们把青年人

推到第一线，所以警察局给法院的报告认为恩里科·贝林格是“主要的煽动者，最重要的负责人”。警察的报告是这样写的：“贝林格不仅组织了游行示威，而且还在事前下达了进行破坏活动、搜集武器、袭击警察局、侵犯私人住宅的密令。”报告还说：“贝林格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列宁主义的理论专家，法西斯政权倒台后，他是萨萨里共产党的发起人和创建者之一。他被任命为青年书记之后，担负起向群众讲解新理想的任务，定期给部分信徒上共产主义理论课，解释他们的目标和宗旨，组织支部活动等。在思想上他是个狂热分子，认为实现党的最先进的思想的时刻已经到来，尽管党内老同志多次劝他不要那样做。”

贝林格被捕入狱的罪状并不轻：武装起义反对国家政权、破坏和抢劫、结社和进行颠覆宣传、宣扬政治失败主义、私藏武器。在战争时期，这些罪状可能导致死刑。

贝林格的父亲为此担心是有充分理由的。幸亏他是律师，知道从什么地方入手。他发现，对儿子的指控并没有他参与这些活动的直接证据。进行调查的法官手中只有警察局的报告，指控恩里科·贝林格为暴动煽动者仅仅依据一个叫斯帕努的人的情报。此人是混入青年共党人中的密探。从法律上来说，这不足以成为证据。

马里奥·贝林格忧心忡忡，四处奔波。他急忙赶到萨勒诺，盟军总督府和巴多利奥政府设在那里。他解释说，警察用警棍疯狂地殴打游行妇女，激起了民愤。群众的反抗是由警察挑起的。被捕的青年什么也没有干，暴动也不是他们组

织的。他们之所以被捕是因为警察局的一个情报员揭发了他们。这个人仅仅听到一些只言片语，而他本人根本不是事件的参与者。总之，他是个难以让人信任的人。

盟军答应组织调查委员会。马里奥·贝林格促使许多显要人物进行干预，报纸开始以不同的口气评论这些被捕的青年，它们怀疑恩里科·贝林格及其青年朋友同骚乱毫无关系，相反，他们是警察暴力手段的受害者。要求释放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强烈。现在，警察局正在成为众矢之的。

恩里科·贝林格在被捕期间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正如警察局长在报告中所说：“贝林格遵循共产党人的传统做法，守口如瓶。”现在他开始回答问题了。他否认自己组织安排过游行，也否认自己参加过游行。他声明说：“我当时反对游行，这也是因为我收到了党的指示。”另外，他还给预审法官写信说：“为澄清一些情况，我不得不打扰阁下，请原谅。这些情况，在本月3日审讯我时，由于接连不断地提出许多意外的问题，我没有很好地回忆起来。至于我的被捕，我申明：17日约10点钟，警官科隆纳来到我家逮捕了我。我在禁闭室被关了14小时后，突然被叫醒，受到审问。他企图诱导我认罪。后来我被送进监狱，护送我的两个狱警让写上我是17日被捕的。因此，请您让登记处提供证据。我认为，谈论14、15、16三天曾经见到过我的人是毫无用处的。此外，在知道我是反对组织游行的人中，我还可以举出萨塔·朱塞佩做证人，他住在奥雷利奥·萨菲街1号。我同萨塔、里吉、特罗法一起在俱乐部待到13日的18点，18点30分我到了位于特

拉内斯塔街的女教师阿尼塔·乌萨伊的家里，她也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会计师皮亚努，他是皇家大学意共党组织的书记。最后，我还记得我看到过在班卡利区散发的一张传单。从传单的内容和形式来看，我肯定它出自迫害我们的人之手。顺致敬意。恩里科·贝林格。”

尼诺·曼卡是参加游行的青年人之一。他也被捕了，对那些日子记忆犹新。他回忆说：“在准备阶段，我们青年人与其说是接受了党的指示，还不如说是以个人的名义参加的。我不否认，其中有挑衅的成分，挑衅还来自某些老共产党员，他们不信任我们，让我们铤而走险。我参加预备会议是自发的。我也参加了12日晚上研究第二天行动细节的会议，贝林格也在场。实际上，我们决定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跟踪即将发生的事件，因为我们不能置身于革命运动之外。然而第二天是我们领导了这场斗争。贝林格也同我们在一起，尽管他没有站在第一线，我们离得很近，经常商量。”

让贝林格首次参加地下会议的老共产党员布鲁诺·穆拉也回忆说，省委没有正式参加那些事件。“我不认为那次运动是共产党组织的，我指的不是省委组织的。我是从别人嘴里听到游行的消息的，他们抱怨游行打碎了商店的玻璃窗。14日晚上，当警察闯入青年办事处抓人时，我得主持一次报告会。但是，我迟到了，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警察逮捕第一批人之后，呆在青年办事处里高唱《红旗歌》，企图以此吸引更多的人进来，再抓他们。我了解情况之后立即前往盟军司令部抗议，我再说一遍，因为这同共产党毫无

关系。”

一百天过去了。4月25日，即全国解放的那一天，解除了对贝林格及其朋友们的审问，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参加了游行，被立即释放。迄今仍有许多人确信，如果不是小侯爷恩里科，事情不会这样圆满结束。

与陶里亚蒂相识

恩里科·贝林格当时若是怀有非常激进的思想情绪，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正如警察局的报告所说：“他无情地献身于暴力、起义冒险和议会外活动。”当时党内大多数人都持这种立场。某些经验丰富和更为成熟的人公开说，战争结束后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仅在几年前，葛兰西本人在文托贝内监狱曾经指出，法西斯政权倒台后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要建立民主制宪会议。他为此在同志们中处境孤立，谁也不同他讲话，认为他已经脱党。谈到葛兰西的“背叛”，有位党员曾说：“他死了更好。”几年后，贝林格本人也承认，他那时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尔迪加主义的冲击。

随着陶里亚蒂的回国和“萨勒诺转折”^①的实现，使党脱离这种宗派主义立场的斗争开始了。左派幼稚病是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赖以生根的最初土壤。列宁在世时就不得不严

^① 指在陶里亚蒂的倡议下，各反法西斯政党同意参加设在萨勒诺的巴多利奥政府，即建立了民族团结政府，这对意大利政局来说是个转折

厉批判泰拉奇尼和其他意大利同志的宗派主义观点。甚至陶里亚蒂在重新建党时在党的领导集团中也有着深刻的分歧。陶里亚蒂在国外期间在国内担任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马乌罗·斯科奇马罗痛苦地感叹道：“这种政策，你们去执行吧！”

陶里亚蒂返回意大利时，贝林格正关在监狱里。那是1944年3月27日。各反法西斯政党拒绝参加巴多利奥政府，因为他们要求墨索里尼的帮凶——国王首先退位。正是陶里亚蒂打破了僵局。他建议国王不退位也要参加政府，把君主政体的问题推迟到战后解决。这个转折也决定了贝林格一家的命运，因为父亲马里奥应召去萨勒诺政府工作，当上了清洗专员。事实上，马里奥·贝林格在政府中有两个朋友：高中同学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和表兄斯泰法诺·西格利恩蒂。当恩里科·贝林格去萨勒诺看望父亲时，他要求父亲把他介绍给陶里亚蒂。会见是在内阁会客室里进行的，那是六月底的事情。

那仅仅是一次简短的引见。后来，恩里科·贝林格有机会在萨勒诺一家贝内德托·克罗切也经常光顾的饭店里第二次见到陶里亚蒂。这次同陶里亚蒂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后来贝林格回到撒丁岛继续自己的工作，一个村一个村地召开群众集会。

盟军进入罗马后，政府也迁到那里。马里奥·贝林格由于工作已调到首都罗马，便把家也迁到那里。在撒丁岛只留下恩里科。但父亲也想让儿子来罗马。他向陶里亚蒂谈及此事。不久，党的领导机构指示恩里科·贝林格来罗马工作，

月薪四百里拉。由于他在撒丁岛已经积累了青年工作经验，他仍然从事这方面工作。陶里亚蒂把恩里科·贝林格召到罗马并不是偶然的。自从他回到意大利时起，他就在执行一项特殊政策：把二十几岁的青年，刚加入共产党的大学生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因为他想把他们培养成新型的领导人，同时也是为了使他们成为与党内老同志相平衡的力量。这些老同志在法西斯年代大多数是在狱中或流放中度过的，二十年来一直脱离意大利现实。而这些青年人熟悉法西斯主义，甚至是在法西斯年代成长起来的。他们能帮助陶里亚蒂更好地理解他长期以来反复思考的现象。况且，建立群众性的党这个想法，也是他研究法西斯主义时产生的。为什么墨索里尼能在几年之内赢得如此广泛的几乎是全民的群众支持呢？他能够把广大群众，甚至工人阶级的大部分阶层引向法西斯主义的秘密在什么地方？答案只有一个：墨索里尼在过去任何政治运动都没有重视的社会力量中成功地找到了自己的群众基础，这就是中产阶级。法西斯主义出现以前，有群众基础的政治运动仅有两个：依靠工人的社会主义运动和依靠农民的天主教运动。中产阶级被认为是个变化无常，无法组织的世界，而且根据马克思的预见，必将最后消失。

陶里亚蒂的政治抱负是建立新党来贯彻他研究墨索里尼现象得出的结论。中产阶级不仅是可组织的，而且在确立国家政治平衡时他们还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党的口号不应当再是工农联盟，而应当把这个联盟扩大到中产阶级。老干部不理解这项政策，因而陶里亚蒂只好依靠经历过法西斯主

义的青年人。正是那些参加过法西斯大学生青年团的知识分子，主要是那不勒斯和罗马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了陶里亚蒂为党建立的新的“智囊团”。由此便产生了对参加过抵抗运动的人的不信任。隆哥后来说：“那时我同陶里亚蒂的关系相当冷淡。”由此也产生了对北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说他们离不开游击斗争和起义的主题。后来掀起的反对埃利奥·维托里尼的论战也起源于此。恩里科·贝林格到达罗马后便置身于陶里亚蒂组织的这伙青年人之中。他对宗派主义已有了体验，还亲自尝到过宗派主义的苦头。现在他有了更强的免疫力，今后就看陶里亚蒂如何培养他了。

后来成为电影导演的卡洛·利扎尼也是青年共产党人之一。他当时负责出版《新青年报》，在贝林格要去的那个党部工作。该党部设在维·埃马努埃莱街上。

利扎尼回忆说：“我随即有了这种印象，恩里科·贝林格好像是个非常能干的小伙子，但不够开朗，很难同他马上建立关系。这种印象很深，或许是因为同我一起在青年组织工作的其他同志和朋友都一起参加过抵抗运动，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因此很容易在我们之间建立起非常活跃而热烈的关系。同贝林格却不能很快建立某种关系，他独自一人，他的生活道路和个人经历与我们不同。然而那时我们相互间都有很强的好奇心。有些青年人来自南方，有些来自西西里岛，来自解放后的意大利的四面八方，有的甚至来自突尼斯。结识从如此遥远的地方来的人是件很快活的事。我们经常交谈。谈话和交换看法主要集中到我们认识前的经历。例如：我们

对撒丁岛感到新奇，它是葛兰西的故乡，在我们眼里具有迷人的魅力。我们渴望了解撒丁岛的各方面情况，渴望了解撒丁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是如何形成的。但恩里科·贝林格却不愿多谈，看来他对谈自己毫无兴趣。我不记得听他讲过他在撒丁岛坐牢的事，尽管有这种经历的人当时都被看成是功臣。我也不记得听他说过，正是他创造了他的故乡萨萨里的青年组织。”

贝林格很快便显露出他是个坐得住的人，有个“石头屁股”。他早晨八点钟来到办公室，紧张地工作到吃午饭，在党办的食堂随便吃点东西又立即投入了工作，一直到夜晚。卡洛·利扎尼观察他的工作情况，感到十分惊奇。他从未见过如此献身工作的人，于是他陷入了严重的思想斗争。

利扎尼回忆说：“在恩里科·贝林格进入党的领导机构之前，我曾认为我是适宜搞政治工作的，我所走的道路应当是通过光明正大的革命工作对意大利实行社会改革。我还脱离了电影界，尽管抵抗运动以前我做为评论家和脚本作者在电影界混得满不错。我离开电影界是因为我确信我应当从事另一种职业，从事一种比电影工作更严肃、更必要的职业。但是，当我看到恩里科·贝林格如何工作时，我立刻意识到我错了。我意识到，一个政治家的生活方式同我的生活方式迥然不同。贝林格是位真正的政治家，而我却不是。我当时想入非非，而他却脚踏实地，他头脑中只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所以，同他的会见对我认识自己不是一个政治家，也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政治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帮助我认

清了自己的气质，也帮助我返回了电影界。在此之前，我曾认为自己已同电影艺术永远分手了。我必须承认，重返电影界之初，我感到心情压抑，认为这是无可奈何，因为当时电影业还不像后来那样引人入胜。所以，重操电影业几乎使我产生一种个人沦落的感情。”

“我从未见过一个青年人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步骤像他那样坚定不移和充满耐心。他像许多老党员一样，不善于讲演，也不善于鼓动群众。然而，尽管他说话时语调缓慢，声音低沉，却十分清晰，有条不紊、心平气和，具有巨大的说服力。当需要说服某种观点，或解决某个问题时，他能无数次地召开会议，不厌其烦地阐述自己的看法，毫不退让地坚持自己的意见，直至把同志们逐步引到他认为正确的立场上。那时讨论的重大题目是反法西斯运动的团结问题，当时许多人要求立即——今天或是明天早晨就进行革命，因此需要阻止这些人进一步犯左倾幼稚病错误。我后来在电影中所描绘的“驼背人”要求把抵抗运动继续下去，以反对盟军和意大利新政府。在那个时期，这是代表一批人的思想。我们的任务，贝林格的任务，是抑制这种倾向，贯彻陶里亚蒂路线，贯彻著名的“萨勒诺转折”的精神。我认为，贝林格从那时起就把这条路线当做自己的路线，这不仅出于他对党的指示的服从，而且首先出于他个人的信念。总之我认为，贝林格具有（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陶里亚蒂的气质，他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同陶里亚蒂路线溶为一体。他当时就是一位领导人吗？可能是，已经是一位领导人。然而，即使当时不是，我感到他

身上具有在未来成为领导人的天赋，成为一位迄今我从未见到过的领导人的天赋。”

“我记得当时姑娘们都非常喜欢他，这或许是因为他身上有某种神秘之处，或许因为他的生活方式与众不同，还仪表堂堂。他的面孔讨人喜爱。他有时同我们当中的女同志在一起，去某个地方共进晚餐。我当时就明显地感到，他的这种生活方式使许多姑娘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然而我不能说，他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讲不出什么具体事情。这还因为战争结束后不久我就离开罗马去米兰了。同去的还有瓦斯科·普拉托利尼、阿方索·加托等一伙知识分子，有个出版商曾给这伙朋友提供了一个做新闻工作的机会。所以我有段时间没有见到他。”

不久，贝林格也奉命来到米兰组织青年阵线。

妥 协 婚 姻

贝林格在米兰结识的第一个朋友是未来的电影导演吉洛·蓬泰科尔沃。

他回忆说：“青年阵线的办公楼坐落在音乐学院街，楼内混乱不堪。我们这些党的青年委员会委员只分到几个房间，里面除了几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外，没有其他办公设备。在我们下边的另一个办公室里，游击队员常来常往，进进出出。贝林格、我和刚从茅特豪森回国的朱利亚诺·巴叶塔不是米兰人，我们白天在办公室里办公，晚上就睡在那里。除了几张行军床外，我们一无所有。冬天室内寒气逼人，我们不得不裹着大衣而睡。我还记得贝林格脖子上围着一条长围巾，蜷曲在行军床上，同我一样冻得浑身发抖。有时为了取暖，我们在办公室里小跑，或做做操。那是贝林格非常喜欢做的一种特别体操，它不仅能帮助我们取暖，而且首先是能使我们的身体得到锻炼。它就是穆勒式体操，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贝林格还有过一本教材。这种体操编排得很合理，即便在狭窄的地方也能做，并能使全身的肌肉都活动开。贝

林格建议大家来做，並讲解坚持做下去的好处。”

“至于他在青年阵线内的地位，不出三天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比我们大家都重要得多。他有能力开展具体工作，善于处理我们不能处理的情况。我们刚从地下转入合法生活，大家都感到茫无头绪。我们对地下工作已经相当熟悉，但对战后出现的问题却束手无策。当贝林格被派来加强我们的领导力量时，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大家觉得总算来了一个能力强的人，在新形势下他的本事可能比我们的有用得多。我们很快就得出结论，如果通过选举来决定谁当我们的领导人的话，他肯定被选上。”

蓬泰科尔沃继续说：“並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他。在米兰解放后的动荡气氛中，贝林格孤僻内向的性格难以使更多的人对他产生好感。另外，他同那些参加过游击斗争的人不同，他被看成是从罗马派来的机关干部。当然，陶里亚蒂和隆哥对他的评价很高。但一些中层干部对他的评价却有差距，甚至存在着对他估计不足的倾向。他的外貌並不特别出众，他不善于辞令，不夸耀自己的文化程度。事实上，他认为，文化程度只是基础，是工作的无形支柱，他在阐述问题时总是非常谨慎。当别人讲话故弄玄虚，夸夸其谈或沾沾自喜时，他的眼里就流露出讥讽的神情。”

“记得有一次，我从党办的食堂出来时同党的两位干部谈起贝林格。他们是非常著名的知识分子，被看成是意大利共产党的两大希望。我见他们谈话时骄矜自恃，便开玩笑式地说：‘请注意，十年后，当你们成为能干的议员时，贝林

格将是党的书记。’虽然这话多年后才成为现实，但我为自己的正确预见而感到欣慰。”

“另外，老同志嘲弄我们，说我们似乎比他们还显得老成。这或许是对的。解放后，我们曾一度狂喜过，但后来我们感到被困难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都显得衰老了，尤其是恩里科·贝林格，他显得比别人更加衰老。然而我深信至少有两次我看到了他的真实性格的流露，就象是从全身披挂的铁甲下而流露出来的一样，他並沒有醉，而是极其兴奋。一次是在非常辛苦的代表大会之后，我们把他拖到一家饭馆吃饭喝酒。当聚会进行到一定的时候，我们开始唱起歌来。（我希望讲述这件事不会使人不高兴。）贝林格也唱起撒丁民歌。他唱得很好，正如所有民歌一样，撒丁民歌也有点放荡，但从他嘴里唱出来却显得非常有节制。类似的情况还有一次。看到贝林格无拘无束、欣喜快活、兴致勃勃和心满意足地同朋友们在一起，真是件非常惬意的事。”

那些嘲弄青年干部的老同志也逐渐地接受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法。从罗马来的以贝林格为代表的那种类型的党的干部不久便在北方立住了脚跟。这种变化几乎是难以置信的。埃利奥·维托里尼甚至认为这简直是一种无法解释的现象。他说：“我不知道这些同志为什么会这样。在地下斗争时期，他们随时有落入法西斯分子之手的危险，但他们欣喜快活、有说有笑、生气勃勃。同他们交谈真是一种享受。现在恢复了合法地位，我发现他们却面色阴沉，表情严肃，爱讲套话。即使你讲句笑话，他们也难以笑起来，好象气氛

活跃一点会影响他们的工作。我真感到莫名其妙。”

吉洛·蓬泰科尔沃同贝林格一起工作了几个月，仅有两次看到他无拘无束的样子，这是意味深长的。对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来说，这并不算多。几个月后，当蓬泰科尔沃在罗马（当时贝林格已被党调回罗马工作）见到他时发现他有了新的爱好——骑摩托车。这在1946年还是一种惊人的奢华。多年以后，骑摩托车才成为青年人的一种不折不扣的狂热，贝林格的爱好比他们早了许多年。

吉洛·蓬泰科尔沃回忆说：“他买了一辆旧的‘戴维逊’牌摩托车，大约使用了一年，从办公室到家，从家到办公室总骑它。那时我们经常踢足球，贝林格当中锋。很难确切地说，他确实踢得很好，还是看起来踢得很好，因为当时其他青年人的水平都比较低。有一次，我同领导机构的其他几名成员，纳波利塔诺、贝尔尼尼和特里韦科等一起拖他去海边下水捕鱼，但收获甚微。”

贝林格在罗马认识了他表妹的一位女同学。她叫莱蒂齐娅，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后来成为贝林格的妻子，给他生了四个孩子。不过结婚前恩里科许下诺言：决不干涉儿女们的宗教教育。莱蒂齐娅认为信仰高于一切。贝林格爽快地同意在教堂里举行婚礼，同意儿女们根据母亲的宗教信仰接受教育。他在家庭问题上经历了后来在政治上抛出的那种妥协。当他对年轻的女共产党们发表讲话，号召她们不仅要以抵抗运动的女英雄伊尔玛·班迪耶拉为楷模，而且还要以被他称为“圣无产者”的玛利娅·戈雷蒂为楷模时，许多人不

无惊奇地互相看看，甚至有人说：“这个人怎么啦？难道他走错了庙门了吗！？”

在那时，陶里亚蒂正在不遗余力地同天主教界达成最大的谅解。贝林格从陶里亚蒂的行动中吸取教益，为自己未来的立场打下了基础。陶里亚蒂当时面临的问题也是贝林格后来面临的问题，尽管形式有所不同。首先是帕里政府事件。陶里亚蒂没有为挽救由这位游击战争的司令所领导的内阁的倒台做任何事情，而支持德·加斯佩里组成新政府。

这种政策在意共内遭到反对，基层和许多领导人都不理解，为什么陶里亚蒂宁愿让一位天民党人，而不是让一位世俗人、抵抗运动的英雄来领导政府。陶里亚蒂以同党外人士辩论的口气解释说：“有人告诉我，对德·加斯佩里政府存在着强烈的不安情绪，这种不安一方面来自共济会的余孽，一方面来自保守势力。真是奇妙的巧合！德·加斯佩里是一个有群众基础的党的首脑：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使我们认为，他比那些所谓的独立派政治家更受欢迎，因为他们只知道维护他们那一小撮人的利益和虚荣心。另外，毫无疑问，大选后我们将同社会党人一起领导最强大的选民队伍，那时同天民党达成政治协议将成为政府稳定的轴心。”贝林格多年后还记得这些教导，他那时同阿门多拉的辩论已经达到高潮。阿门多拉建议组成统一党，他估计左派世俗党的选票已经达到百分之四十八。当贝林格提出“历史性妥协”的路线时，他也记得陶里亚蒂的这些教导。他认为，即使左派取得百分之五十一的选票也不能单独掌权。

后来就离婚法举行公民投票时，贝林格仍试图遵照陶里亚蒂的教诲行事。陶里亚蒂接受宪法第七条就排除了在意大利引进离婚法的任何希望。当时党的正式立场是反对签署第七条，但陶里亚蒂同梵蒂冈的主要神职人员进行了一系列接触，并同德·加斯佩里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显然他得到了后来没有兑现的允诺。事实是陶里亚蒂在最后时刻决定彻底改变党的立场，投票赞成第七条。他后来说：“那是为了避免在意大利发生宗教战争。”投票后不久他向莱利奥·巴索^①透露说：“这一票确保我们在今后二十年里在政府中占有一个席位。”

陶里亚蒂认为自己是精明的，但德·加斯佩里比他更精明。仅在几个月后，德·加斯佩里就制造了政府危机，以把共产党人驱出政府。陶里亚蒂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没有动员全党，也就是说没有采取最使德·加斯佩里惊恐不安的行动来制止天民党的行动。直到最后时刻他仍然无动于衷，显然他是在等待德·加斯佩里和天民党人把他留在政府之内，正如在就宪法第七条讨价还价时他们向他保证的那样。他是如此坚信会让他参加新政府，以致于那几天他焦急地等待着德·加斯佩里的电话，正如未婚妻焦急地等待情人的电话一样。由于担心德·加斯佩里夜里打电话找不到他，甚至在党部设立了夜班。塞基亚的弟弟马泰奥奉命守在电话机旁彻夜不眠以等待天民党的呼唤，但德·加斯佩里的电话一直

^① 莱利奥·巴索原为社会党左翼领导人，脱离社会党后，曾任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主席。

未来。

当陶里亚蒂被排挤出政府时，他感到被出卖了，受到了屈辱。朱利奥·切雷蒂说：“我们被排挤出政府那一天，我去陶里亚蒂办公室看望他，我发现他对德·加斯佩里怒气冲冲，指责他是两面派。他原想依靠德·加斯佩里来取得天主教界人士同进步人士的历史性靠拢，但他打错了算盘。德·加斯佩里感到自己的政治地位巩固以后立即玩弄了他。在谈话中陶里亚蒂对前景的估计最使我感到吃惊。他对我说：‘从现在起至少在未来的二十年里，我们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参加政府。遗憾的是我们这里都是以二十年为周期。’”

陶里亚蒂估计错了。实际上比二十年还要多得多。党内指责他幼稚，助长了天民党的两面派手腕。三十年后，当贝林格重新踏上陶里亚蒂的道路——企图就离婚法问题同天民党人达成协议；为避免举行公民投票取得最大谅解；支持安德雷奥蒂一党政府以待时机成熟进入政府时，他也听到了同样的指责。这是一系列失败，同陶里亚蒂当时所遭受的一系列失败如出一辙。党第二次受到天民党的两面派政治手法的戏弄，不得不承认对天民党人士的忠实太天真了。直到后来，当贝林格宣布转折时，他才说不可能同天民党人一起执政，要求另一种民主替代。斯帕多利尼不失时机地对他说：“如果贝林格希望民主替代，可以支持拉马尔法的尝试，那时佩尔蒂尼总统授命他组织政府。”这个共产党真是一个奇怪的党，它周期性地让天民党这条蛇对它施行催眠术，它一动也不动，只是看着，直到快被一口吃掉时才醒悟过

来。

皮埃特罗·塞基亚^①为反对陶里亚蒂对天民党的幼稚和软弱在党内进行了斗争。塞基亚当时说，需要有一支强大而团结的左派队伍，只有它的力量才能打击天主教界最落后的阶层并推动天民党内的左翼改变党的面貌。三十年后，皮埃特罗·英格拉奥建议执行同样的政策，并在1980年11月党中央会议上激烈地重述了他的建议。他说：“我听了巴尔卡同志对某些同志的立场的批评，因为他们对民族团结的未来前景提出了疑问。鉴于他要求大家明确表态，我认为必须指出，我同他的看法是不同的。我这样提出来是为了做个微不足道的证据，说明在这些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说服一些同志。我就是这些同志当中的一个。”意思是说：不要再让天民党戏弄我们了！由于在党中央会议上讲话向来使用委婉和温和的语言，英格拉奥的语气就显得十分尖锐和异乎寻常。这可能反映了一个三十年来一直遵照陶里亚蒂主义以同样方式进行斗争而未能找到出路的党的某种失败情绪，特别是未能找到解决一直困扰全党乃至全国的教会问题的钥匙。

^① 皮埃特罗·塞基亚，曾任意共领导机构成员，意共副书记。

海 岛 主 人

贝林格继续以陶里亚蒂为师，孜孜不倦地学习着。他已成为共青团总书记和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但还不是范围更小的书记处成员。不过，陶里亚蒂经常让两位非书记处成员参加书记处会议，他们是英格拉奥和贝林格。大家都说陶里亚蒂似乎是他们俩的监护人。后来，贝林格甚至成为世界共青团的书记，他在国外的名气比在意大利还大。他频繁地参加一系列国际会晤和国际会议，不停地出国旅行，同后来在各自党内地位显赫的青年人建立了密切关系。当决定由他还是由纳波利塔诺作继承人的时候，他的国际经历就成为对他有利的因素之一。

英国《泰晤士报》驻罗马记者彼得·尼科尔斯说：“他身上确实没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那种‘熟人好办事’的痕迹，尽管他从1950至1953年担任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主席期间，有机会认识了许多人，他们后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都占据了重要地位。东德党的书记昂纳克就是一例。贝林格在1976年6月欧洲共产党东柏林会议上受到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时，

他本人曾激动地谈过他们之间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友谊。当时有人问贝林格，为什么东德官方报纸《新德意志报》在头版刊登了他的照片，他回答说：“大概是昂纳克的友好表示，我们曾在世界青年联合会密切合作过。”

当然，贝林格出访的主要是东欧国家。卡洛·利扎尼回忆说，在这段时期他再次见到过贝林格。他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又在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的联欢节上遇见他。我们经常见面，经常单独交谈。我当时想，象他这样有能力的人搞青年运动似乎有点浪费。我想他应当成为最高领导人之一。然而，他作为青年运动的首脑，这种地位事实上能使他接触到最高领导人，并能参加党的领导机构。如果他仅仅是个地方干部，即使是重要的地方干部，那怕是罗马的地方干部，也不会有这种机会。”

尽管党内都称他“小贝林格”，而且后来，甚至他当了书记以后，人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这样称呼他，然而事实上岁月对他也是无情的。这个“小”字的头衔已经“名不符实”了。1957年，贝林格已经年满三十五岁，党决定派他去领导党校，那是培养共产党未来干部，即一度被称为职业革命家的学校。贝林格领导党校一年，但他采取了一个意义深远的独立行动：取消了党校学员必须去莫斯科受训一段时期的规定。他们不是意大利党的未来干部吗？那末就在意大利接受教育吧！到莫斯科学习什么呢？

就在这时贝林格开始觉察到不少干部对他怀有疑虑。巴叶塔的话对他来说是致命的一击：“贵族家庭出身的贝林格，

从青年时期起就加入了共产党的领导机构。”为什么贝林格担负的工作总是靠近党的领导中心？为什么他总不离陶里亚蒂的身边？为什么他同书记处有着特殊的紧密联系？他比别人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当然，他是个出色的工作人员。但他没有参加过抵抗运动。实际上，他甚至没有参加过地下斗争。他入党时便是个领取薪金的干部，现在正作为党的大职员平步青云。

这些就是贝林格听到的关于他本人的闲话。他必须取得基层工作的经验，必须离开党的领导中心一段时间，必须离开他轻而易举地登上的那个阶梯，正因为上得容易，他也可能从那个阶梯上一落千丈。应他本人的要求，他被派往撒丁岛担任区委书记。在撒丁岛，他遇到了过去的老同志：布鲁诺·穆拉，他使贝林格回忆起在酒店聊天的日子；皮埃罗·萨纳，他同贝林格一起参加过从前的面包运动。但是，当他去酒店怀旧时，发现酒店已经完全变了样。顾客不再是工人、泥瓦匠、过去的移民、以及对波尔迪加和都灵罢工时代念念不忘的人。现在它成为时髦的聚会场所，光顾者都是萨萨里最显赫的人物，过去的时代真的过去了。只是斯廷蒂诺村还是过去的老样子，贝林格一家常租用的老渔民的房子以及恩里科埋头读书的绿色凉台依然如故。

当时曾在斯廷蒂诺村度假并成为贝林格及其妻子莱蒂齐娅朋友的米兰的一对青年夫妇说：“那时的斯廷蒂诺还处在不开化状态，只有一座旅馆，许多度假的人住在渔民的家里。那里有西利恩蒂一家、切莱斯蒂诺·塞尼一家、贝林格

一家。还有其他人。他们这伙人为数相当可观。不一定需要政治思想完全一致才组成一伙，他们当中有天民党人、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几乎包括议会中所有党派，当然没有法西斯分子。他们要求人们具有另一些品质，即言辞谨慎、行为适度、道德纯洁。事实上，他们所有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纯洁的。这不仅仅决定于贝林格，而且还决定于非常克制和适度的撒丁性格。”

“当他们发现我们同他们具有同样性格时，才接受我们加入他们一伙。我们常乘船出游，由恩里科·贝林格掌舵使帆。他的弟弟乔万尼穿着睡衣上船，一直埋头读书。令人惊奇的是大家谁也不讲话，更不谈政治。我们之间笼罩着那种撒丁式的沉默。但这种沉默是令人欣慰的，因为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关系是轻松的、亲密的。我们还去过几次皮安那岛（平岛），它位于撒丁岛的西北端与阿西那拉岛之间。这个岛近百年来一直是贝林格家族的财产，更确切地说，过去是贝林格家族的岛。恩里科对自己的财产向来持讽刺态度。这个岛是想象中的最可怕的地方之一：光秃秃的，没有树木，火辣辣的太阳就在头顶上。你在那里呆不了十分钟便想尽快跑掉。”

这个以贝林格为主人的皮安那岛，曾经引起不少议论。共产党人怎么能把一个岛当成自己的财产呢？他是怎样得到的？他是不是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迫使区政府以可笑的价格卖给他的？这种议论使贝林格非常痛苦。怀疑他甚至以不正当的手段占据一个岛，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同他的整个人格和思想方法背道而驰的。然而，在这场宣传运动背后隐藏

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有个庞大的旅游公司计划在岛上修建旅游村。这个岛在撒丁区，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一棵摇钱树。要实施这项计划只有一个障碍，那就是贝林格，他反对修建旅游村。他们认为，只要迫使贝林格放弃这个岛，事情就会通行无阻了。

阿纳尔多·萨塔·布兰卡律师说：“皮安那岛是我叔祖父安东尼奥·弗郎切斯科·萨塔医生通过公开招标买到的。那是1856年的事。这个岛正如它的名字那样，光秃秃的，面积117公顷，最高点海拔24米。1868年，萨塔医生为换取其他财产把这个岛转给哥哥伊尼亚齐奥，后者是我的祖父，恩里科·贝林格的外曾祖父。岛上有座摩尔古塔，是海上国有财产。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国家保留了对古塔和周围三公顷土地的所有权，不过从来没有使用过，也不可能使用。1949年以前，这个岛一直租给一家牧民冬季放牧用，由我负责管理，我记得那时的年租为十万里拉。后来分家时，这个岛分给了贝林格。几年前出现了这种危险：有人企图占有那三公顷国有土地，修建旅游村，那会改变该岛的特点，损害它的风光。是我劝说贝林格兄弟提出民事诉讼，要求承认他们对三公顷土地和古塔的所有权。贝林格兄弟胜诉，但是有人说，他们是从区政府那里购买了这块土地，有的话就更难听。我们大家对这种争论都感到遗憾，恩里科·贝林格对此尤为不快。”

恩里科·贝林格无比愤慨，有人竟然由于岛屿的问题对他产生了种种怀疑。为了保护这个岛的完整，使之免遭旅游

投机活动的损害，他四处奔波。后来他决定扔掉这个包袱。他同弟弟乔万尼商量，得出一致的结论：把皮安那岛赠给党组织。但是，恩里科·贝林格要求在赠送证书上写上一条，共产党不得把皮安那岛用于投机目的。

当陶里亚蒂发现阿门多拉利用组织部在党内建立个人权力中心时，决定撤销他的组织部长职务。陶里亚蒂征求隆哥的意见，由谁代替阿门多拉为宜。

恩里科·贝林格是由隆哥提名的。随后，他被从安静的撒丁岛召回罗马担任极为重要的职务，实际上成为党的内政部长。然而，他是在党内矛盾和争论越来越激烈的时刻返回党的领导中心来的。陶里亚蒂反对赫鲁晓夫的论战方兴未艾，阿门多拉同英格拉奥的冲突日趋尖锐。贝林格将占据的职位将给他带来很高的威望，但那个时机却极不适宜。

他担负的第一个艰难使命是陶里亚蒂委派的。当时赫鲁晓夫坚持召开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以谴责毛泽东的中国。刚刚宣布共产主义运动再不能只有一个中心，俄国不再是领导国的陶里亚蒂反对赫鲁晓夫的计划。在法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恩里科·贝林格奉命前往巴黎，向所有党的代表和苏斯洛夫本人公开明确地宣布，不同意赫鲁晓夫的计划。这是第一次对莫斯科说“不”字。

从那以后，每次对苏联人说贝林格将去莫斯科时，他们就会猜到这是什么意思：是意大利共产党派他来对某个问题说“不”字。这样一来，意大利共产党越来越频繁地让他出国完成使命。

现在看来，他已在范围不大的领导集团中牢固地站住了脚跟。尽管内部有对抗、争论和冲突，党的政策却是由这个集团决定的。在党的首脑陶里亚蒂逝世时，贝林格也在送葬的主要领导人之中，紧跟在尼尔德·约蒂及其女儿玛丽莎之后。总之，他是党的英华，是从中产生未来书记的英华之一，而且在所有英华之中，他是最年轻的。“小贝林格”的称呼是永衡的。

“土耳其青年”

贝林格一向忠于陶里亚蒂，一切师承于陶里亚蒂，并力图学习他的方法和为人。在党的所有领导人中贝林格在陶里亚蒂晚年的经历和感受是最为复杂的。那是党内充满危机同莫斯科的关系也充满危机的年代。赫鲁晓夫同陶里亚蒂之间水火不相容。陶里亚蒂失去了同莫斯科的联系，失去了特殊的消息来源。他完全陷入孤立，经受着极其深刻的政治危机。

他的老朋友朱利奥·切雷蒂后来说：“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流的领导人、共产主义英雄时代最后一批幸存者之一、季米特洛夫之后威望最高的人、西方最重要的共产党的书记当时正经受着自己的政治悲剧，经受着自己的滑铁卢。不过，他同拿破仑不同，他还没有感到自己是伟大复仇战役的当事人或军事家。”

如果说陶里亚蒂在国际上身陷孤立的话，那末在党内，在切雷蒂称为“土耳其青年”的逼迫下，他也感到孤独。切雷蒂说，正是由于“土耳其青年”的对抗行动才使他看到，“分裂和决裂的危险迫在眉睫。他那时已精疲力竭，疾病缠身，不

得不接受一次膀胱手术，有时甚至想引退，把党的领导权交给隆哥。”

切雷蒂所说的“土耳其青年”指的是阿门多拉和英格拉奥。而贝林格则以更谨慎的态度，可以说几乎是以同情的态度注视着陶里亚蒂的悲剧。

由于贝林格的这种态度对后来隆哥选择他担任党的书记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回忆一下陶里亚蒂危机的根源，阿门多拉同英格拉奥之间的斗争经过，以及贝林格在这场斗争中的态度。贝林格本人在这场斗争中曾突然降职，后来又恢复了职务，并晋升为书记。

陶里亚蒂的危机始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当赫鲁晓夫做那篇著名的关于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时，阿门多拉是意大利共产党内唯一一位公开而热情地站在赫鲁晓夫一边的领导人。

阿门多拉后来说：“我当时对赫鲁晓夫的政治勇气的敬佩心情极其强烈，也十分理解，因为只有象他那样做才能使代表大会突然面对现实，才能战胜某些人的官僚阻力，这些人为了维护老一套不同意说出某些事实。我非常欣赏赫鲁晓夫的勇气。而陶里亚蒂却感到十分反感，这一方面由于他对进行无情揭露的必要性不理解，也不同意那种做法；另一方面，或许这是首要的，由于报告缺乏思想深度，分析肤浅。那时我们之间产生了某种对立情绪。”

陶里亚蒂不仅感到反感，而且认为赫鲁晓夫是个粗野的小丑，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是个巨大错误。在国家经济与劳动

委员会上有人请他就此发表意见，他推脱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不可能在我们的队伍中造成任何混乱；已经提出，并将继续提出一些讨论题目，我们将严肃认真、从容不迫地加以对待。”

所有在场的人面面相觑，迷惑不解。

阿门多拉对他说：“你没有谈‘二十大’！为什么？”

陶里亚蒂满不在乎地说：“啊，我忘记了。”

陶里亚蒂深知，赫鲁晓夫的疯狂不仅表现在要对斯大林重新估价上，而且表现在要对党的理论体系本身重新估价上。他对一切都要进行重新估价。

然而，阿门多拉却坚信，必须利用这个机会重新估价一切。意大利已进入“经济奇迹”年代，已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公众舆论已臻成熟。在不久的将来，政党也同教会一样，将成为意大利社会中不合时宜的现象。所以应当顺应形势，决心变革，不能再继续讲述意识形态的寓言故事和许诺救世主的到来，而需要建立一个更加世俗化的，不那么宗派主义的党。

最后陶里亚蒂不得不表明立场。他在回答《新话题》杂志记者的提问时，首先攻击了赫鲁晓夫。他说，那些过去赞美斯大林，把一切功劳都归于他的人，现在却指责他，把一切罪过都加到他身上。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思想方法。陶里亚蒂说，整个苏联领导集团都有过错，“包括那些今天主动揭发和纠正错误的同志”。这对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来说是个沉重打击。陶里亚蒂说，无论如何我们意大利人是另一

回事。我们已经表示，莫斯科不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我们将继续走我们意大利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但这时，阿门多拉开始提出一个十分危险的话题：“这样说，难道我们这里就没有个人崇拜吗？”意思是说，难道不是到了开始怀疑陶里亚蒂的时刻了吗？阿门多拉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有点太远了。他是否想夺取陶里亚蒂的位置？党的代表大会即将召开。那末，如何处理会议大厅照例悬挂的伟人像呢？马克思的画像没有问题，恩格斯、列宁和葛兰西的画像也没有问题。斯大林的画像怎么办？

陶里亚蒂说：“把斯大林的画像也挂上。”

苏斯洛夫代表苏联共产党来到罗马。陶里亚蒂同他进行了单独会谈，对他重申了对赫鲁晓夫的批评意见。他从苏斯洛夫口里听到了令人震惊的消息：苏联党内也有不少批评意见；匈牙利暴动就是赫鲁晓夫报告所造成的危害的证据。苏联党的最高领导很快就会发生变化。

苏斯洛夫提供的情报使陶里亚蒂对代表大会更加信心十足。党要革新，需要更多的民主，更加独立于莫斯科，更加坚定地走意大利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意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多党制原则等。所有这些问题在党的纲领上并没有提及。由此似乎应当得出结论，必须反对党内的顽固派，反对那些仍然坚持斯大林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相反陶里亚蒂正是在这点上扭转了局势：为了实现这个更加温和的纲领，必须反对来自更为温和的同志的危险。这是使阿门多拉束手无策的把戏。

然而，推行更加温和的纲领和反对温和派的斗争之间没有矛盾吗？

恰在这时恩里科·贝林格站出来讲话支持陶里亚蒂，反对阿门多拉。他说：“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认为明确地重申革新的目标同党的核心的某些激烈而尖锐的发言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些发言旨在驳斥和谴责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种种表现。总之，好象火力仅集中在这一个方向上。”尽管贝林格的分析前后并不完全一致，但他成功地说明这里并没有矛盾，主要危险正是来自改良主义者。这是贝林格同阿门多拉的第一次交锋。后来，当贝林格成为党的书记后，这场斗争必然再次爆发。

阿门多拉对修正主义者，首先是乔利蒂，大发雷霆，因为他们的过份尖锐的批评使陶里亚蒂得以改变局势。可是，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时，他必然会发现风向是针对着他的。阿门多拉后来说：“在许多选票上我的名字被抹掉了。由于我处在内部斗争的浪尖上，我招来了很多批评，我的名字被许多同志抹掉了。这并没有多大的政治意义，未能改变最终结果，但我不隐讳，这给我造成了一定的痛苦。”

这次(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象征性事件是著名的拉丁学家切托·马尔凯西对赫鲁晓夫的严词痛击。他说：“罗马帝国最伟大、受诽谤最多的皇帝之一提伯里乌斯受到最著名的君权史学家塔西佗的无情指责。不幸的斯大林却遇到了尼基塔·赫鲁晓夫。”

全场起立，向他疯狂鼓掌。陶里亚蒂起身向他走去，并

拥抱了他。

阿门多拉后来说：“我故意坐着一动不动，也没有鼓掌。巴叶塔和阿利卡塔同我一样。只有我们三个人没有鼓掌和起立，而陶里亚蒂几乎是急忙起身拥抱他。不同的举止表明我们对赫鲁晓夫的评价明显不同。”忠实于陶里亚蒂的恩里科·贝林格，显然也在鼓掌人之列。

所有在场的人都注意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在为这篇反对赫鲁晓夫的讲话而鼓掌的行列中还有苏联代表苏斯洛夫。正是他在“二十大”上把赫鲁晓夫说成是伟大的理论家、马列主义学说的革新者的。

陶里亚蒂之不幸

苏斯洛夫对陶里亚蒂披露的新闻，几个月后得到证实。以马林科夫为首的一批人，在最高苏维埃的会议上成功地使赫鲁晓夫处于少数，并要求他辞职。似乎大局已定。但是，赫鲁晓夫令人难以置信地杀了一个漂亮的回马枪。他说，他是否应该辞职，应由党中央决定。他成功地使会议讨论拖延了几个小时。与此同时，他的盟友朱可夫元帅向苏联各地派出军用飞机，把中央委员们迅速接到莫斯科。这个异乎寻常的举动令人难以置信。全体中央委员几小时内云集莫斯科，重申了他们对赫鲁晓夫的信任。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被击败，他们很快从政治生活中消失了。

陶里亚蒂在罗马急切地等待着来自莫斯科的消息。安东尼奥·乔利蒂说，他早已为《团结报》准备好一篇社论，以便说明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然而，收到的消息同他期待的恰恰相反，赫鲁晓夫胜利了。形势变得更加困难。幸亏莫斯科那里达成了一项妥协：赫鲁晓夫将继续掌权，但他必须保证今后不再说一句反对斯大林及否定过去的话。这对陶里亚蒂

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有利于他稳住以阿门多拉为首的改良派，后者正依靠赫鲁晓夫来反对斯大林主义。但这个消息也有消极的一面，克里姆林宫现在的首脑已把陶里亚蒂列入自己的敌人的名单。自从陶里亚蒂把忠于苏联做为自已整个生活的不可违背的行动准则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同莫斯科进行全面对抗。过去每当出现重要问题时，斯大林总是对自己的合作者说：“让我们听听意大利教授有什么想法。”这位意大利教授就是陶里亚蒂。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赫鲁晓夫获胜后，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使全世界为之震惊。接着，他把各国共产党的首脑召集到莫斯科。这是最后一次真正的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所有的大人物都出席了，甚至包括毛泽东和胡志明。

轮到陶里亚蒂发言时，他宣读了自己的讲话。当时在场的维托里奥·维达利回忆说：“所有的人都全神贯注地听着，但态度冷淡。在陶里亚蒂结束发言前几分钟，赫鲁晓夫故意站起来退出会场。据我观察，他似乎怒气冲冲。”陶里亚蒂讲的还是老一套：建设新党和意大利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然而，维达利说：“我有这样的印象：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我们的路线，如果不是反对的话。”

第二天，法共代表团团长杜克劳斯站出来发言。很明显，他事先同赫鲁晓夫取得了一致意见。他说：“我不同意陶里亚蒂讲话的内容。我认为最好不考虑他提出的主张。”

维达利说：“我们吃惊地相互看了看。一时大厅里变得死一般的沉寂，连一点嗡嗡声都没有。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

我们，我们似乎处于探照灯的灯光之下。约蒂感到气愤，大声喊出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斯科奇马罗让她冷静下来。惊奇的时刻过后，许多代表相继发言，表示同意杜克劳斯的讲话。最后，苏斯洛夫对这场同陶里亚蒂的争论做了总结，他强调只有建立在列宁学说基础上的党才是新党。然后大家起立，唱《国际歌》。我距陶里亚蒂很近，见他拱肩缩背，象患病一样痛苦，他嘴唇在动，但没有唱出声，他面部肌肉紧缩着，表明他正努力控制自己的感情。在这次会议上发生的事情，我们在意大利极少谈及，或守口如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外共产党报刊停止刊登陶里亚蒂的讲话和文章，或者经过删节后才予刊登。”从此便开始了阿门多拉称之为“虚假一致的年代”。党的领导层出现分裂，许多人纷纷脱党，同莫斯科的关系恶化到极点。然而，陶里亚蒂要求加强团结，对外一致，並要表现出继续忠于苏联。从此每项决定都成为难题、都是妥协与调和的产物，但一切都是一致通过的。为了预防来自莫斯科和党的基层的暴风雨的袭击，陶里亚蒂紧闭了门窗。

阿门多拉仍然是赫鲁晓夫最忠实的支持者，不过当时他也没有太多的活动余地。但他正在党内为自己搜罗数目可观的追随者。他掌握着组织部。人所共知，在一个高度集中的党内，处于这个地位意味着什么。这就是说，除陶里亚蒂之外，他是手中权力最大的人。掌握组织部的人可以使自己的名字在党内不胫而走，可以扩大自己的追随者队伍，提高自己在基层的名望。

陶里亚蒂的亲信开始指责阿门多拉是个惹事生非的人。他们说：“他同赫鲁晓夫和南尼一模一样。”他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朝三暮四，摇摆不定。总之，把他描绘成一个轻浮易变，不可信赖的人。阿门多拉后来说：“我当时感到，我周围正在滋生某些令人非常烦恼的东西，即对我个人的种种担忧，好像我企图为自己的某种独特地位打下基础。”

实际上，人们开始怀疑他想要取代陶里亚蒂，毛遂自荐地当书记。

阿门多拉说：“报刊上曾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力图把我说成是合法继承人等等。这种宣传是多么愚蠢可笑，但却给我带来许多烦恼，遗憾的是在党内也引起了某些怀疑。有一次，《快报》周刊发表了一篇关于‘意大利的赫鲁晓夫’的文章，指的大概就是我吧。那时陶里亚蒂曾以颇带讥讽的口吻对我说：‘你知道吗？在我们党内皇太子是永远不能继位的。’”

从阿门多拉自我表白的口气可以看出，这场针对他的小小精神战已达到何种严重程度。他说：“我感到人们对我的疑虑在增长，这使我非常气愤。我乐于开展必要的斗争，甚至受到批评，事实已经证明，我在政治上是能够承受住各种打击的，但我很难忍受对我个人的种种怀疑。我感到在我周围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气氛。我们进行过各种艰苦激烈、但却是诚实的斗争，尽管有不少人认为，我是出于个人考虑才坚持某些观点的。我曾扪心自问，我是否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结果一方面使某些人产生期望，而同时又引起另一些

人的反感。当时甚至有些同志自称是阿门多拉派，我对这种可笑的提法表示强烈的反对。有一天上午，我发觉领导机构的两位与我关系甚密的同志也流露出怀疑的神情。我对自己说，如果连这些同志都开始怀疑我，那我真到了该改弦易辙的时候了。”

阿门多拉去找陶里亚蒂，要求解除他的组织部长职务。陶里亚蒂很可能早已决定这样做。他起初让阿门多拉好好想一想，劝他不要听信那些流言飞语，但后来又接受了他的辞职。恩里科·贝林格被选中取代阿门多拉领导组织部。陶里亚蒂为使“意大利的赫鲁晓夫”就范起用了这位年轻的撒丁人。这是阿门多拉和贝林格之间长期对立的开始。

连续几个月党被虚假的一致的气氛笼罩着。然而它失去了不少党员。许多曾为党增光的优秀知识分子纷纷退党。党对工人的吸引力也远不如从前了。战后初期，百分之二十四的意大利工人加入了共产党，现在已不足百分之十四。为了对党中央隐瞒党员人数的减少，许多省委使用空白党证充数。他们向罗马送去同党证数目相符的党费，好像真有这么多同志要求入党，而把空白党证锁在抽屉里。

恩里科·贝林格现在领导组织部，可以直接了解真实情况：许多党支部空无一人，同志们不再过党的生活。仅在几个月前，当斯大林这颗炸弹爆炸时，党支部还拥挤不堪，大家都想了解情况，要求解答问题。但党保持沉默，所做的解释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于是大家开始明白，在团结一致的外表下正在走着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

陶里亚蒂之死

1961年秋天，陶里亚蒂曾用紧闭门窗的办法对付的暴风雨再次出现了，其来势比前次更为猛烈。这次又是赫鲁晓夫在兴风作浪。巩固自己的权力和战胜党内反对派后，他再次把矛头指向斯大林，对他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指责。他建议给斯大林格勒易名，把斯大林的遗体从红场上的陵墓里清除出去。他指责过去同斯大林共事的人没有能够制止他的权力过大，指责他们一向顺从他。陶里亚蒂试图再次运用过去行得通的策略。他说，这是俄国人的事，不应火上加油，目前时局困难，我们必须加强团结。

这次阿门多拉强硬起来。他要求召集党中央委员会讨论赫鲁晓夫的新立场。陶里亚蒂认为不合适，他说最好等一等，否则在讨论中大家可能感情用事。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已经孤立了。他不得不同意进行讨论。他力图把讨论引向前次的轨道，使大家对赫鲁晓夫在伤口上再捅一刀的做法产生怀疑，但未能成功。他说：“大家提出，是否确实有必要重新翻开谴责的篇章，集中火力攻击斯大林的老同事？”接着他问

道，是否确实有必要改变斯大林格勒的名称。他又说，无论如何这不是意大利党的问题。人所共知，意大利党走的是独立的道路，它没有任何值得自责的地方。

阿门多拉走上讲台反驳说，陶里亚蒂认为没有必要改变斯大林格勒的名称，但事实并非如此，不仅有必要，而且这个决定符合那个城市全体居民的愿望。另外，由于他了解陶里亚蒂对赫鲁晓夫的抵触情绪，他向陶里亚蒂明确提出一个挑衅性问题：“我们为赫鲁晓夫路线的胜利做过什么贡献？大概谨小慎微和拖泥带水使我们没有做出本来能够做出的各种贡献！”最后，由于陶里亚蒂以民主集中制的坚定捍卫者自居，阿门多拉又提出一个问题：“在我们党内辩论也应深入下去，必要时一直辩论到在各种问题上逐渐形成多数派和少数派为止。”

陶里亚蒂斩钉截铁地回答说：“阿门多拉同志的地方观念太重，应更多地派他去东欧国家看看。”不久再次召开会议。这次又是恩里科·贝林格担负起反击阿门多拉的任务。他说，同往常一样，危险来自宗派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改良主义是最严重的危险。兴风作浪的人便是阿门多拉。

贝林格说：“我们党也受到改良主义的压力，某些社会民主党思想可能渗入我们党内。这样说并不是无稽之谈。”事实上，“不乏这样一些提法，它们看来不是出于基于民主集中制的列宁主义党的观念，而是出于某种形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念。”这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是非同寻常的。几年后，正是他把属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的多党制

和民主制度作为欧洲共产主义的基础。

陶里亚蒂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努力恢复他从前在莫斯科及国际上一直享有的威望上。他同克里姆林宫的各种联系渠道实际上已经中断，除正式通报外，他对那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法国的多列士同莫斯科仍然保持着各种渠道的联系。因此有必要听听他的意见，以了解莫斯科那里的气候。

在意大利有位老同志朱利奥·切雷蒂曾多年生活在法国，是多列士的挚友。陶里亚蒂召见了，请他面商多列士可否安排一次会晤。陶里亚蒂本人愿意立即前往巴黎。但多列士拒绝会见他。这种态度无疑使陶里亚蒂感到难堪。

对陶里亚蒂来说，似乎已经是最后一幕了。但当他已经决定引退并把党交给隆哥时，突然，他同莫斯科的联系渠道又畅通了。

这次又是老苏斯洛夫通过神秘渠道通知他，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建议他尽快去苏联。可是以什么借口去呢？当时恰值八月份，就说去雅尔塔度假吧！

出发前不久，陶里亚蒂在蒙特奇托里奥宫^①遇见了达维德·拉约洛。他说：“这次我不是心甘情愿去莫斯科的，这不是一次令人愉快的旅行。我像学生时代一样期待假期的早日到来，我需要的是清静和瓦莱达奥斯塔山谷的新鲜空气。”

“那就要求推迟行期。”拉约洛建议说。

“已经提过，但毫无用处。”

^① 议会大厦

拉约洛说：“后来我才知道，陶里亚蒂已经通过别的渠道并凭借自己的预感看出，苏联党的领导层并非一切都明朗正常。很可能不是赫鲁晓夫，而是策划取代赫鲁晓夫的人邀请他。或许是需要他出主意，或许是为了征得他的同意。难道是苏斯洛夫在操纵全局吗？”

是的，事实上正是苏斯洛夫。当然不会是赫鲁晓夫邀请他。陶里亚蒂抵达莫斯科时，赫鲁晓夫甚至没有露面。陶里亚蒂同苏联其他领导人谈话后才明白，原来请他来莫斯科是为了让他扮演反对赫鲁晓夫的起诉人角色。恶有恶报，他复仇的伟大时刻终于来到了。鉴于无法找到赫鲁晓夫，陶里亚蒂将以书面形式提出控告。他来到雅尔塔，一夜之间以极大的热情起草了那份实际上成为他的政治遗嘱的雅尔塔备忘录，随后脑溢血夺去了他的生命，他未能看到胜利的时刻——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倒台。

隆哥急忙飞往雅尔塔。约蒂立即把陶里亚蒂撰写的备忘录交给他。隆哥满怀激情地读完备忘录。那是份措辞强硬的文件，是对赫鲁晓夫政策的控诉书，是独立宣言。多年来一直遭受屈辱和排挤的人开始复仇了，他要从政治上教训一下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特别是那个勃列日涅夫。他觉得勃列日涅夫甚至比赫鲁晓夫更坏。他到莫斯科后，同勃列日涅夫只谈了不长时间就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他气愤地喊道：“你们什么也不懂，同你们无法讲理，我宁愿同赫鲁晓夫谈。”可怜的陶里亚蒂，他并不知道，正是他那份对赫鲁晓夫的控诉书有利于这位什么也不懂的勃列日涅夫的高升。

隆哥时期

恰好是勃列日涅夫前来罗马参加陶里亚蒂的葬礼。他乘机问隆哥：“你们决定如何处理雅尔塔备忘录？”“我们要公开发表。”隆哥这样回答说，看来他并不十分满意勃列日涅夫的问候口气。隆哥同陶里亚蒂不同，他不象陶里亚蒂那样，一向对苏联人毕恭毕敬。他不象陶里亚蒂那样，曾多年生活在苏联，适应了那里的环境，并在那里步步升高，成为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之一。隆哥每次去莫斯科都感到不惬意。伊塔洛·卡尔维诺回忆说，当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时他曾在罗马遇见隆哥。他说：“我同保罗·斯普里亚诺在博尔盖塞公园约会。我们在公园的林荫道上长时间地漫步，后来在一个水池旁遇到了路易吉·隆哥。他正同一个男孩玩木船。我们三人激烈地谈论起时局来。我记得隆哥对我们说，许多年前，在他担任共青团书记时，他曾去过莫斯科。那里的气氛一片阴沉，不仅公民没有任何自由，党员也没有任何自由。”总之，当时他似乎也觉得如释重负。

维托里奥·维塔利证实，在赫鲁晓夫时代仍然是这种气

氛。他在《二十大日记》中写道：“陶里亚蒂请我给他办件事，把他每天写给尼尔德的信投入信箱，因为他担心他太惹人注目，信可能被拆开。”就连陶里亚蒂当时也受到监视。

尽管巴叶塔和拉马反对，隆哥仍然决定公布陶里亚蒂备忘录。这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声明，对于这位从来不是莫斯科的人来说，这个声明显然是非常适宜的。几个星期后，当来自莫斯科的消息说赫鲁晓夫由于健康原因离职和由勃列日涅夫取代他时，隆哥对苏联人首次做出了强烈的反应。

巴叶塔说：“当赫鲁晓夫被革职时——据说是由于健康原因，但甚至忘记了祝他早日康复——意共派出一个代表团，目的是对苏联同志说，我们不理解，也不满意那种解释，甚至对那种解释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想让苏联公民、让全世界，甚至让我们也相信，他们是忘记了对这样一个人表示祝愿和感谢，而这个人在此之前曾给苏联政治和历史的一个重要时期打上了他个性的印记。”

为了向苏联人表示这种疑虑，布法利尼和贝林格奉命前往莫斯科。这不是第一次委派贝林格出国执行任务，但隆哥这次让他扮演一个重要而微妙的角色：当面同勃列日涅夫进行争辩。从莫斯科返回后，又是贝林格回答了记者就他的莫斯科之行提出的问题。他说：“即使在访问莫斯科之后，我们仍然认为主要是对苏联党政领导层的人事变动的动机和原因没有提供足够的公开消息这一点，我们应该继续持保留态度。我们非常坦率地向苏联同志说出了我们的看法，那就是在决定取代赫鲁晓夫同志时，他们本来一方面应当明确提及赫鲁晓

夫的不容置疑的功绩，另一方面则公开说明对他的主要批评意见，从而革了他的职。”显然，他这时并没有咬文嚼字。

在意共做出的这些反应面前，社会党颇孚众望的知识分子诺尔贝托·博比奥深为意大利共产党人所显示的独立性所感动，他给阿门多拉写信说：“在十月革命成功近五十年、二次大战结束二十年、非斯大林化十年之后，难道一届政府撤销对其总理的信任可能成为不再是悲剧性的，而是荒诞无稽的秘密阴谋事件吗？”博比奥建议成立工人阶级统一党。他说，为此你们只差跨出最后一步，即更明确地脱离莫斯科，毫不含糊地接受民主原则。“我们需要你们的力量，但你们不能不顾我们的原则。”

八年前，正是阿门多拉反对成立统一党的主张。他说：“我们认为，在目前条件下，这种形式不仅不现实，而且似乎背后还隐藏着取消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企图。”然而，阿门多拉现在同意与博比奥讨论。他也认为，一个把自由社会主义作为纲领的统一党是必要的。但他明白，“为了组成工人运动的统一大党，必须进行耐心而顽强的工作，这样的党将包括共产党人、社会党人以及象博比奥这样的人，他们不愧为戈贝蒂开创的自由事业的继承人”。阿门多拉得出了无情的结论：社会民主党失败了，但共产党也表明自己没有能力实现以它为领导的工人阶级的团结。因此必须组成一个既非社会民主党，也非共产党的党。由此他对共产党做出的评语是十分尖刻的。他说它是“一个在五十年内，经过三代党员的努力

没有达到自己目标的政治组织，它必须寻找失败的原因，并善于进行自我改造”。

把阿门多拉推上被告席的理由是相当充分的：在进行了五十年的斗争、牺牲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之后，他最后下结论说，其结果是失败了，一切必须从头开始。所有热爱共产党的人听到这类话都会感到受了侮辱。是失败了吗？是列宁主义破产了吗？这些说法不啻亵渎神灵，而且是对全党的诬蔑。陶里亚蒂逝世后一时平息下来的党内斗争，这时再次全面展开，而且更为激烈。阿门多拉受到各种指责。党的书记处收到不少表示愤慨的电报和信件。在党的报刊上也开始出现措辞激烈的文章。彼得罗·塞基亚的文章是刻薄的，文章说阿门多拉的主张不仅使他迷惑不解，而且简直使他蒙头转向。接近英格拉奥的罗马诺·莱达的文章也是严厉的。文章说，要求抛弃改良主义和列宁主义，或者使这两种主义溶为一体，或者企图超越它们，都是大错而特错。

阿门多拉开始怀疑，在这种普遍愤慨的气氛中（有人甚至要求对他进行制裁），并非一切都是自发的，大概背后有人煽风点火。他认为，这个人就是他的老对手彼得罗·英格拉奥。正如拉约洛后来非常外交地说：“阿门多拉受到怀疑，这不仅由于敌人报刊利用了他的立场使他与隆哥或英格拉奥处于对立地位，正如从前曾使他同陶里亚蒂处于对立地位一样，而且还由于党内某些人的宗派主义的反对立场。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强硬派，他们从未接受意大利通往社会主义道路的提法。有些同志甚至利用辩论的机会对乔治·阿门多拉进

行人身攻击。”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隆哥的书记处一开始便以阿门多拉和英格拉奥的对立为标志。在隆哥担任书记的年代里，这种对立是党内斗争的主要表现。难道年轻的土耳其人当时就知道隆哥的书记处不会持续太久，因而开始了争夺党的领导权的斗争吗？这个问题很难做出回答。但可以肯定地说，这场斗争是长期的，艰难的，但最后从两个竞争者之间杀出了得胜的第三者，这就是恩里科·贝林格。

选谁当总统？

几天后，阿门多拉同英格拉奥的角逐再次激化起来。当时共和国新总统选举在即。天民党寄希望於利昂纳，但范范尼不同意，他毛遂自荐当候选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共和党则支持萨拉盖特。共产党在三者之间选择谁呢？

阿门多拉坚定不移地主张投萨拉盖特的票。因为这可能成为考验世俗党联盟的机会。各世俗党总共有百分之四十八的选票，比天民党本身还多。这是他的关于组成统一党的论点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对阿门多拉来说，同意投萨拉盖特的票，意味着是对一支拥有百分之四十八选票的队伍的第一次考验，并可以看出这支队伍能对其他力量产生多大的吸引力。

英格拉奥是共产党议会党团主席。他不同意选举萨拉盖特，而宁愿投范范尼的票。英格拉奥认为，如果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投范范尼的票，就能够分裂天民党，因为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天民党右翼候选人利昂纳落选，另一方面有助于天民党左翼候选人范范尼当选。英格拉奥推崇的这套

方案与阿门多拉的世俗党联盟主张大相径庭，目的是建立能把天民党左翼和各世俗党团结在自己周围的统一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左翼集团。

投票连续不停地举行了多次，但毫无结果。^①利昂纳看到自己只得到本党的支持，於是撤回了他的候选人资格。现在只剩下范范尼和萨拉盖特仍在继续争夺。共产党人一直是分裂的，隆哥在阿门多拉和英格拉奥的主张之间不能做出抉择，因此只好让议会党团自己做出决定。而议会党团会议对英格拉奥来说好似一场群狮争雄战。阿门多拉十分精明，他对问题的提法使英格拉奥陷于困境。他说，这是在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之间做出抉择的问题。墨索里尼当权时，范范尼是个法西斯分子，他赞扬过组合制度。而萨拉盖特当时曾被迫流亡国外，为反对墨索里尼而战斗。现在必须在法西斯分子范范尼和反法西斯分子萨拉盖特之间进行选择，如果我们党决定选择法西斯分子，我们还有什么脸面会见支部的基层同志？又以什么理由对他们进行解释呢？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论据。老同志支持英格拉奥，因为他比阿门多拉左一些。现在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正在走向死胡同。有的议员喊叫起来：当许多同志被迫服苦役和在法西斯监狱坐牢时，当许多同志被迫流亡和遭受迫害时，英格拉奥干什么去了？他参加法西斯组织的庆功会去了吧！无疑，这是阿门多拉的重大成功。当隆哥看准风向决定全党投

^① 按意大利宪法规定，头三次投票，当选者必须拥有三分之二多数选票，从第四次投票起，只须简单多数就可当选。

萨拉盖特的票时，阿门多拉的世俗党联盟的主张最后获胜了。

范范尼难以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坚信共产党人会投他的票，因而不愿接受新的形势。他拒绝撤回候选人资格，希望投票一次又一次地举行下去，以便彻底消耗萨拉盖特的力量，使对手精疲力尽，并寄希望于英格拉奥的支持者能扭转党内的形势。投票无休止地进行着，公众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分裂的议会争吵不休和无法取得任何结果的闹剧，他们越来越感到不安和忍无可忍。

天民党已经料到，他们在这场搏斗中输定了。只有范范尼固执己见，不愿面对现实，在全国公众面前徒劳地进行挣扎，以致于使人们感到象演滑稽剧一样可笑。梵蒂冈不得不进行干预，差使德拉夸主教会见范范尼，并同他进行了非常严厉的谈话，命令他退下阵来。

赞同阿门多拉观点的达维德·拉约洛在众议院遇到隆哥。他说：“在英格拉奥支持范范尼这场闹剧收场之后，难道你就没有感到当初你任命他为议会党团主席是个错误吗？你应象陶里亚蒂一样，自己担任这个职务。”这些话无疑是在隆哥未愈的伤口上又刺上一刀。

“我不是党的首脑。”隆哥回答说，“陶里亚蒂却是。我只想很好地完成做为书记的职责。我不能同时干几项工作，因为每件工作我都要付出许多心血。”

隆哥是第一个确定这样信念的人：在陶里亚蒂的晚年，党放慢了前进的步伐，熟练地推行一种不断变化的政策，时

而支持这一方，时而又支持另一方。隆哥没有陶里亚蒂那么高的思想水平，也始终未能达到那种水平。早在隆哥年轻时，有一次他同未婚妻泰雷莎·诺切散步遇到陶里亚蒂，并同他打了招呼。泰雷莎·诺切问他：“那个人是谁？”隆哥回答说：“他是个记者。”他承认陶里亚蒂的真正天赋是他在运用策略方面的惊人才干和具有神父般的狡黠，善于利用各种形势顽强地捞取好处。但他从来不能理解陶里亚蒂为什么对莫斯科过分地、简直是俯首贴耳地顺从。隆哥是农民出身，看待任何事情都界限清楚，黑白分明。而陶里亚蒂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典型知识分子，他重视问题的提法，乐于调解矛盾和运用辩证法。他提出的意大利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实际上是一锅无所不包的大杂烩，任何人都可以从其中捞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隆哥感到必须澄清这种混乱局面，恢复党在模棱两可、表里不一和挤眉弄眼中失去的鲜明形象。

有部分党员认为隆哥应对这种混乱局面负责，指责他是个庸庸碌碌的官僚，缺乏理论基础，仍然停留在游击战争年代。当然，他不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但有些问题他看得很清楚，可能比陶里亚蒂还清楚。这种混乱局面不是由他造成的，锅里的水早就沸腾了，已经沸腾了好多年，甚至从二十年前，即从共产党人被排挤出政府和陶里亚蒂提出的有关渐进民主的理论破灭时就开始了。从那时起二十年来，党做的工作只是力图修补这件已经破旧的衣服。锅里的水从那时起便沸腾了。陶里亚蒂本人曾把那些年称作表里不一的年代，

因为在那些年里党在公开讲话中声明自己要走民主道路，但内心里却在等待革命时机的到来。

赫鲁晓夫揭开了这口锅的盖子，现在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於是出现了惊慌失措，混乱不堪和对立冲突。赫鲁晓夫使共产党的思想基础陷于危机，形象受到损害。这是摧毁一切的暴风雨。那时领导意共的是陶里亚蒂，混乱在他在世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今天大家都记得陶里亚蒂回答《新论据》杂志记者问题时说的话，他重申了意大利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人们却忘记了路易吉·隆哥比他走得更远。在大家尚未见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文本之前，隆哥已经说过一种超出陶里亚蒂上述话的看法，一种在当时看来简直是难以置信的看法，然而后来却无声无息了。在党内好象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他的话。

“当我们说我们在意大利要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时，”隆哥说，“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是按照宪法允许的民主道路行事的，按宪法规定，多数派和少数派可以并存，少数派总有成为多数派的可能性。”当时正是陶里亚蒂断然回绝要求革新的党内反对派的时候。他说：“谁对你们说过，意大利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议会道路？”

隆哥深信，必须彻底改变党的道路，一切从根基上重新做起，否则，在未来的二十年里党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仍将会处于无关紧要的地位，仅限于搞宣传而已，正如陶里亚蒂在“中左政府”初期对南尼说的那样：“你真幸福，你开始搞政治了，而我却必须继续搞宣传。”

这就是隆哥现在面临的根本危机。泰拉奇尼看到了这点，他在同阿门多拉争论统一党问题时说：“这是对党的理论原则本身的怀疑，关系到头等重要的理论概念问题。”

泰拉奇尼是里窝那代表大会和同社会党分裂的当事人之一。现在他看到当时的决定和原则已处于危险之中，并将重新进行讨论。

那时的分裂是个错误吗？创建共产党是错误的举动吗？在那些日子里，泰拉奇尼好象再次听到屠拉梯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颇有预见性的讲话：“你们要记住，最终胜利者是我们，即是那些今天被你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叛徒的人。当俄国的神话，布尔什维克的神话在你们心灵上破灭时，当现在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或者失败、或者不得不改变时，我们的胜利就到来了！”

难道屠拉梯预见的时刻到来了吗？难道布尔什维克的神话正在破灭吗？当泰拉奇尼听到有人这样说时，他难以抑制自己的愤怒。他说：“共产党以科学社会主义做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基础。我们对党的观念也通过列宁主义来源于此。我们以此教育全党干部。难道让我们改变它，即放弃它吗？谁敢这样说！”

在局外人看来，这场关于统一党问题的争论，这场支持范范尼还是支持萨拉盖特的尖锐斗争似乎纯属严酷的权力之争。然而事实上，其中包括某些更为深刻和更为痛苦的因素。当然，这里有个人野心问题。但主要的却是全党都在寻找本党的个性和处于失去这种个性的极大痛苦之中。不妨举

个例子：仅在几年以后，即在1982年，正是这位泰拉奇尼在回答电视台记者的问题时承认，里窝那的分裂或许是个错误。

由谁接班？

隆哥正在转向阿门多拉立场的惊人消息在党内左派中不胫而走。这位游击队司令、著名的强硬派隆哥正在变为取消派和改良主义者。许多人指责他对党的指导不稳定，组织越来越涣散。事实上，隆哥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他也知道主要障碍来自党内左派，也就是来自那些纯洁派、强硬派、革命学说的抽象捍卫者和仍然坚守斯大林主义的“沉默多数”。他们是阻碍党在意大利新社会中更灵活地行动的绊脚石。

就这样，当关于统一党的问题的争论已经平息，党内斗争似乎已经风平浪静的时候，隆哥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提出对统一党问题重新进行讨论。至于他本人，不久前他还谴责过统一党的提法，现在却声明表示拥护。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曾经哄动一时。

似乎共产党已变为某种拜占庭。当时经济处于危机之中，“中左政体”开始动摇，国家经历着从未有过的灾难，人们都在为前景担忧，而共产党人却仅限于讨论列宁主义的性

质问题。对局外人来说，这种讨论是抽象的，是为了逃避现实问题，但对共产党人来说，这却是决定党的现在和未来的至关重要的大问题。

当阿门多拉建议组成统一党时，他遭到大家的同声谴责。现在隆哥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却得到普遍赞扬和支持。英格拉奥十分清楚隆哥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即是为了置他于困境，於是他也表示同意。象往常一样，唯一提出异议的是泰拉奇尼。

然而，这仅仅是隆哥为英格拉奥和整个左派安排的第一次交锋。真正的机会是为准备党的代表大会而召集的中央委员会会议。隆哥知道英格拉奥是反对派，因此他提醒同志们注意，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代表大会将要讨论的提纲。他说，曾经进行过讨论并存在分歧。这是请英格拉奥站出来说话。那是个炎热的中午。英格拉奥起身证实：是的，是存在分歧。他说，现在最好把党内的讨论公之于众，如果有分歧也同时公布出来，以便同志们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归根结底，英格拉奥的要求有什么奇怪呢？在赫鲁晓夫下台时，难道不正是意大利共产党抱怨苏联人没有进行解释和没有把已经进行的讨论公之于众吗？难道现在不是把曾经要求苏联人做到的事情开始在意大利共产党内付诸实践的时候吗？难道应当只说不做吗？

英格拉奥讲话结束后，党的所有主要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走上讲台。他们一个比一个更激烈地攻击这位敢于要求公布党内讨论的叛逆者。这真可谓群起而攻之。说实话，这也

是一场不大体面的闹剧，已经超出意识形态的讨论，而近乎宗教裁判所对异教徒的审讯。

党的所有主要领导人中只剩下一人没有发言，他就是恩里科·贝林格。他为什么不讲话？他为什么还不走上讲台？有人敦促他，说他应该采取反对英格拉奥的立场。难道他想在这个时刻退避吗？显然，贝林格不大同意目前的做法。他不喜欢这种惩罚英格拉奥的气氛。他回绝了向他施加压力、敦促他发言的人。他决定不讲话，他感到没有必要讲话。他坚持没有讲。

在代表大会上旧戏重演。轮到英格拉奥发言时，他对隆哥的观点提出异议。至于公布内部讨论的问题，他说了一句流传后世的名言：“如果我对你们说我已经被说服了，那我就不是个诚实的人。”代表们的热烈掌声令人难忘。许多同志挥着拳头向他致意，好象党的真正领导人就是英格拉奥。主席团成员面色苍白，怒气冲冲，故意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不鼓掌。达维德·拉约洛后来叙述说：“掌声象风暴一样，拳头挥得老高，这表明在代表和客人中有人要强调英格拉奥表达的路线分歧。”

隆哥决定立即召集党的领导机构会议，大会讨论暂时停止进行。党的最高领导人聚在一起，他们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那样热烈鼓掌，那样高挥拳头？是谁组织了这种示威行动？是谁要分裂党？难道英格拉奥认为自己是马克思学说和正确路线的唯一代表吗？於是决定召集各代表团，向他们解释有人搞阴谋活动，企图破坏党的团结，那些出于好

心为英格拉奥鼓掌的人要小心，不要落入危险的圈套。这样一来，听众受到很大的教育，代表大会第二天照常进行，发言者一个接一个地走上讲台，批判英格拉奥。这次贝林格再不能逃避他做为领导人的义务了。他也起身发了言，声明不同意英格拉奥的意见。但他没有象其他人那样全盘否定英格拉奥。他起码在风格上有别于其他人。整个气氛不允许有不同的做法。对英格拉奥的批判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为了打击左派，使党改变方向，而把某个人说成魔鬼，把一切应当批驳的思想都归咎于他，使他身败名裂。代表大会结束时，英格拉奥被撵出书记处。贝林格也被发落到地方，担任次要职务——拉齐奥大区区委书记。贝林格自从入党以来，还是第一次受到这类公开的惩罚。而青云直上的却是阿门多拉的追随者乔治·纳波利塔诺。他既进入了政治局，也进入了书记处。除隆哥之外，他是党内唯一担任双重职务的人。于是人们开始猜测：他就是既定接班人？隆哥决定把党的领导权交给他吗？事实上，大家都知道，隆哥早就开始寻找自己的继承人了。他同许多人谈过这个问题，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他同拉约洛也谈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不想当终身书记，我想提拔青年干部。不过，我觉得目前任命副书记还不是时机。我要让更年轻的同志进书记处。”

“我懂了。”拉约洛回答说，“你想超越一代人，即超越坐过牢的一代人，也想超越我们这一代参加过抵抗运动的人。我们已经过时了吗？”

“也有点象你说的那样。”隆哥回答说，“阿门多拉、巴叶塔、英格拉奥同我的年龄差不多，应当提拔更年轻的人。”

因此，纳波利塔诺的青云直上被看成是一种安排。他将成为隆哥未来的继承人。

恩里科·贝林格当时正受到党的惩罚，他被流放，远离党的总部——黑店街，他根本不可能想到，他才是隆哥更喜欢的人。他刚刚被撤销组织部负责人的职务，好似栽了大跟头。他不可能知道，正是他担任组织部长时做的工作给隆哥留下了深刻印象。贝林格重新组织了党，重建了党的机构，完成了权力下放的艰巨任务。这项工作大家要求已久，但在以前任何人都未能完成，更不用说阿门多拉。他在做每项工作时都能解释其基本动机和原因，他有坚定的信念，不象许多人那样纯粹是为了表现积极或表明自己比别人能干。

贝林格解释说，党之所以需要改组是因为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十年内，有三百多万意大利劳动者出国谋生，一千三百万人从南方拥向北方。总之，几百万意大利人由农民变为工人。贝林格指出，工人阶级本身的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党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这些新工人不是来自工人家庭，他们同共产主义运动的优良传统没有任何联系。他们是新式工人，思想参差不齐，难以教育。他们需要一个以新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党，一个更清醒、更具有进取心、不那么官僚主义的党。看来老干部不能认清正在变化中的现实，他们在思想上墨守成规，不信任来自南方的新工人，受到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

隆哥不仅把贝林格看成是优秀的组织者，而且把他看成是善于进行理论分析的人。他认为贝林格是陶里亚蒂的最好学生。纳波利塔诺则是另一种人，他是在阿门多拉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总之，这位老领导人更喜欢贝林格，他的另一种品德也同陶里亚蒂如出一辙：在工作中能赢得同志们的极大尊重，甚至是顺从，但从未得到过多的同情。隆哥没有用很多的时间便决定召贝林格回黑店街，负责书记处办公厅的工作。

贝林格的晋升

1968年10月的一天，路易吉·隆哥突然患脑血栓，这时乔治·纳波利塔诺正在参加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有个同志走近他，让他立即给黑店街通个电话。纳波利塔诺起身去打电话。几分钟后他回来时面色苍白，对坐在身旁的达维德·拉约洛和毛里齐奥·费拉拉说：“你们留在这里。我要马上去医院。隆哥病了，看来很严重。”

隆哥还会康复，但他知道不能象从前那样工作了。因此必须抓紧时间，指定一位副书记。他首先叫来乔治·纳波利塔诺，对他说他将建议由他和贝林格担任这个职务。但他并没有隐瞒，他更倾向于贝林格。他说，1968年的学生运动方兴未艾，贝林格当过青年联盟的书记，更熟悉青年人的情况，党今后应该学会在青年中开展工作。但应由政治局首先提名。

隆哥召集政治局九个委员开会，提出了他们两个人的名字：纳波利塔诺和贝林格。不过，他使大家明白，他的倾向性在贝林格，几乎是非提名他不可。政治局表示同意，就是

贝林格吧。

现在轮到听取领导机构的同志们的意见。为此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以征求所有人的意见。不寻常的是，乔治·纳波利塔诺也被列入名单中。这就是说，他也应当参加领导机构内的民意测验：你们喜欢我还是贝林格？

领导机构的一致回答是贝林格。

翁贝托·泰拉奇尼说：“早就开始谈论隆哥同志的健康状况，以及采取措施部分减少他的工作的必要性，特别是要为他选择一个副手。正如大家所知，这一切都发生在1969年党的波伦亚代表大会上，那次代表大会实际上成为恩里科·贝林格的正名礼。在此之前，在隆哥的倡议下也交换过意见。我记得，有一天我遇到了科隆比，他受命征求领导机构成员的意见。不过，他已经提供了一种选择，这是由其他人在人数更少的范围内作出的，旨在把注意力集中到两个可能接替隆哥的候选人身上：一个是纳波利塔诺，另一个是贝林格。显然，领导机构的大多数同志选择了贝林格。现在我也不知道，同志们为什么看不上纳波利塔诺。至于贝林格，巴叶塔说的那句俏皮话可能是事实。他说，贝林格年纪轻轻地就加入了书记处。因为贝林格总不离陶里亚蒂的左右，陶里亚蒂赞赏他的能力、严肃性和个人品德。因此，尽管他不担任什么特殊角色，也没有什么特殊任务或职务，他却一直置身书记处，二十年来总在不断地吸收党在实践和思想方面的各种营养。”

当然，泰拉奇尼对贝林格没有多大的好感。他太象陶里

亚蒂了，而泰拉奇尼向来对陶里亚蒂没有多大的好感。

隆哥选择贝林格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英格拉奥受到谴责后，党内左派开始骚动起来。他们指责隆哥过分地受到阿门多拉的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现在，偏偏让阿门多拉的追随者纳波利塔诺领导全党就可能造成党的分裂，甚至全面解体，如果发生那种情况，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团结起来。相反贝林格却更容易为左派所接受；另一方面由于他同英格拉奥又不大一致，阿门多拉派也可能吞下这个苦果。此外，正是阿门多拉的追随者乔治·纳波利塔诺本人参加过全党民意测验委员会，他会亲身感受到，全党普遍倾向于贝林格。这样以来，新的副书记的产生不仅不会造成党的分裂，相反可能有助于党内两种不同思潮的会合。

隆哥叫贝林格来通知他说，在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他将建议由他担任党的副书记。但贝林格拒绝接受，说自己不能胜任，没有必要的经验，由其他贡献更大的同志担任这个职务更合适。隆哥一再坚持，贝林格仍拒不接受。

过了一段时间，隆哥在代表大会前夕再次召见贝林格。即使在他拒绝接受后，隆哥仍没有放弃建议他担任副书记的想法。贝林格一再拒绝是因为他充分意识到让他接受的责任的重大。但这不是隆哥一个人的意见，而是党的整个领导机构选中了他。如果说他本人感到力不能及，但党的看法却恰好相反并坚持让他接受。贝林格这时才接受了。几年后，当对1978年的选举失利问题发生争执时，贝林格对同志们说：“我没有为担任党的书记进行任何活动，也不会为留任而进

行任何活动。”

在代表大会上，阿门多拉的朋友们不大同意任命贝林格为副书记。他们说，隆哥确实想超越一代人，但这只有从长远来看才可能行得通。现在隆哥的病使大家感到时间紧迫，他的想法就行不通了。阿门多拉还年轻，为什么不考虑他，为什么不承认他的能力和经验？让阿门多拉担任这个职务，而贝林格在此期间作为后备力量会更趋成熟，这不是很好吗？

达维德·拉约洛曾决定制造一起惊人事件，他想走上代表大会的讲台建议由阿门多拉代替贝林格，并提请代表大会表决。他去见阿门多拉，向他说明自己的打算。拉约洛说，必须有所行动，有许多同志不同意提名贝林格。阿门多拉的反应非常生硬，他让拉约洛放弃这种想法，重新讨论已毫无意义。他说：“党的书记是团结的保证。只有活跃的思想和坚定的信念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克服各种对立而不使对立更加尖锐化的天赋。这正是我向来缺乏的品质。”就这样，路易吉·隆哥才能走上代表大会的讲台，隆重宣布：“新教皇诞生了。”^①

^① 原文为拉丁语

入侵布拉格

当隆哥召见贝林格，通知他说重大选择落在他身上，他就是党的未来领导人时，使党内掀起轩然大波的不仅仅是阿门多拉和英格拉奥之间的对立。当时还有两起事件好似强劲的旋风向意大利共产党人袭来。这就是青年人的抗议运动和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两起事件给隆哥造成了真正的创伤。在青年中爆发的抗议运动是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新生事物，共产党感到突然，毫无准备。这种社会现象超出了党过去通常用来解释现实的一切公式，但苏军入侵布拉格使隆哥受到的打击更为沉重，这不仅由于事实本身，而且还因为隆哥本人被卷了进去，他感到自己受到苏联人的嘲弄。

隆哥对布拉格之春曾表示过自己的深切同情。杜布切克进行的试验符合意大利共产党人的立场：每个国家应当寻找自己的道路，苏联的模式不是必须遵守的。如果说布拉格决定推行一种新模式，即一种被杜布切克称之为具有仁慈面孔的社会主义，对意大利共产党人来说，这就是一种证据，说明他们坚持必须走自己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的。在意

大利人同苏联人的争论中，布拉格之春加强了意大利人的地位。首先杜布切克使用的语言同意大利人一样，他也讲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文主义。有一天，巴叶塔特意来到隆哥家里，建议他亲自去布拉格一趟，用行动向杜布切克具体表示意大利人对他的支持。

“你总能想出些新点子。”据说，这就是隆哥当时对巴叶塔的回答。尽管巴叶塔后来否认隆哥说过这样的话，但类似的回答仍是可能的。总之，意共这位领导人被说服了，他前往布拉格，向杜布切克公开表示深切的同情，并对他正在进行的试验表示支持。

莫斯科同布拉格的紧张关系不断恶化。人们开始担心苏军入侵，担心匈牙利事件可能重演。巴叶塔率领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同苏斯洛夫和基里连柯举行会谈，劝他们不要重犯出兵布达佩斯的错误。苏斯洛夫保证：尽管布拉格的局势使他们担忧，但决不会出兵。巴叶塔无忧无虑地去克里米亚度假。不久，隆哥也来到莫斯科，他也是去俄国度假的。但他首先想会见苏联领导人。他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打算？想入侵布拉格吗？苏联人回答说，这绝对不可能。他们还说，他们刚刚会见了杜布切克，相互热烈拥抱，还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一切平安无事。

巴叶塔试图向罗马通个电话，想通报这个好消息，说事情进行得十分顺利。但打不通，因总机出了毛病了。然而，第二天从莫斯科来了一位信使，交给他一封信，信中写道：“应捷克斯洛伐克的权威同志的要求，华沙条约组织的部队

进入捷克斯洛伐克。”

与此同时，在罗马，苏联使馆打电话给意共书记处说，有条紧急重要的消息相告，如果隆哥不在，请一位负责同志立即到使馆来。阿尔曼多·科苏塔前往使馆。

苏联大使对他说，华沙条约组织的部队为保护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已开进布拉格。科苏塔感到震惊。当他从大使办公室出来时，他发现走廊里有位苏联同志正在哭泣。

巴叶塔说：“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前一天多次试图往罗马打电话也打不通。他们告诉我说，是总机出了毛病。我甚至没有时间考虑就接到了隆哥从莫斯科打来的电话。他问我：‘你知道出了什么事吗？’我回答说知道了。隆哥对我说：‘那你就回莫斯科来吧。我们必须今天见面。我再打电话给其他同志，共同研究一下怎么办。’”

当时已经有许多意大利同志在俄国度假，还有许多人正在来俄国的途中。所有人都接到电话说：必须立即收拾行李返回意大利。因为不能继续留在那里，即不能留在一个入侵了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里度假。这是隆哥和党的许多其他领导人最痛苦的假期。

巴叶塔说：“确实，一切都是痛苦的，非常痛苦。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是三十七年前，坐的是火车。这次离开时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几个月后，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代会上，他们要求我在讲话中删去有关捷克斯洛伐克的一段，我拒绝了。他们让我第三十八个发言。我讲话后掌声寥寥无几，但我觉得我不愧为那时的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

苏联人的做法使隆哥本人感到自己受了嘲弄。怎么能那样无耻地对他说假话呢？应当同如此不守信用的国家保持明显距离！对意大利共产党人来说，从那时起俄国已不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实现了所谓社会主义的国家。这话的意思是，意大利共产党人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完全是另一回事。

与此同时，青年人的抗议运动正在席卷意大利。历史上的人民运动都有农民或工人做群众基础。而这次运动的群众基础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而是学生，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法国，共产党象刺猬一样缩紧身躯，死守教条：如果不是工人，我们就不接受。青年学生渴望通过同工人建立联盟来壮大他们的运动。但当青年们来到“雷诺”工厂的门口时，发现大门紧闭。他们试图隔着栅栏同工人对话，以便说服他们，但没有成功。

在意大利情况就不同了。意大利的工业发展混乱不堪。这里存在着一种贝林格曾研究和描述过的现象：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抛弃土地，转移到北方工厂。他们居住在大城市的贫民区里，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处于那些被排斥的居民阶层和工人阶级之间。在他们的记忆中，从未有过什么社会主义，有的只是意大利早期的无政府主义，也就是那种促使他们的父辈占领土地和焚烧市政厅的无政府主义。学生运动通过这些新型青年工人打开了工厂的缺口，于是便产生了“热秋”：工人的罢工斗争极象过去的占领土地运动；在某些工厂里发

生的破坏活动极象过去火烧市政厅的行动。

多年来意大利共产党一直试图把北方工人阶级的经验教训传授给南方农民。现在却恰恰相反，在几天之内南方农民把自己的经验强加给北方工人。所以，意大利的学生抗议运动有其全新的特点：它区别于所有西方国家的学生运动，成功地扩大到工人群众之中，而且在其他国家的学生运动完全平息之后，它还延续了许多年。

面对这种现象，意大利共产党意见分歧、犹豫不决，既未能确定它的性质，也未能把它纳入自己的轨道。显然，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正在渗入到它的专有领地——工人群众之中。象往常一样，阿门多拉和英格拉奥处于对立的立场。阿门多拉要求仿效法国的做法：对那些吵吵闹闹的青年人紧闭大门，并对那个思想混乱的哲学家马居斯的理论开展全面的文化斗争。在法国，难道不是戴高乐将军少许提高嗓门说“够了，不要吵闹了”，青年运动便偃旗息鼓了吗？相反英格拉奥却说，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党不能对学生运动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而应当研究它，努力理解它，甚至吸取它的经验。

隆哥力图更深入地了解形势。他想同抗议运动的一位头头斯卡尔佐内谈一谈，于是便派人把他叫来。

今天斯卡尔佐内在回忆他同隆哥的会晤时这样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在历史上占有地位的人物能以尊敬的态度同几位正在一场刚刚兴起的运动中取得斗争经验的青年人进行交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他那纯真的好奇

心，渴望理解我们并设法使党以更积极的态度对待学生运动。总之，这位年老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努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然，由于学生运动提出的问题和使用的语言本身不同于政治家和那些具有工人运动经验的人，因此，他在学生运动面前也感到迷惑不解。隆哥想了解我们是些什么人，反映什么人的需要，为什么同各种原则，包括工人运动原则相对抗。他特别想了解我们强烈要求独立自主的原因。如果正规的工人运动能使隆哥坚定自己的选择，那么后来一些年的历史就会有所不同。然而，两个月后阿门多拉发表了那篇题为《在两条战线上斗争》的文章。我是在巴黎看到的，那是篇同意大利和法国的青年运动激烈论战的文章，对学生运动采取了关门态度，这篇文章为意共后来的一些立场打下了基础。”

斯卡尔佐内提到的阿门多拉的文章，发表在1968年6月的《再生》杂志上。阿门多拉指责党对学生运动和青年人的极端立场和无政府主义观点没有进行十分坚决的斗争。阿门多拉深信，意大利也同其他国家一样，学生运动仅仅是昙花一现。如果卷入学生运动，就会损害意共正力图使自己具有的新形象，即象民主政党一样对议会制度坚信不移的形象。并不是阿门多拉一个人有这种想法。拉约洛后来说：“许多人认为，青年人的狂热不会持续多久，并很可能变为一种对党和工会运动的货真价实的不信任。”然而，抗议运动持续的时间比预见的要长得多，它使当时的工会组织完全陷入混乱，并导致了党内危机，就是后来造成“宣言派”分裂的那种危机。在意大利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在意共的左翼形成了一股

指责它让步和搞修正主义的政治力量。

英格拉奥同阿门多拉的争论也涉及到这个问题。英格拉奥说，对抗议运动不应当采取断然拒绝态度，党应当关注意大利社会中的千百条小溪。新力量正在崛起，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这本身对革命就是一种推动力。不应当因为这些力量没有纳入共产党的轨道而把它们拒之门外，或装作视而不见。阿门多拉的讲话则完全是正统的，符合党向来谴责各种自发运动的传统，但他的讲话却没有正视现实。英格拉奥的观点更象是异端邪说，他承认党外还存在着各种革命力量。不过，他的观点却更加符合意大利现实。

支持英格拉奥观点的不仅有党内左翼知识分子，如平托尔、罗桑达、卡普拉拉、马格里等人，而且还有“沉默多数”，这些人曾不赞成谴责斯大林，不同意意大利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议会道路，支持苏军入侵匈牙利，现在又因党不同意苏军入侵布拉格而严厉地批评党组织。贝林格就是在这种激烈气氛中，在波伦亚代表大会上成为党的实际负责人的。隆哥交给他的确实是一个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

莫斯科文件

贝林格是在波伦亚发表的就职演说。大家都在门口等他，都想看看小恩里科如何摆脱困境。尽管他的年龄已经超过四十五岁了，大家却仍然叫他小恩里科。他的讲话完全符合他的气质，从使用的语言可以看出，他完全是个有分寸的人，没有表现出任何炫耀自己的意图。他将完全置身于隆哥这棵大树的庇护下来度过自己的“试用期”。在讲话中他逐条重申了隆哥的所有功劳。

他仿效的榜样是陶里亚蒂：讲话的节奏如同教授在讲课，时而加上几句考究的措辞，他特别注意使全篇讲话井井有条，就好象是在全神贯注地做填字游戏，力图把每个字母都放在恰当的位置上。他首先想向大家表明的是，他具有做党的首脑的一切品质，能够理解党内出现的各种不同要求，并能使这些要求完全协调一致。国际和国内形势正在发生变化，而且是巨大的变化，必须实行新政策以适应这些变化。事实上，贝林格在代表大会上承担义务就是第一次试图对革新要求做出回答。请看他的观点：

1、苏联问题。贝林格说，入侵布拉格不能被看成是普通错误，一起偶然事件。在东欧国家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问题。首先，那里存在着可怕的官僚主义，窒息了来自下层的任何形式的言论自由。其次，在各社会主义国家里民族沙文主义日益严重，这就是说，东欧集团是以强迫手段组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然要问，这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吗？或者正如英格拉奥所说的，只不过是“现存的社会主义”？后来苏联人回答说，他们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贝林格却反驳说，不是的，仅仅是“至今实现的社会主义”。正如他几年后在一次回答记者问题时所说，“谬论往往产生在用词问题上。”

2、抗议运动问题。不能象阿门多拉要求的那样，对他们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但是，也不能象党内左派认为的那样，新生革命力量能够独立地、随心所欲地、毫无领导地发展起来。是的，是需要他们发展起来，甚至独立自主地发展起来，但共产党应始终是这些新生力量的权威领导，使他们紧密地团结在唯一的历史集团周围。总之，对阿门多拉和英格拉奥各击了一掌。

3、社会主义问题。意大利共产党人向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拥有各类民主机构的多元化社会，其中国家机器是世俗性质的，而不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它必须实行多党制、允许宗教信仰、文化和新闻自由，无须对各种活动都实行官僚主义的集中。这同东欧国家的现实完全相反，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和党包揽一切的观念提出了疑问。

4、欧洲问题。这种多元化社会主义可以成为未来欧洲的会合点。不是指现在的欧洲，而是指一直延伸到乌拉尔山脉的欧洲。意大利人的多元化社会主义可以成为第三条道路，大部分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西欧和实行苏维埃制度的东欧（布拉格事件表明东欧存在着新的动荡不稳）明天可以沿着这条道路会合起来。

5、第三世界问题。这样的欧洲可以成为吸引第三世界国家的巨大磁铁，意大利甚至可以起到所有地中海沿岸国家的领导国的作用。地中海应当重新成为自由海，不再象现在这样存在着令人窒息的美苏舰队。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里发生了不是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这再次证明，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苏联人关于党包揽一切的观念已经不符合当前的形势。旧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应当由基于同社会民主党和新兴国家合作的新式国际主义来取代。意大利共产党人对使西方集团解体不再感兴趣，因此他们不再要求自己的国家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6、政府问题。“中左”体制已陷入危机。社会党人正在施加压力，以取得“更先进的平衡”，使共产党人以某种方式参与政府的活动。一部分天民党人甚至谈论同共产党人签订“宪政公约”。但目前还不是提出参加政府的时机，因为左派们已急不可待地要求推翻现政府，取得全部政权，正如纳托利在波伦亚所说的那样：“必须提出一种建立在工人阶级的领导权的基础上的取代，不仅是取代政府，而且是取代政权。”这是以“我们要求立即得到一切”为口号的抗议运动的反

响。所以贝林格说，党处于反对派地位的时候，只能同意与执政党就最重大措施进行协商。贝林格认为，社会党设法使共产党以某种方式参加中左政府的企图是不现实的。即使共产党人必须进政府，仅通过各党上层领导达成协议也不能如愿以偿。他说：“除各党取得一致意见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即组成或确立一个包括各种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新集团。这取决于各种强大的社会力量的斗争和动向。”

左派们对得出的结论不能感到满意，因为即便对青年人的抗议运动没有紧闭大门，但也没有象他们希望的那样敞开大门。然而，阿门多拉更不能说感到满意，特别是因为明确拒绝了社会党人提出的共产党人应象执政党一样向前跨步子的要求。阿门多拉认为，为了不使平托尔、纳托利和罗珊达等人不满，党要冒在有利时刻失去有利时机的危险。不过，当时他们还仅仅是隐藏在灰烬中的火种。而大火在另一个地方——莫斯科燃烧起来。

从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时代开始，几乎经过十年的准备，苏联人终于召开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意大利共产党人同意参加，但提出一个条件：只许谈和平共处和相互合作问题，不能对中国党进行任何谴责，不能以任何方式为入侵布拉格进行辩护。苏联人同意这些条件，贝林格无忧无虑地前往莫斯科。这是他作为党的副书记接受国际上的洗礼，一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有领导人面前的隆重洗礼。但也是一次暴风雨般的洗礼。大会开始后，立即就可以看出，苏联人不信守协议，他们谈论的问题正是已经许诺不涉及的问

题。他们的行为再次象大象一样难以纠正。

因此，贝林格发表了非常强硬的讲话，这是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在莫斯科迄今发表的最强硬的讲话。这不仅是一篇讲话，而且是一篇独立宣言，从中可以看出他那撒丁人的固执性格及愤怒情绪，他不能允许在确定了比赛规则后对手继续捣鬼。贝林格说：“我们拒绝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即似乎存在着一种适用于所有情况的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社会模式。”每个人在自己的国家里都可以自由地按自己的意愿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机以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搞社会主义。中国的毛泽东正在走入歧途吗？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一点也不想教训任何人，但其他人也不应企图教训我们什么。革除教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只有莫斯科才掌握真理，谁不遵循它的学说就被当成是异教徒送上火刑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贝林格说：“对持不同观点的人乱扣意识形态帽子的倾向应当结束了。在真理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还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力图以离经叛道来解释所有分歧，实际上这不仅会使分歧更趋尖锐，而且还封锁了理解产生这些分歧的客观原因和现实利益的途径。”

奇怪的是，当贝林格同对手辩论时，当他需要把问题如实地讲出来的时候，他的风格变得更加干脆利落，极少拖泥带水。显然，只有在他处于同周围环境相对抗的地位时，他的真正性格才能显露出来。

苏联人不是要谈布拉格问题吗？那好吧，贝林格在这个问题上也毫不含糊。他说：“那些事件的某些方面具有普通

意义，所以不能把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行动仅仅看作是一个错误，而应当看成是在诸如国家主权、民族独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文化自由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具有不同观点的结果。”这是对勃列日涅夫的讽刺，他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抛出了有限主权论。

在大会即将结束的时候，苏联人准备了包括四个部分的最后文件，重申了他们的所有观点。贝林格不想在文件上签字。文件上的观点同他的讲话完全相反。只有第三部分，也就是一般性论述的那一部分，可以签字。不过，还从来没有发生过一国共产党在莫斯科拒绝在文件上签字的事。

巴叶塔回忆说：“代表团从莫斯科向罗马打电话，向我们通报了情况。他们得到的指示是坚持自己的道路，按预订方针办：有可能修改的地方尽量坚持修改，否则拒绝签字，起码不在文件的一部分上签字。”

是隆哥决定采取这种坚定态度，而不是巴叶塔。事实上，巴叶塔对不在文件上签字非常局促不安。贝林格接到指示后才能在莫斯科宣布，意大利代表团只同意签署文件的第三部分。

“怎么能这样呢？”苏联人说，“第三部分是其他部分进行的一系列科学分析的结论。你们怎么能接受结论而又不接受对它的科学分析呢？”

这时贝林格实在憋不住了。他说他十分怀疑那种分析的科学性，照他看来只不过是堆砌了各种规劝和宣传词句而已。当装订好的文本交到他手里时，他在上面写道：“意大利

代表团只同意第三章。”

巴叶塔说：“没有在莫斯科决议的四个部分中的三个部分上签字，在当时与其说是政治勇气的表现，还不如说是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一种新方式的开端，对此我们反复考虑了不少时间。我是比较谨慎的人之一，我当时认为，或许把某些保留写入记录之后可以签字。正因为如此，当贝林格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尽管我们不想特别声张，我们领导机构的同志们还是去机场迎接他，以表明我们同意代表们在莫斯科的行动，他们在那里说出了我们认为必要的‘不’字。我也参加了欢迎的人群，这是为了使大家知道，这种强调我们独立自主的新方式也得到了象我这样的人的支持。尽管我不敢说，我们从一开始便参加了国际主义的长征，但我可以肯定地说，从很多很多年以前我们便参加了国际主义的长征。”

苏军入侵布拉格以后，巴叶塔曾同隆哥一起立即离开莫斯科。现在正是他产生了疑虑。这说明不仅割断同莫斯科的联系，甚至放松同莫斯科的联系也是困难的，痛苦的。苏联人对此是清楚的，不久前他们甚至在意共党员中散发小册子，号召加强同社会主义的发源地——苏联的无产阶级团结。后来，苏联人甚至威胁说，将支持一个由最可靠分子在意大利组成新的共产党。

开除宣言派

贝林格从莫斯科返回意大利不久，党内左翼同阿门多拉之间的矛盾又公开化了，但这时英格拉奥已经疏远了左翼。正当左翼创办的月刊《宣言》准备付印时，阿门多拉提前发起攻击，他在《再生》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党在反对学生运动的极端立场方面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软弱无力的。这种宽容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对右翼，即对他如此严厉，而对宣言派的极端分子却如此宽容？贝林格读了文章后明白，这是一个警告。但就在那几天阿门多拉得到证实：随着贝林格被任命为党的副书记，党内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英格拉奥的变化。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大家纷纷表态反对阿门多拉提出的政府党提法。

英格拉奥说：“如果我们设法拯救目前的极为严重的社会体制危机、支持一种照我们看来是造成目前困境的直接原因的政策的话，我们将是愚蠢的。”贝林格发言说，党的确需要最广泛的联盟，的确在为权力而斗争，但继续作反对派才是正确的。

“我们既要作反对派，又要有更大的影响。”贝林格说，“我们愿意同社会党力量和天主教力量达成适当的谅解。”阿门多拉又一次遭到挫败。

《宣言》第一期刊世了。党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布法利尼发表了一篇非常强硬和激烈的文章。但是这並不是对宣言派的谴责，也不是把他们开除出党。阿门多拉怒不可遏，不赞成贝林格在莫斯科采取的立场的元老们在他的激励下更加暴跳如雷。他们认为，贝林格采取的那种立场是不折不扣的反苏。因此，如果党不下决心反对宣言派，他们将创办亲苏报纸《列宁召唤》。如果党分裂为许多派别，每一派都以本派报纸为中心，那应由贝林格负责。宣言派事件喧闹一时，他们的月刊发行五万份，各党支部都对此议论纷纷。敌对党派的报刊也把宣言派事件作为主要评论题目。党授权一个委员会研究这个事件並提出应采取的措施。这是一条缓兵之计，以便使风波尽快平静下来。与此同时，贝林格，特别是英格拉奥对宣言派施加压力，让他们降低调门，以免为别人谴责他们是极端主义分子提供口实。

然而，阿门多拉在伤口上又捅了一刀。贝林格不是刚刚说过党应该继续作反对派吗？那好吧，他在《团结报》上发表文章，所用标题《政府党》本身就是一种挑战。为了使读者对文章的针对性一目了然，阿门多拉解释说，继续使用反对党的提法意味着感染上了左派幼稚病，这无异于说你们同宣言派站在同一立场上。现在甚至苏联也不再袖手旁观了。他们同党的元老们有联系，日益强烈地要求他们站出来，不仅反

对宣言派，而且要反对党的书记处采取的独立于莫斯科的立场。苏联期刊《十月》发表了该刊社长的一篇短篇小说，故事发生在意大利，说的是意共党员的事，其中有这样的话：“今天谁批评苏联谁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是一头蠢猪。”这篇小说的译文只印了少数几份在党的领导成员中传阅，但同样造成了很大的混乱。现在党好似一艘被逆流冲击的航船摇摇晃晃。乌戈·菲内蒂在他撰写的《意共内的反对派》一书中写到，罗马市委书记在审理宣言派事件的委员会会议上竟然冒出了这样的话：“罗马党组织已不可能有统一的领导了，在罗马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党”。不仅在罗马如此，在其他城市也如此。

中央委员会终于召开会议审理宣言派事件。纳塔发表了强硬的毫不让步的讲话。英格拉奥明确表示他不同意宣言派立场。元老们，特别是塞基亚表示怀疑，党是否被不坚定的领导所控制，他们不能象以往那样明辨是非。隆哥发言时主要谈到三个月前阿门多拉撰写的题为《政府党》的文章，他表示绝对不同意那篇文章的观点。显而易见，即使宣言派立场错了，也不能因此得出阿门多拉是正确的结论，他坚持的看法同样是错误的。

贝林格做出最后一次努力来拯救这批“异教徒”，他请大家从积极方面看待宣言派最近的立场：他们承认了一些错误，缓和了态度，否认想要进行派别活动。应该考虑他们的美好愿望，不要给予任何纪律处分，至少应该让基层讨论，听一听基层党员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大家接受了贝林格

的建议，在基层展开了讨论，但在许多支部这种讨论变为公开的殊死决斗，分裂的危险没有消除反而增加了。隆哥对贝林格发火了，因为他使他陷入了困境，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结束这种混乱局面。

这时罗萨娜·罗桑达^①提供了一个机会，她给贝林格写信说，只要把党的上层领导的辩论情况公布于众，她的小组就愿意停止出版《宣言》月刊。先前的鬼影又出现了：公布辩论情况，这同几年前英格拉奥提出的建议完全一样。那时英格拉奥曾受到批判并当众认错。党的所有领导人对罗桑达的信都感到十分恼火，他们怎么能够提出条件和最后通牒呢？中央委员会重新开会，纳塔又作了发言，宣言派终于被开除出党。

在把宣言派革除教门的那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贝林格一言未发。他知道，已无法避免采取纪律措施，但他多少把这看成是个人的失败。这样，党关闭了大门，失去了同他认为非常重要的、仍处于变动中的现实的联系。青年学生不是无足轻重的，对他们不能低估。但那时在党的领导人中，除他以外可能只有英格拉奥和年老的隆哥懂得这一点。其他人认为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小资产阶级叛逆主义分子。仅从表面上看，这些说法有的也是对的，但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不能用老框框对待他们。隆哥是第一个懂得这一点的。早在一年半以前他就说过：“学生运动不能被

^① 罗萨娜·罗桑达，从意共分裂出去的“宣言派”领导人之一。

看成是现存的许多宗派运动中的一种。学生运动将同意大利革命运动相结合，并将成为它的一个方面军。”

然而，党内的老权威、熟读马列主义的智囊人物，包括看上去最开明的阿门多拉都不信任那些没有写进他们的法典中的青年人，因为他们不属于工人阶级。正像贝林格的兄弟乔瓦尼说的：“一九六八年的爆炸性事件使意共惊慌失措，有时甚至混乱不堪。为什么会这样呢？大概可以指出三个原因：首先是某种政治上的和理论上的整体主义，根据这种理论，一种可以承认为是革命运动的运动，对我们来说，必须由工人阶级的历史力量或共产党本身发起；第二是对学校、新闻和文化界掀起的群众运动的规模不理解；第三是低估了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深刻程度。例如对知识分子大量失业这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新表现模糊不清”。

全党对现代工业发展所造成的后果思想准备不足，在经济奇迹时代，陶里亚蒂说过，意大利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重建国家，但事实做出了相反的回答，意大利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之一。只有英格拉奥认为，中左政府可以保证意大利资本主义获得新发展，但他受到阿门多拉甚至全党的攻击。

贝林格接任领导的这个党，认为在雅尔达备忘录发表以后取得了非常巨大的进展，但它还没有意识到一项最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即认真研究意大利新现实及影响现实的各种力量。

举棋不定

开除宣言派以后，党象一个做过大手术的病人，从昏迷中渐渐醒来。它采取过各种行动，但似乎从未象这次这样被动过。一直存在着的对贝林格的不信任情绪现在又增长了。工会和青年组织都很活跃，而党似乎被拖着走。范范尼也跃跃欲试，他觉得良机已到，于是向公众表明，好像只有他才能收拾目前的乱摊子。

在“热秋”的高潮时期，范范尼在罗马会见了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马丁，要求他支持他的计划，把天主教民主党和国家的实权重新掌握在自己手里。马丁同意范范尼的计划，范范尼要求他提供一百万美元的资助。但是这一要求遭到美国政府的拒绝，尼克松在报告上批示：“我们不想介入这类事情”。实际上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反对出钱，他们认为，如果需要给意大利钱的话，也不应该通过天民党人、最好是直接给意大利情报机构。不久人们就看到了这样的现象：防务情报局越来越不象一个国家机关，它推行自己的政策，制定可疑的计划，出现了一系列臭名昭著的阴谋事件。

乔治·本韦努托^①说：“十一月十九日，警察安纳鲁马遇害那天晚上，我们被多纳特·卡廷紧急召集在一起，他神情极为不安地对我们说，我们正处于危机时刻的前夕，政变一触即发，如果不赶紧采取措施制止事态的发展，就很难避免军人上台。”形势就是如此紧张，多纳特·卡廷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他是劳工部长。本韦努托承认，多纳特·卡廷的话给在场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拉马^②把多纳特·卡廷的话转告给贝林格后，他一连几天夜不能寐。这以后不到一个月，就在米兰喷泉广场发生了炸弹爆炸事件。

战后意大利生活中最为动荡不安的年代开始了。情报机关不仅另搞一套，而且相互勾心斗角，特别是反对其他国家机关。鲁莫尔作为政府首脑能够对形势作出正确判断，他清楚知道，局势不仅越来越难以控制，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他提出辞职，但未被接受。三个月后他再次提出辞呈，希望别人接替他。他公开解释说，他太疲劳了。但辞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工会要发动总罢工。从未见过一个总理因为罢工辞职的，更何况罢工尚未开始。是什么原因促使鲁莫尔急急忙忙收拾行李呢？

贝林格对这些事件进行了长期认真地思考。三年后，当他提出历史性妥协时他说，这个思想是来自对智利政变的思考。也可能是这样的，不过首先来自对意大利神秘事件的长期痛苦思索。当范范尼又一次主动同意共接触，以便在即将

① 乔治·本韦努托，意大利劳工联盟总书记。

② 拉马，意共领导机构成员。

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得到意共的支持时，贝林格确信这或许是最小的弊端。最好是支持莫罗，因为他提出过重视意共的战略。然而，如果范范尼是天民党的候选人，转而支持英格拉奥从前的主张也是可行的。但阿门多拉将大发雷霆，因为就在上次总统选举中，他曾说服全党投萨拉盖特的票，而没有象英格拉奥主张的那样投范范尼的票。

但是，贝林格没有把宣言派的态度考虑进去，《宣言》月刊现已变为日报，而且发行量相当可观。党内有人向他们透风说：“你们看，贝林格正考虑投范范尼的票”。于是宣言派发起了一场非常猛烈的宣传攻势。在他们的报纸上辟出《范范尼言论录》一栏，每天刊登一篇他的文章，把这位教授在法西斯时期撰写的所有文章都发表了。这些文章全是颂扬墨索里尼的政策及其组合国家^①的。党的高级领导中反对贝林格的人幸灾乐祸，他们高声朗读范范尼的文章。党的基层情绪低落，他们受到宣言派积极分子的讽刺挖苦，怒不可遏。贝林格被迫退步了，只好先投泰拉奇尼的票，然后走着瞧。范范尼第二次失去了他本来以为可以依赖的意共选票。不仅如此，在第一轮选举中他甚至未能获得他自己党的全部选票。在党内他有许多敌人，打暗枪者使他彻底失掉当选的可能性。贝林格举棋不定，不知所措。怎么办呢？他想只有一个办法：范范尼落选后，天民党将提出莫罗作候选人，那时投莫罗的票更好。问题是要有耐心，等待着莫罗的出现，但莫

^① 组合国家，法西斯国家的组织形式，宣称它是工人和资本家利益的代表者，是“各阶级合作”的组织。

罗一直没有露头。

共产党议员开始感到不安。他们意识到在这场较量中有失败的危险，他们要求尽快做出决定。达维德·拉约洛说：“现已陷入僵局，后来出现了利用天民党的分裂选举南尼的可能性。拉马尔法起初也声明同意。意共当然也同意南尼当选，但还希望天民党的多数至少推举莫罗作候选人，因为在莫罗身上可以达成一种政治上饶有趣味的一致。我记得，那时不仅我，许多意共议员都觉得继续等待是徒劳无益的，我在蒙特齐托里奥举行的共产党议员全体会议上发言，敦促就在那天晚上决定投票选举南尼。贝林格本人对我说，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他要同社会党人磋商。第二天上午，拉马尔法不再同意南尼作候选人。我们错过了第一班车。”

意共党内的这种分歧存在已久。以阿门多拉为首的主张搞世俗党联盟的人坚持投南尼的票；赞同与天民党人会晤的人期待着莫罗赴约。就这样共产党人踟躇不前一直到最后，而与此同时天民党人推出了利昂纳，并在阿尔米兰特^①的支持下当选了。

拉约洛评论说：“这次总统选举带来了许多严重后果：提前大选和右翼政府。”贝林格多次失算，对他的疑虑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现在面临提前大选，怎么办呢？就在这时隆哥决定完全退居二线，他接受了党的主席的荣誉头衔。贝林格成为名符其实的书记。在人们眼里，他还是个青年，他是非常有前途的，比所有的人都勤奋，但他还没有结束学

^① 阿尔米兰特，意大利社会运动，即新法西斯党总书记。

业。对党内许多人来说，他还没有通过晋升的最后考试。大家都在观察他，看他如何摆脱困境。贝林格感觉到这种考查他的气氛，对此他感到烦恼，他觉得自己并不比别人不成熟或缺乏修养。

在任命他为书记的代表大会上，他的第一个行动是改变在政府问题上的态度。不仅时机已到，而且他意识到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使阿门多拉及其追随者站到他这边来。他干得非常谨慎。他不说共产党人想要进政府，但他说，在两种情况下共产党参加政府是可能的：“或是需要对付使民主的命运陷入危难的反动势力的进攻；或是存在着实现革新纲领的条件。”这就是贝林格的风格：他在肯定某件事情的同时似乎又要否定它。实际上他的意思是，共产党人将同意进政府。

四年来贝林格一直处于隆哥的保护伞下，大多数公众对他还不太熟悉。现在要举行提前大选，他只好抛头露面，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就从这时起他开始成为意大利生活中的一个主要人物。过去他的战绩不多。《晚邮报》以醒目的标题《政绩贫乏的贝林格》发表文章说：“党内所有人都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这是对他的一次火的考验，不仅他的朋友，连他的对手也是这么看。就在一个月前他才成为意共总书记，现在他要对付战后最艰难，最捉摸不定的大选。他要在近几个月内使基层接受坚定明确的九十度大转弯，而基层过去一直相信，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掌握政权。对共产党来说这是第一次宣布放弃革命，想进政府。贝林格表示要尊重自由和民主，

但他的话别人能相信吗？这位共产党领导人不得不在他过去一直拒绝出现的舞台上进行活动。这就是说他应出现在广场上，向公众发表演说，他的形象风度不应亚于他的前任陶里亚蒂和隆哥。因此，这次竞选和五月七号的选举结果对他作为政治领导人的能力将是全面的考验。如果他能通过考验，他将受到人们的尊崇，在今后许多年内任何人都不能取代他；如果他失败了，短时间内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但随后暂时平息的斗争又会激化。

火的考验

贝林格头几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是非常成功的。他一扫老一辈共产党领导人那种呆板的面孔，看上去象是一个可爱的柔弱腼腆的青年，话音轻微而柔和，妇女选民认为他是杰出的，异常迷人的。“他不够严肃！”他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上露面后，党内的对立派就这样评论说。但贝林格偏偏不愿意摆出一幅严肃面孔，不想运用民粹派的演说艺术，高声讲话的人使他感到厌烦。相传，有一次，他的一篇电视讲话录音后他要求重录，“为什么？”录音师问他。“因为我觉得讲话声音太高了”，他回答说。“相反，你的声音有点弱”，录音师说。“那很好”，贝林格感到满意了。

人们信任他正是由于他在发表政治演说时的谦恭态度；他不是向公众大声疾呼，而是象小学教师耐心地给学生讲解课文一样。当人们问他对某个问题的看法时，他从不回答说：“对这个问题我认为……”他的回答可以说是教育性的：“对这个问题我们党说过……”，“从我们党的文件可以看出，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我们党的最新决议指出……”。

他从不以个人名义坚持某种看法。甚至在集会上、在电视上他都力图使自己微不足道。当他听到游行队伍高呼“葛兰西、陶里亚蒂、隆哥、贝林格”时，他感到非常厌烦：他说，请不要那样呼喊，应立即结束对党的领导人的崇拜。

英国记者彼得·尼科尔斯在竞选运动中一直注意观察研究贝林格。他说：“多年来，这位共产党书记的奇妙品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书记这个职务随着他的任命使他几乎罩上了某种光环，具有了不属于他个人的威望。当他公开露面时，人们都想看到他，力图理解他，老年人流出了眼泪，一些人想要摸摸他，看他是否同其他人一样，或说同其他党的书记一样是血肉之躯。这种奇妙的敬畏不存在于福拉尼^①，马拉戈迪^②和拉马尔法身上。贝林格的人格助长了这种非凡的感情。有时似乎觉得他对周围的事情并不感兴趣。在米兰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他作了一篇非常明确的报告，但他对听众是否注意到他报告的特点似乎并不关心。报告结束时听众的欢呼看上去使他恼火，似乎是要抑制听众的喝采，他认为自己是微不足道的，正如他的难以置信的瘦弱体格那样微不足道。”

贝林格光临意共阿奎拉省委的形式也给彼得·尼科尔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身穿灰蓝色大衣走进来，坐在一张木桌旁，点燃一支香烟后只讲了两句话：一是他很高兴把他

① 福拉尼，曾任天民党政治书记，全国委员会主席，在政府中担任过外长和国防部长。

② 马拉戈迪，意大利自由党前总书记，自由党国际名誉主席。

放到竞选名单的第一名；二是他们(省委同志)应该记住，这次选举中还有一些选民犹豫不决，这意味着，为了给党争得更多的选票，大家应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顽强地工作。这就是他要说的一切。我深信，一位英国政治家在类似的场合也不敢只讲这么少的话，那怕他是那类不象意大利政治家那样夸夸其谈的政治家”。尼科尔斯认为，贝林格的谈话方式“是一种反对夸夸其谈的极端形式，几乎可以成为一种新的演说风格”。然而在党内，别人却批评他没有吸引力，不是一位一呼百应的人。他的新闻处负责人用争辩的口吻解释说：“对大家进行政治教育，树立一种新的风格，这是他的工作的组成部分”。

阿门多拉也在召开群众大会。他在罗马说，共产党早就已经是政府党了，这似乎是要提醒贝林格，他的建议他早就提出过，而且遭到大家的反对。阿门多拉对那些天民党朋友恼火了，因为他们设法使人们相信，共产党人准备选举范范尼为共和国总统。天民党的朋友是英格拉奥，但事情还涉及到贝林格，因此提醒他注意那场仍使全党记忆犹新的政治失败。

阿门多拉及其朋友对贝林格干的事情并非深信不移，他们有一种印象，似乎贝林格太亲近英格拉奥。他确实接受了阿门多拉关于政府党的提法，但却是在一个错误的时机接受的，因为政治轴心现已右摆，现在提出进政府的要求听起来好似一种抽象的假设。白白浪费了两年时间，应该在秋天工运高涨时采取行动，因为，要求参加政府的行动应在有力量

的时候采取，而不是在刚刚从选举利昂纳为总统的败局中争脱出来的时候采取。此外，在这种时刻谈论共产党人进政府只能使温和阶层惶恐不安，促使他们去投右翼党的票。左翼同志，特别是不少同情宣言派的人更是疑虑重重，他们指责贝林格的建议只能带来一种结果：扰乱基层的思想，提高天主教民主党的威信，从而增加它的选票。

不仅如此，对贝林格的批评还涉及到党的组织问题。他多次许诺的革新究竟在哪里？选举党的领导机构和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办法还是老一套：由少数几个同志提候选人名单，每个人都提忠于自己的人，象过去一样经过平衡达成一致，不得罪任何人。难道贝林格认为这样可以平息风波，避免公开冲突吗？这一点或许做到了，但是他应该意识到，他这样做同他一直斥责的其他党的作法毫无区别。

总之，内部矛盾并没有消除，如果不是大选临门，可能变得更加尖锐。现在一切取决于选举结果：如果大选获胜，贝林格可以轻松地喘口气；但如果大选失利，他就得不到安宁。所有人，包括党内同志都预计共产党人在大选中将受挫。形势是困难的，人们惶恐不安，到处散布着对共产党参政的可怕气氛。天民党人要求举行提前大选，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晚邮报》写道：“党内的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等待着贝林格经受5月7日的考验。这就是为什么这次竞选运动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场争取群众领袖地位的斗争，而且是以全部政治生涯为赌注的较量，他的生涯是用顽强的毅力和聪明

的技巧开辟的；二十六年来，他日复一日地，从八点到十三点，从十六点到二十一点，在黑店街幽暗的写字台后工作。”

党内外一致预计的大选失利并没有出现。真正令人惊奇的是共产党赢得了更多的选票。贝林格异常镇静，他命令彻底整新党的总部，打扫廊道，粉刷办公室，安装快速升降电梯和在美国电影中常见到的那种威斯丁霍斯公司生产的喷泉式灯具。女职员今后都要穿蓝围裙，而这时意大利各地的办公室女职员都有权按其所好穿戴。贝林格年轻时说过，当你仔细研究一个共产党人时，你会发现他也是个哈里发。他指的共产党人包括他自己。现在他可以感到一点欣慰，因为选举结果给所有批评他的建议的人做出了回答。他接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党的历届代表大会的召开不仅仅是为了决定明天和后天做什么，而且是为了制定长远的政治路线。我们已经把建立新的议会多数作为客观上成熟了的问题提了出来，今后一些年内，这个问题将是衡量意大利政治和社会的尺度。”他请批评他的同志看得更远一点。

受非难的“妥协”

党主席路易吉·隆哥在他的办公室里准备好了射向阿门多拉的箭，即1973年底出版的《抵抗运动中的意共领导中心》这本书。这是一本文件选集，但大家都清楚，出版这本书的意义是对阿门多拉提出警告，使他意识到他永远不会当上党的书记；使同志们终于明白，阿门多拉的灵魂上有过什么罪过。

从这本书可以看出，在战争的后期，当时陶里亚蒂在莫斯科，隆哥在米兰领导游击队斗争，阿门多拉在罗马却公开反对陶里亚蒂可以被看成是党的实际领袖。不仅如此，阿门多拉还力图使他所在的罗马成为党的中心，隆哥也要服从于这个中心。当陶里亚蒂从莫斯科要求大家支持巴多利奥政府时，阿门多拉拒绝同资产阶级搞任何合作，怎么谈得上政府党呢？当米兰的同志提出应同其他各种反法西斯力量合作，同巴多利奥妥协时，来自罗马的回答是“不”，不能搞任何妥协，甚至社会党人也值得怀疑，因为他们不接受真正的阶级斗争，尽管在佩尔蒂尼等人的领导下社会党人有时表现得比

共产党人还左。总之，在那个时期，罗马党组织在阿门多拉的影响下，采取了极为强硬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立场，他们大谈特谈革命理论，但并不把理论变为实际行动。罗马当时还在德国人的占领下，为什么阿门多拉不采取行动组织抵抗运动？阿门多拉回答说，因为罗马不存在进行游击战争的“舞台”，即适宜的环境。然而，阿门多拉却对陶里亚蒂从莫斯科派来的指导党的工作的同志开展了游击战，把他们统统排斥在一边。

这是一次可怕的打击，阿门多拉声名狼藉。隆哥的书向全党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在选择党的书记时没有提名阿门多拉而选择了贝林格。显然，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到此应该结束了。

隆哥的书出版时，贝林格刚刚提出他的新建议——历史性妥协。贝林格解释说，智利政变再一次表明，左翼力量即便取得了百分之五十一选票，也不能单独执政。否则，有爆发国内战争的危险。各种人民力量，包括天主教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应该长期合作。在三篇长文章的最后几行他才使用了历史性妥协的提法：“国家各种问题的严重性，日益迫近的反动势力的冒险行动，以及国家需要终于开辟一条可靠的经济发展、社会革新和民主进步的道路，所有这一切使实现包括和代表意大利人民绝大多数的各种力量的可以称之为新的伟大的历史性妥协变得日益迫切和成熟起来。”

路易吉·平托尔首先发起了猛烈攻击。他在《宣言》上发表文章说，我们知道，当贝林格说拥有百分之五十一的选票

也不能执政时针对的是谁，他针对的是阿门多拉及其世俗党联盟的思想。但基层怎么讲呢？起初你们对他们说革命不会再发生，等待未知的时机是无益的。现在你们又对他们说甚至获得百分之五十一选票也不能进政府。显然你们把基层看成是盲从的。贝林格说想要同一个新的天民党合作，但这不是真话，天民党就是这一个，你们正是要同这个天民党进行合作。“这是一种没有回礼的给予，”平托尔说，“对天民党有利的，它都欣然接受了，所有其余的，它都舍掉”。几天以后《宣言》又指出，这即是说甚至不要再讲意大利的社会主义道路了，“从此只举民主取代的旗帜，而不举左翼取代的旗帜了。”需要记住这种提法，因为七年以后，当宣布历史性妥协结束时，贝林格提出的新转折使用的正是民主取代的提法。

党内的不满情绪达到难以抑制的程度。基层对贝林格的建议绝无好感。隆哥本人不得不出来和稀泥。他说，贝林格提出的政策是正确的，但历史性妥协的提法是不幸的，容易产生误解，最好采用历史性集团的提法。阿门多拉评论说：“这同我的政府党的提法毫无区别。”但贝林格究竟讲了什么离奇的东西才在党内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如果仔细看一看就会发现，从根本上来讲，他提出来的政策同陶里亚蒂的完全一样；天主教势力同社会主义者势力的合作，旧的逐步进化的民主。有什么可引起争议的？隆哥本人提出异议时也仅限于反对历史性妥协这种提法。那么这仅仅是措辞的问题吗？显然不是，在措辞问题上不会出现如此强硬的反对派的。

我认为，贝林格、隆哥本人和党内其他许多领导同志长期不得其解，为什么基层如此强烈地抵制贝林格的政治建议。多年来他们一直抱怨“基层不理解”。但基层为什么不理解？得到的回答是，基层有宗派观念，受到宣言派影响，期待着革命。这样解释是为了寻求自我安慰。指责基层不理解，为的是避免归罪于自己。把基层看成是一群需要教育，没有能力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和固执的人的陈腐观念死灰复燃了。这项计划是完美的、成功的，预见了一切可能，并能解决一切问题，怎么能允许这样一项运筹出来的政治计划落空呢？

然而，基层本能地拒绝接受贝林格提出建议时的僵硬的概括方式。基层党员觉得用这种方式搞政治是不好的。各级领导解释说，因为他们仇恨天民党。但不仅如此，在陶里亚蒂时期他们曾吞过其他苦果，甚至吞过同君主政体合作的苦果。但贝林格的建议太绝对了：革命不行，争取百分之五十一的多数也不行，只有同天民党达成协议才能执政。这不是有点失去男子汉的气概了吗？事实上，其他一些政党三十年来一直同天民党一起执政，没有任何作为。然而，即便它们也从未声明说，没有天民党它们任何时候也不能执政。

陶里亚蒂一直说要同天民党人一起进政府，但从未以哀求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让我们同你们一起执政吧！否则我们不知道、也没有其他事情好做。陶里亚蒂总是指出许多出路，甚至在没有出路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从未对基层说过：要么吃天民党的残汤剩饭；要么跳楼自杀。这是一个计

谋吗？不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是政策。搞政治不能只留一条路，而把其他所有可能性和出路都关死。这一点基层也不接受。

贝林格总想使一切都井然有序，每样东西都放在特定的柜子里，对他来说一切都应预见到，一切都得按规则办，这既出于他的抽象思维习惯，也出于他的知识分子的诚实，他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但这就把党囚于牢笼，拆掉了所有过河桥，使党背水一战。正象一位特别自信的将军，深信自己总是无往而不胜，才关闭了所有的退路。

不可否认，贝林格有这个弱点，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身上都有这个弱点，他们是从黑格尔那里直接继承下来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甚至应该是合理的。贝林格没有接受，也没有预见到可能干扰他的头脑里的计划的一切。出乎意料的事情使他心神不安，一切能够干扰他的计划的人和事都是恶意的。如果说贝林格认为，陶里亚蒂的政策是正确的，並从中引伸出历史性妥协，那末他赋予历史性妥协摩尼教性质：这是好的，其余全是坏的。

他的坦率、过于天真的诚恳为天民党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它立即意识到这一点，並要尽可能利用它。天民党人的逻辑很简单：你们不是需要我们吗？没有我们你们不是不能进政府吗？那很好，现在我们告诉你们在什么条件下我们才能开始考虑你们的建议。这样就开始了对于贝林格无休止的考验：你应该进一步脱离苏联；你应该声明支持北约组织；你应该说你喜欢这个组织，它给了你更多的自由；意共党内

应该更加民主化，我们不喜歡集中制，这一点你也应该改变。历史性妥协渐渐地使贝林格变为一个要通过大学各科考试的学生：考试一门接一门，随时都有通不过的危险，不知何时才能得到毕业文凭。

阿涅利登场

贝林格提出历史性妥协倡议时，出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形势：意大利私人企业家的典范詹尼·阿涅利认为，共产党人参与执政可能拯救国家（包括他的菲亚特汽车公司）。

他说：“仅拥有百分之四十选票的天主教民主党却控制意大利权力的百分之八十，这是不行的。”意大利私人企业家开始意识到，他们托以家务的天民党，起初好似一个能干的女人，她虔诚善良，全心全意，不惹事生非，可是突然发现，她是一个淫荡无羁的坏女人：她变得懒散懈怠，家里到处杂乱无章也不去规整，她什么事也不能干了，此外，她比一个奢侈女人花得还要多，钱什么时候也不够花（现在又开始偷了），家庭预算简直是一场灾难。需要一个有头脑的女管家，对她进行一点限制，把家里整理一新。社会党这位女管家无济于事：她比女主人还任性、腐败、奢华。唯一可行的是试用一下共产党，恰好在那时（1973年末），它开始谈起历史性妥协来。

乌戈·拉马尔法也得出了与詹尼·阿涅利同样的结论：

需要限制天民党的权利。它的关系户和所操纵的地方日趋繁多，它已变为吸血鬼，使国家经济肌体日益消瘦。要求天民党自愿放弃用国家的钱喂养的关系户就等于要它自杀，它任何时候也不会那样做。它身边需要有人监督，阻止它继续肆意挥霍国家钱财。

阿涅利和拉马尔法多次会晤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怎么办呢？从根本上说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在下次选举中使天民党的选票有所下降，二是说服美国人，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人进政府不会造成他们想象中的那种灾难。这两个问题乍看起来是不能克服的，但仍然是可以解决的。

第一个问题，即使天民党人选票下降问题，拉马尔法认为可以用下述办法解决：成立由詹尼·阿涅利为候选人的世俗党联盟参加竞选，可以使天民党减少一二百万张选票，至少也能得到象古列尔莫·詹尼尼当时以“非党人士”参加竞选得到的那么多选票。意大利人对现状已感到非常不满，对各党的政治赌博都感到厌烦，组成有效率的、反腐败的和严肃的世俗党联盟参加竞选，可以从各方争得选票。

第二个问题，即使美国人同意共产党人进政府的问题，在意大利只有一个人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他就是詹尼·阿涅利本人。这对他来说并不困难，只是要等待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正象阿涅利对拉马尔法解释的那样，未来的美国总统将改变许多事情，或许也将改变美国对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态度。

谁将是美国的未来总统呢？在那时世界上仅有少数几个

人知道，他们当中就有詹尼·阿涅利。未来的美国总统很可能是某个叫吉米·卡特的人，当时人们对她几乎一无所知。早在1973年末和1974年间，这两桩相距甚远的事件——意大利的历史性妥协和卡特通向白宫的道路——已经紧密地联系起来。

还有三年才举行美国总统选举，詹尼·阿涅利当时是怎么知道美国未来的总统是卡特的？为什么他对卡特上台后事情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么有把握？显然，这因为他同两个决心改变美国和世界事物的人来往甚密。这两个人是戴维·洛克菲勒和兹比格·布热津斯基。

洛克菲勒对基辛格推行的外交政策感到担心，这种政策恶化了美国同欧洲和日本的关系。在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国之间存在着贸易战的危险，而这对美国实业界是不利的。应该采取另一种政策，把贸易战制止在萌芽状态，并代之以密切的合作，以瓜分世界市场。美国、欧洲和日本应该找到达成协议的基础，在指导世界经济方面相互合作。只有这样经济才能持续繁荣。

提出这种“三方”合作的全球理论的人是波兰血统的学者布热津斯基，他很快成为洛克菲勒的政治顾问。需要创立一个庞大的，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界、政治界和理论界人士的国际机构。这个机构应该成为真正的世界性影子内阁，能够对世界各国的政治决定施加影响，并使这些决定有助于改善世界贸易关系。

1973年10月23日，在东京的一次会议上，洛克菲勒影子

内阁正式诞生了，取名“三方委员会”。不言而喻，詹尼·阿涅利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在国际上，三方委员会决心成为西方世界经济的真正指导机构；在美国国内，它提出的任务也是非常令人注目的：为美国提供一位自己拥戴的总统。布热津斯基本人考虑再三，已经找到一位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出席了东京会议，他就是吉米·卡特先生。

给布热津斯基留下强烈印象的是，这位在佐治亚州发迹的花生农场主，就在那个时候在布鲁塞尔和东京设立了两个代表处。是否还有比这位同时在欧洲和日本开设代表处的美国企业家更具有“三方”头脑的吗？吉米·卡特确实是一位意中人。

布热津斯基亲自向吉米·卡特交待任务，对他进行极严格的政治训练，向他贯输应该具有的思想，教他应该说的话，让他牢记应该采取的态度。总之，他变为美国未来总统的不折不扣的皮格马利翁^①。詹尼·阿涅利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知道美国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的人之一。他本人是三方委员会成员，对洛克菲勒有很大影响。卡特成为美国总统时，布热津斯基当然将负责美国的外交政策。那时阿涅利将施加全面的影响，使其美国朋友相信，需要让意大利共产党人进入政府。美国人当然要求他做出一些保证，连这个问题拉马尔法也解决了：阿涅利在世俗党名单上当选后，将成为新政府

① 据希腊神话，皮格马利翁为塞浦路斯国王、雕刻家，热恋自己所雕刻的少女像。爱神阿芙罗狄蒂使雕像复活，报答了他的爱情。

的外交部长。对美国人来说哪里还有比这更可靠的保证呢？
因为外交部长本人就是三方委员会的成员。

就在1973年10月，三方委员会在东京举行首次会议的时候，恩里科·贝林格在《再生》杂志上连续发表三篇文章，提出了历史性妥协的主张。时间的吻合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权 力 之 争

战后初期，在意大利曾出现过—个奇怪的党，天主教共产党。任何人都没有重视这些想把魔鬼同圣水融为一体的古怪的年轻人。只有陶里亚蒂希望这些年轻人能够成为一支同天民党决裂的真正力量。这个党的最主要代表是佛朗哥·罗达诺和维托里诺·基乌萨诺。那次政治活动流产后，他们分道扬镳了。然而今天他们似乎又言归于好了：维多里诺·基乌萨诺成为詹尼·阿涅利的最主要顾问之一；佛朗哥·罗达诺则成为恩里科·贝林格的顾问之一。这两位前天主教共产党领导人今天为两位想要改变意大利事务的人开辟了联系渠道。但首先要说服各自一方：阿涅利应说服企业家；贝林格应说服自己的党。这并非易事。

阿涅利立即找到了自己需要对付的主要对手是蒙特爱迪生公司的董事长切菲斯。他同范范尼和皮科利关系密切，是天民党经济狂欢节的主角。由于他聪明过人、意志坚定、並掌握巨大的经济政治实权，因而是个危险人物。大家都知道，切菲斯在新闻界把目标对准了《晚邮报》，阿涅利应该设

法阻止这家报纸落入他的手里。

切菲斯还力图成为工业家联合会主席，如果成功，私人企业家将受到天民党的束缚，对它言听计从。于是，阿涅利动员能够以某种方式施加影响的所有报纸，发起了反对切菲斯的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把他当成是国家资产阶级的老板。这种宣传确实符合意大利实际，触到了国民经济的真正痛处，并第一次向广大公众揭露了天民党体制已经寄生到何种地步。广大公众密切注视这场争论，他们产生一种印象，似乎意大利报纸也象美国报纸一样开始讲真话，直言不讳地向读者提供情况。他们不知道，在这么多报纸采取新立场的背后隐藏着大规模的权力之争；他们也不知道，在假目标切菲斯老板的背后隐藏的真目标是什么。一些报纸不久前还对天民党唯唯诺诺，甚至遮掩和袒护它扩展经济实力的行动，现在却一反常态加以谴责，骤然揭发泛滥成灾的寄生生活。它们指出，国家资产阶级是毒害意大利社会生活基础的真正癌症。

与此同时，意大利银行总裁圭多·卡利也出马了，他开始攻击那些浪费国家财富的寄生社团；报纸则开始向舆论介绍说，他是意大利唯一一个能拯救国家财政的人，一位受全世界仰慕的杰出天才。岌岌可危的意大利尚能得到国外贷款，这完全应该归功于圭多·卡利的国际声誉。卡利在同欧金尼奥·斯卡尔法里^①谈话时开始采取左的立场，这使舆论感到震惊和不安，因为这种立场出自意大利银行总裁本人完全出

^① 斯卡尔法里，意大利《共和国报》总编辑。

乎人们的意料。卡利表示赞同企业家同工会达成社会协议；主张实行反对寄生社团的有效政策；为了拯救意大利经济形势，不排除有一天需要以某种形式使共产党人参加政府。这对意大利企业家来说好似一阵劈头盖脸打来的拳头，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形式下发迹的。然而，这正是阿涅利需要为企业家舆论所做的心理准备。

切菲斯筹划好了反措施：如果问题的关键在于影响企业家的舆论，那就有一种更直接的办法，即就任工业家联合会主席。工业家联合会定于1974年5月举行选举，切菲斯是联合会主席候选人。面对这种形势，阿涅利不得不亲自出马，他第一次明确表示要当主席。这是阻止切菲斯当选的唯一办法。他成功了，但来之不易，最后他不得不接受妥协：他当主席，切菲斯当副主席。

这是阿涅利争得的第一个社会职务，他觉得自己的政治前途将一帆风顺。特别是他从工业家联合会主席的宝座上开始采取一系列坚定措施为他的政治前途铺平了道路。他宣布，由于政治领导无能为力，除了建立国家的生产力量，即企业主同工会的真正的联盟外别无他路。“由我们作出决定，”阿涅利说，“然后让政府执行。”

共产党工会领导人卢恰诺·拉马是他最坚定的响应者。“让我们一起努力吧，使工厂恢复平静和效率，”阿涅利说，“我们团结起来为反对挥霍和寄生现象，为拯救国家而斗争！”拉马欣然同意，激情满怀，保证积极合作，使工人运动变得温和一些。意大利历史上一片田园诗般的灿烂美景似乎

已展现在眼前。

阿涅利对拉马的保证坚信不移，他深信意大利企业内的劳资冲突将减少，为此他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他同意在有关随着生活费用上涨而增加工资补贴额的新办法协定上签字。这对意大利企业家和意大利经济本身是个沉重打击。连乌戈·拉马尔法面对这样的协议也勃然大怒，尽管他宠爱阿涅利，把他的登场看成是自己政治活动的结果。他不能相信意大利最大的企业家会无知天真到如此程度，除了一些空洞的保证外，没有得到任何具体的交换物就付出了如此高的代价。几年后阿涅利才被迫承认，工会真的欺骗了他。

党内反对派

恩里科·贝林格很快意识到，让自己的党接受历史性妥协路线是一件异常艰巨的事情。他的第一个建议在党外引起了兴趣和争论，但党内的反应却冷若冰霜。起初，党的高级领导人都装作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早在贝林格开始把本党勾划成执政党的形象时，党内的不满情绪就已经相当强烈。当时他提出的口号是，对鲁莫尔政府采取“不同的建设性反对立场”。党内同志满腹牢骚的原因是，《团结报》毫无新意：从不批评政府，《团结报》的内容同从其他报纸上读到的毫无区别。机会主义的新式大衣似乎猛然间套在意大利新闻界身上。所有报刊都为政府辩护，都在向舆论解释需要支持鲁莫尔的道理，因为这届政府处于悬崖的尽头，再越过一步就是可怕的深渊。连《团结报》也这么讲，这就给工厂和支部的同志造成了思想混乱：难道就不可能比鲁莫尔政府更好一点吗？在黑店街的意共总部里，许多人自问，贝林格的“不同的建设性的反对立场”是否太象国王陛下的反对立场。

在关于历史性妥协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召开的中央委员会

会议上，没有一位党的高级领导人提及此事，大家都沉默不语。许多人感到气愤的是，这样的建议本来应该首先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来。贝林格同谁商量过？征求过党的哪个机关的意见？类似的事情陶里亚蒂在世时也干过，但大家从未表示过赞赏。

党主席路易吉·隆哥本人对历史性妥协的提法也有保留，他觉得这个提法含糊其词。那些赞同过贝林格政策的人也感到自己没有受到重视，因为他在提出建议前没有同党的领导机构和中央委员会的任何人商量过。全是他一个人自作主张干的，只征得身边三四个顾问的同意，他们似乎在党内建立了一种特殊机构，或说一种指导机构，其主要成员不少是前天主教共产党党员。贝林格习惯以这种方式做决定，长此以往，党内有人开始指责他搞独裁。

然而，连日来《团结报》一直围绕百分之五十一选票的问题大作文章，遭到许多人的反驳。为什么争得了多数选票的阵线应该放弃执政？这是否认民主，否认由不同的力量取代现政权的可能性。贝林格回答说：“我们提出的路线的实质在于避免国家的分裂，避免意大利分为两部分。”难道在美国、英国和德国每次选举都造成国家分裂吗？确实，这种情况在智利出现过，但为什么意大利一定会遭到同智利一样的命运，而不会象英国那样呢？这些问题以意大利方式进行了长期的无休止的讨论。

国家的分裂，意大利的分裂和宗教战争，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贝林格，正象当年困扰过陶里亚蒂一样。离婚法的公民

投票日益临近，这使他不安，他渴望同天民党达成协议避免举行公民投票。举行公民投票这个想法本身对他来说就是可悲的。他认为：“离婚法竞选运动会造成如下后果：导致工人、平民和左翼力量的分裂和冲突，阻扰工人和民主力量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使其脱离我们谈到的最紧迫和最严重的问题；竞选运动还会引起宗教界的长期的严重混乱和不安，这就不可避免的会给政教关系带来不好的影响；会促使天民党右转，成立宗教—法西斯阵线，其后果肯定是非常严重的。”

这些奥妙的预见来自一种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共有的民主观念：任其自然，人民就会误入歧途。最后的决定不能由他们作出。人民应该委任于政党，然后政党用其无限的智慧考虑、讨论，并就最好的解决办法达成协议。意大利宪法就是通过德·加斯佩里和陶里亚蒂达成的协议在这个基础上制定的。意大利同德国和英国不同，这些国家的选民事先知道，如果他们的党在选举中获胜，谁将出面组阁，因此可以说他们是为选择政府而投票。意大利选民则是为选择政党而投票，然后这些政党再就组成什么样的政府和由谁出面组阁达成协议。在同一个选举结果的基础上可能产生各种形式的政府：中右政府，中间政府，中左政府，民族团结政府和临时政府。任何人永远也不会准确知道，他的选票将如何被利用，而且在同一议会任职期间，他的选票会被以不同形式利用。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这正是那些制定宪法的人所希望的，其目的是把政治权力尽可能多地集中到政党手里。

多年来，公民投票法一直未能出笼，而是在抽屉里睡大觉，其原因是这种法律可能搞乱政党垄断政治的局面。现在通过了公民投票法，只是因为天主教势力这时坚持要有这种法律，以便废除各党协商通过的离婚法。举行有关离婚法的公民投票实际上并不象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激进党的主意，而是企图废除离婚法的天主教势力的主张。激进党人利用各党在这一事件面前的惊慌失措和畏首畏尾跨上了离婚法这只猛虎，冲到了前台。公民投票举行后，其结果家喻户晓，激进党人轻而易举地利用了这一胜利。实际上只有他们才真正盼望这次胜利。

然而，贝林格预见的各种悲剧并没有出现：工人、平民和左翼力量没有发生冲突；没有引起宗教界的混乱不安；没有给政教关系带来不好的影响；没有促使天民党右转。

鲁莫尔对公民投票结果的评论恰到好处。他说：“选民远远走在政治集团的前面。”事实正是如此，意大利人表现出的成熟程度，在此之前任何政治力量都是不会相信的。他们表明，他们已经为实行更现代化的民主作好了准备，将由他们选择这种或那种阵线；他们表明，他们已经能够摆脱宪法使他们囚居的由政党保护的那种体制；最后他们表明，社会现实已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以致于这些党再不能理解和反映它的所有方面。

只有激进党人才理解这种现实，这是他们成功的原因。这种情况使贝林格感到非常气愤。他厌烦中间力量，因为它们干扰大党之间、天主教力量同左翼力量之间的平衡。这种

观点是从陶里亚蒂那里因袭来的。农民、工人、天主教徒和社会主义者，他们才是伟大的现实力量。中间阶层是不定型的，它们迟早要被这种或那种力量吞掉。如果出现力图引诱它们的党，这是历史的逆流，这些干扰力量只能延缓两大势力的前进步伐。不存在第三势力，也不可能存在第三势力。正因为如此，阿门多拉提出世俗党联盟听起来也好似异端邪说。

如果范范尼不是孤注一掷地要举行离婚法公民投票，如果他接受贝林格多次向他提出的修改离婚法的建议，各政党就会象往常一样，不顾公众的真正愿望达成协议。但是，范范尼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梵蒂冈要求举行公民投票。他个人也遭到了失败，失去了天民党书记的职务。公众却第一次有可能就一个具体问题直接自由地表态，并用投票的形式解决。这样由来已久的危机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政党同舆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

今天人们对政党危机议论纷纷，这种危机或许有更深刻的原因，这是一种宪法危机，因为政党的极大权力是从宪法那里获取的。公民投票前夕一桩石油丑闻被揭露出来：所有执政党都接受了石油公司的贿赂，作为交换条件修改了石油产品的价格。这一丑闻再加上公民投票的结果使公众更加相信，统治集团无可挽回的腐败了，政党给国家造成的财政负担太严重了。就在石油丑闻败露不久，政党急忙通过了一项由国家资助政党的法律。人们震惊不已，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厚颜无耻、骄横跋扈的行为。此外，批准这项法律只用了几小时

间。而同一个议会，同一些政党，那怕是通过一项极微不足道的法律，也得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

阿涅利的泡影

从国际上看，事情似乎称心如意。尼克松被拖进水门事件；吉米·卡特以一副追求美国总统宝座的面孔正式出现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布热津斯基被大家看成是基辛格的继承人。詹尼·阿涅利设法使大家明白，意大利之所以难于得到国外贷款，其原因是它被看成是一个有风险的国家，只要他向他的朋友戴维·洛克菲勒说一句担保的话，美国最大银行的保险柜就会向我们国家打开。

一九七五年的地方选举证实了人们的预见：天民党选票触目惊心地下降，共产党选票令人难以置信地增加。贝林格感到心满意足，因为这说明他提出的历史性妥协路线是成功的。布热津斯基现已成为世界著名权威，只要接近他的意大利记者不发表他的讲话，他就坦率地对他们说，未来的美国政府将不反对意大利共产党人进政府。意共的重要领导人，例如乔治·纳波利塔诺，第一次被邀请到美国，并在美国大学作报告。美国《时代》周刊还刊登了恩里科·贝林格同记者的谈话，这也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这位意共首脑声明说，在

条件成熟的时候，他愿意去美国向其政治领导人解释意大利共产党的新思想和新态度。

在意大利，宪法法院前院长阿尔多·桑杜利呼吁自由党、共和党和社会民主党成立世俗党联盟。阿涅利和拉马尔法的计划在起作用。对此大家都感到欢欣鼓舞。

然而，正象在意大利经常发生的那样，关于世俗党联盟只是喋喋不休地空谈，到了选举的时候，即到了作决定的时候。这三个小党中每个党都有人担心失去他们那一点权力。这个讨厌的阿涅利究竟想干什么？他为什么要打破这种平静的局面，给由党的重要领导组成的选举委员会出难题？总之，在成立世俗党联盟的时刻，他们竞相争辩，寻找适当的借口退下阵来。拉马尔法感到可怕，因为他知道意大利政治家心胸狭窄，头脑简单，但的确没有想到他们会鼠目寸光到如此程度。然而他立即作出决定，如果世俗党联盟不能成立，他将把阿涅利列入共和党的竞选名单。不仅如此，他还将列入卡利。这是可以预见的。

范范尼意识到，这同样是个严重危险，可能使天民党失去一百万张选票。他建议同拉马尔法达成协议：“我们保证使共和党增加三十万张选票，而你们放弃阿涅利作候选人。”但拉马尔法不是那种为了几张选票就放弃宏伟政治计划的人，更何况这项计划是他本人提出的。他不能同意为了一碗粥就出卖他想象中的新意大利。他最坚定的支持者、并鼓励他采取强硬态度的人，是不久前才被阿涅利请来领导菲亚特汽车公司的卡洛·德贝内代蒂。他是共和党人、世俗党联盟

的支持者。他象拉马尔法一样知道，如果不从天民党手中夺走一部分权力，意大利的事情任何时候也不会走上正路。他还知道，阿涅利作共和党候选人可能招来对菲亚特公司的政治和经济报复，但是他认为值得进行冒险。现在菲亚特公司由他掌管，他坚信，无论遇到多么大的风浪，他都能使它平安抵港。

同拉马尔法达成协议的计划落空后，天民党人仅有的最后一张王牌是对阿涅利进行恫吓，迫使他后撤，声称要掀起一场可以把菲亚特淹没的经济风暴。

阿涅利不得不进行抉择：是要政治还是要菲亚特。事实上这就是天民党领导人给这位都灵律师^①送去的信息。这种信息不是来自一方，而是来自各方，甚至来自美国。它提醒阿涅利注意，在政治上追随拉马尔法的轻举妄动可能危及各方：可能使天民党在意大利的三十年统治毁于一旦；但同时也可能使菲亚特公司本身的命运危在旦夕。他需要谨慎从事，因为他非常清楚，意大利的银行系统掌握在谁的手里。他的菲亚特公司现在正需要资金，因为亏损了数千亿里拉，财政出现了赤字。应当由他来作抉择，当然是自由地作出抉择。

连日来，詹尼·阿涅利冥思苦索，心烦意乱，但最后还是作出了让步，因为这项赌博划不来。他把顾问维托里诺·基乌萨诺叫来，让他向天民党人保证，他的名字不会出现在共和党竞选名单上。光辉的政治前程好似一场甜美的梦化成

^① 指阿涅利

了泡影。这确实是失败，但最终阿涅利只能选择菲亚特。拉马尔法的政治计划的最坚定支持者之一欧金尼奥·斯卡尔法里对阿涅利的决定感到失望，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称阿涅利是“软骨头律师”。

天民党人胜利了。现在他们决定乘胜前进，扩大战果。都灵律师确实退出了舞台，不再作为共和党名单上的候选人，但意大利选民仍然可能认为，拉马尔法的党一直是阿涅利的党。需要消除一切疑虑。詹尼退阵后，阿涅利家族的另一个成员翁贝托^① 应交到天民党手里作人质，并同意作天民党竞选名单上的候选人。

这个条件阿涅利也接受了，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一旦败下阵来，就一败涂地。翁贝托宣布，他将作为天民党名单上的参议员候选人参加竞选。他在哪个选区参加选举呢？当然应该在都灵选区。但事实上却不是。败阵后还得受凌辱。多纳特·卡廷强烈反对，他立即表态，他什么都能接受，就是不能同意翁贝托·阿涅利作为都灵选区的候选人。在罗马的天民党人是怎么想的呢？菲亚特的工人将投翁贝托·阿涅利的票吗？应该给他找另一个选区。

为可怜的翁贝托找一个合适的选区是件很伤脑筋的事情。比内罗洛选区吧？可能合适，但他在那个选区选不上怎么办？他会丢面子，且仅如此也就罢了，可那还会使天民党丢脸。

似乎无出路可寻。怎么做才能两全其美呢？这时朱利奥

^① 詹尼·阿涅利的弟弟，菲亚特公司的副董事长。

• 安德烈奥蒂出场了，他意识到这种局面可能酿成一场大笑话。他说：他愿意接受翁贝托·阿涅利为罗马选区的候选人。一切都解决了。

翁贝托·阿涅利当选后，他真的相信可以搞政治，他还在罗马希尔顿旅馆里召开天民党参议员会议，讨论革新天民党问题。这是他召集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他很快明白，选他只是为了让他挂个名而已，并不想让他破坏天民党的计划。翁贝托·阿涅利在他的参议员宝座上安静地度过了几年，后来选举时他决定不再作候选人。应该为贝林格的历史性妥协敞开大门的政治计划，就这样凄惨地告吹了。

贝林格的“小神甫”

贝林格处于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已经六年了，但他还未能受到大家的真心拥戴。他提出的每个主张，在党的高级领导中，特别是在基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对立。党的其他领袖、无论是陶里亚蒂还是隆哥，从未在党内遇到过如此长期广泛的反对。他们总是能够把基层吸引到自己的立场，那怕是最不受欢迎的立场上来。贝林格却未能做到这一点。有许多干部不同意他的政策：他们不做任何反对他的事情；但也不做任何说服群众的工作。无声的反对从未如此普遍。这些同志从不公开表态，至少在干部会上是如此。他们不同意贝林格路线，但不说出来。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党的工作人员，其薪水由党组织支付。他们不愿担风险，公开发表反对意见，这样不仅可能丧失自己的政治地位，甚至可能失掉薪水。因此他们采取了新态度：无声的反对。作为能干的工作人员，他们忠实地完成份内的工作，但他们并不相信他们所干的事情。

贝林格的书记处有别于其他各届书记处的特点是孤行寡

和。贝林格性格孤僻、沉默寡言，不喜欢交际。他的个性现已给全党打上了印记。除了少数亲信外，他很少同别人交谈。即使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也难以同他进行一次真正的谈话。在黑店街意共总部里，人们难以进行思想交流，正象安东尼奥尼电影里描绘的那样。贝林格采取行动前只同他的顾问班子的少数人商量，他们大多数信奉天主教。在党内，他最信任的人，佩基奥利、切尔韦蒂和特里韦利不断受到提拔，这些人早在青年联盟时就同他在一起。在意共总部里，人们对他们和信奉天主教的大顾问满腹牢骚，议论纷纷。这种气氛将延续多年。

贝林格使阿门多拉和英格拉奥等勤于思考的人靠边站；把宣言派的人开除出党，他们当中有些同志是老党员，很有头脑；他自己也脱离了隆哥的保护，象高级神甫一样深居简出。在他周围出现真空后，涌现了一些阿谀奉承、追逐名利的人，他们对官职的冲击，对共产党这样的党来说是个不寻常的现象。升官发财的思想在意共内也找到了市场。达维德·拉约洛说：“在这种气氛中，新一代的更狡猾而不是更聪明的人占了上风，他们不是设法使党的生活民主化，以求不断的革新，而是要用那些既没有受过苦也没有必要经验的人的管理学说和自然犬儒主义来使党现代化。这些人知识贫乏，他们把更隐蔽的，但並不比那些同代人在资产阶级营垒里表现出的追逐名利危害小的升官主义带到党内”。阿尔曼多·科苏塔的批评还要尖锐。他说：“这些所谓的五六届小神甫与现代某些机会主义者相比称得上是角斗士。唯唯诺诺

和阿谀奉承是对话和深入研究的障碍”。

贝林格的“小神甫”已经开始摆好阵势，准备为其书记的孤僻辩护。新的管理办法和职务晋升都要求首先掌握贝林格的教导：作调解人即是领导。这是贝林格从陶里亚蒂那里学来的。但陶里亚蒂认为调解同公开的，甚至是激烈的斗争密不可分。贝林格则试图窒息斗争的因素，一切都变为调解。莫罗在天民党内也使用这种策略。事实上，在共产党内，人们的谈话方式也正在发生变化，不再象过去那样直言不讳，而是含蓄、迂回、考究用词。这正是莫罗的语言风格。阿门多拉极为不安地注意到，那些调解专家们在党内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他说：“应该指出，目前在党内领导层调解之风盛行。然而，没有讨论，没有政治斗争，也就没有什么值得调解的。据我看，目前他们调解的本领胜于讨论”。

蒙塔内利曾经说过，莫罗是本世纪最大的麻醉师。今天共产党也有了自己的麻醉师——贝林格及其忠实信徒。这些青年首先是党内官运亨通的职员吗？阿门多拉颇有节制地说：“我不想看到党今天仅仅根据是否接受某种纪律来选拔干部，这种纪律除了造成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紧张气氛外，它已成为一种形式主义。这将给党的组织活动引进一些官僚主义因素和使一些人产生渴望受到提拔重用的考虑。今天，党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尽管仍是有限的，但却是按时支付的。成为党的一位发言人意味着在社会上拥有受人尊敬的地位。今天再不是共产党的领导人被流放的时代了。”

贝林格强烈反对苏联平庸的、唯唯诺诺的官僚主义，然

而，出现在他周围的官僚主义同样平庸和唯唯诺诺。在党的干部中，工人出身的干部越来越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已占多数。对许多人来说，入党并不全是出于自己的政治倾向，而也是为了找工作，摆脱知识分子失业的处境。这个不稳定阶层再不把党的工作看成是战斗使命，而看成是一种职业，他们越来越想使自己成为贝林格和党组织之间的缓冲阶层。这些新职员有一个明显的缺点：他们是党的白领阶层，他们认为坐在写字台后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他们仅仅大概地了解工人和工厂的情况。他们在事务工作方面很能干，但对工作之外的其他事情却一知半解。他们当中有的人把党组织同公司企业混为一谈，其所作所为同会计师一样，对此贝林格有时极为恼火，但他的话只被当作耳旁风。知识分子变为官僚以后，自然而然地想要扩大自己的影响，成为无法根除的癌症。党的各阶层一直以怀疑的目光注视着这些小神甫。

党内的反对意见丝毫未能动摇贝林格。相反，他认为这是一种积极因素。他想创建一种世俗党，它再也不是由其头头宣布教规，而信徒们得严格遵守的宗教。他登上党的首脑地位并非偶然，因为由天赐领袖率领民众的时代已经结束。贝林格还主张党的领袖几年后应该卸任。那种要么是终身书记，要么被革职并受到公众批判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可惜这种情况在东欧国家里还存在。但是这种世俗党应该设法使党的领导了解党内出现的各种骚动、对立和分歧。党的领导应该进行开诚布公、毫不虚伪、毫无顾忌的讨论。然而对立意

见被控制和封锁在基层，党的领导不展开讨论，最多是一种无声的反对。贝林格的所作所为确实不象是一位引导信徒们在真理的道路上前进的宗教领袖，但毫无疑问却象一个公司的总经理：他把指示下达给一些经理执行，他们是同样的虔诚、热心和唯唯诺诺。这样，民主集中制只是换了一副面孔：由教会集权变为官僚集权。贝林格的小神甫们苦于无可奈何，他们虽然读过书，但却不能使粗野的无文化的基层理解他们。事实是党没有变得更加世俗化，在党内出现了在苏联国家中有目共睹的现象：官僚机构同基层之间，管理者同被管理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隔阂。

基层接二连三地受到冲击。他们勉强吞下了反对入侵布拉格的苦果，以怀疑的目光注视着贝林格在莫斯科发表的独立声明。他们被宣言派搞得心神不定，因为他们对宣言派仍怀有很大的同情心。他们把历史性妥协看成是要同令人厌恶的天民党人一起执政的荒唐事。特别是现在他们不理解对鲁莫尔政府采取的不同的反对立场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对这届政府表现得那么百依百顺？同志们翻阅《团结报》，感到它比无党派报纸更倾向政府。他们在党的机关报上读到了对控制物价政策的赞美词，而这一政策变得那么滑稽可笑。他们看到荒唐的紧缩政策获得通过，这一政策旨在减少周末石油消费，规定星期天私人不许开车。他们看到继总统利昂纳之后贝林格出现在电视屏幕上，饶有兴致地在罗马街头漫步。法国的紧缩政策严厉得多，但他们经过详细计算后很快发现，星期天步行节省的汽油如此微乎其微，以致于既不能补

偿这一政策给公民造成的不便，也不能补偿给汽车工业造成的损失。

蒙塔内利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意大利人普遍存在的心理：“相传，财政部长科隆博在采取某些措施，诸如减少税收措施之前，先征得了黑店街一些专家的同意。这最好不是真的，但大家却全相信。如下的传闻同样是可信的：政府计划要点在议会辩论之前已在两大党之间进行了讨论和辩论，执政党非常重视反对党的意见。总之，认为鲁莫尔中左政府之所以能立得住是由于共产党人想让它继续存在下去的看法日益深入人心。”尽管新闻多元论盛行，但各立宪党报纸却空洞无物。要看反政府文章的同志不得不买《宣言》报。机会主义的大斗篷渐渐地把国家罩住。甚至石油丑闻，在资助政党法通过之后，也在报纸上销声匿迹了，有关材料在调查委员会的抽屉里安然地睡大觉。

贝林格方案

就在这时有人开始指责贝林格搞独裁。阿门多拉和英格拉奥一致要求党内应进行更多的讨论,更多的政治辩论,思想应更加活跃。阿门多拉说:“有时我有一种印象,有些同志开始讨论时希望随时有各种安全保障。”据阿门多拉说,在批判斯大林的时候,党内确实形成了无声反对派,他们是不接受废除偶像的老斯大林主义者。这种沉默是一种明确的政治立场。但今天那些不出声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为什么他们没有勇气说出心里想说的话?阿门多拉指责他们是机会主义:“就是在今天,沉默也常常是一种政治愿望的表现,是谨慎小心的表现。劳动群众对某些行为的意义是非常敏感的,他们很快理解沉默的性质从根本上说是机会主义的。”

党的代表大会日益临近了,这是贝林格需要阐明自己全部政治路线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迄今他是走走停停,有时抛出一块石头,期待着党的反应。对历史性妥协路线他也是这样做的。但现在他的意见必须更加鲜明,在党的代表大会上

他应该向党提出並阐明自己的路线。

党的代表大会有两种开法：讨论提纲或由书记作报告。当有提纲时，比较容易改变其中的某些提法，每个人都可以发言提出修改意见，从而使党的路线成为集体讨论的结果。但当代表大会以书记的报告开始时，就不能这样做。书记阐述自己的路线，解释自己是怎么想的，大家或是赞同或是反对。会上的发言不能对报告作任何修改，只能表达党内的情绪，党的某个领导人可以乘机攻击对立派。书记总结讨论情况，忠实地重申他已经说过的话，党的路线就这样制定出来了。

阿门多拉和领导机构的许多成员不愿以后一种形式召开代表大会。他们坚持代表大会要有提纲。阿门多拉还要求集体主持大会，避免贝林格一个人作决定。有一派人坚持要在贝林格身旁设立副书记，並提出了候选人的名字阿尔曼多·科苏塔。他们想以此限制他的独裁，並在他最信任、来往最密切的圈子里掺一粒砂子。贝林格不同意代表大会有提纲，他坚持由他作报告。至于科苏塔，他不仅不同意他作副书记候选人，在代表大会结束时还把他排斥在书记处之外。

对阿门多拉来说，现在再不是个人野心问题。他对党的最优秀部分的麻木不仁感到忧心忡忡。代表大会召开前几天他撰写了一篇文章，对同志们发出了好似绝望的呼吁：站出来，参加讨论，再不要沉默了！把你们想说的话全说出来，特别是要说出哪些是不能令你们信服的。贝林格在代表大会

上要谈历史性妥协，你们应发言，并说出你们的真实想法。请不要再沉默了，不要再转弯抹角了！这是惊人的呼吁，人们议论纷纷，但谁也没有听他的。

全党动员起来反对阿门多拉的呼吁，包括党内元老们，他们不同意贝林格的政策，但更不信任阿门多拉。党处在危险时期，国家的形势更加严重，右翼威胁迫在眉睫，大选在即。在这样的时刻，党必须给人们以团结一致的形象。过分激烈的讨论和严厉的相互责备只会给党造成损失。家丑不可外扬，不要在代表大会上当着众人的面讲。我们先准备大选，然后再考虑这些事情。因此讨论将是平缓而温和的。拉约洛在他的《敞开的窗户》一书中写道：“后来，除了一些工厂支部和少数省委外，都没有进行辩论，即便在中央委员会内，实际上也没有进行讨论。”党内秩序井然。

让我们看一看，贝林格是如何向他的党介绍总的政治形势的？他开始先谈抽象的看法，这一直是贝林格的谈话特点。他象十世纪的预言者一样宣布了世界的末日：资本主义世界处于危机之中；通货膨胀的瘟疫在蔓延；文明濒于崩溃；新的野蛮时代的危险迫在眉睫。

记者彼得·尼科尔斯说，贝林格酷爱瓦格纳的音乐，因为他的音乐生动地描述了世界末日的灾难景象。贝林格说，这场灾难只有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才能避免。列宁本人说过，只有在最发达国家出现社会主义时，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完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将产生于西欧。贝林格开始创造条件，使他有可能把历史性妥协作为实现欧洲社会主义的前题提出

来。石油危机表明，正在向社会主义迈进的第三世界手中拥有强大的武器——各种原料。西欧应该主动同第三世界，特别是产油国加强联系，这样才能使自己独立于美国。

贝林格强调指出，当然，我们不能再继续剥削第三世界了，我们应该为各种原料支付合理的价格。这迫使我们放弃浪费和过度消费政策，而这样的消费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典型特点。一个更加严峻的世界，即集体消费将取代私人消费的世界将到来。一切将各得其所，一切会各就各位。这终将毁坏“滋养工人贵族的物质基础本身”。

对贝林格来说，这些工人贵族是狠毒的野兽。他一向认为，如果没有工人贵族的话，工人阶级将更加强大、团结和富有革命性，而受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贵族却推崇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列宁说过，在英国没有发生革命的原因在于英国资产阶级使工人们也获得了来自殖民帝国的部分好处，这样就制造了满足现状、拒绝掌握政权的工人贵族阶层。今天这种现象在意大利也出现了。意大利依赖从第三世界低价进口石油和原料逐步变为发达的工业国。如果事情发生变化，意大利工人贵族也就完蛋了。尽管贝林格不公开讲，但他认为，工人贵族是社会党和所有左翼改良派的滋生地。

很明显，贝林格渴望看到工人贵族销声匿迹。这一点很说明问题，也是他对现实的态度：所有出格的问题都使他不安，都是不合理的。工人阶级确实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战后初期他在米兰见到的那样，不再是一个衣服褴褛的阶级，他

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内部发生了分化，分为不同的阶层。对于一个死守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所有这一切都不应该发生。他不是设法理解变化的原因，以及这个新的工人阶级有什么不同之处，而是等待着反常现象的消失，等待着世界重新回到他在列宁主义学校学到的那样。

贝林格说，如果灾难已经濒临西方世界，那么，意大利将首当其冲。只有通过建立一个非社会主义的，但内部包含社会主义因素的新社会才能幸免于难。对于这个方案所有人都可能合作，首先天民党人和社会党人可能合作，因为这个方案不要求取消自由市场和私人工业，只是要求按照一定计划而不是盲目生产，不去迎合消费者的最自私的心理。贝林格认为，这样意大利未来的经济生活将更加健康；削减利息，消除寄生现象和关系户，给予真正的生产力以最大的关注，包括庞大而有效的全国卫生系统在内的各种公共福利，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贝林格认为，所有这一切在同天主教力量达成协议后都可能实现。由于天主教运动是一种世界现象，因此，在欧洲，或许其他地方也可以这样做。这就是历史性妥协的世界意义。贝林格向党内外批评他的人回击说：“需要解释的还有，为什么尽管有人不厌其烦地说‘不行’，历史性妥协近一年半以来却一直是意大利政治斗争的中心题目，也是引起绝大多数居民兴趣的问题之一。很显然，这不是一个来去匆匆的时髦的政治题目。”事实上，历史性妥协“对二十五年多来试验过的所有各种政治形式来说是唯一的新建议”。

贝林格说，历史性妥协实际上是反法西斯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只有共产党人进政府才能改变意大利环境，因为“政治领导和国家管理的方针和方法，以及国家总的气氛将发生质的变化。一股信任暖流将使劳动群众和全体人民重新振作精神”。贝林格指出，就连美国也不必再担心，因为共产党人事实上不再要求意大利退出北约组织。这一点不符合全党的胃口。

贝林格郑重其事地说，意大利知识分子一度起过全球性作用，曾赋予世界新思想，起初是古罗马思想，后来是天主教思想。谁敢说再次提出新的在世界上广为传播的思想的重任，提出一种现代世界大同主义的重任不再次落到意大利人肩上。显然，贝林格没有低估自己的作用。

欧洲共产主义的诞生

贝林格把历史性妥协说成是产生欧洲社会主义的基础，或者象他说的那样，是产生更遥远的世界唯一政府的基础，这种关于世界未来的讲话是非常诱人的。他描述的光辉未来非常象中世纪末许多意大利知识分子梦想的全球君主政体。不幸的是，当时历史的车轮向相反的方向前进，即向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向前进。贝林格从那些知识分子那里除了继承高贵的理想外，难道没有从他们那里继承梦幻似的抽象思维方式吗？然而，党的基层考虑问题却是具体的，眼下贝林格提出的建议是同天民党一起组成政府，做更多的工作，过更严峻的生活，意大利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这并不是什么诱人的前景。接受北约组织，这简直使人晕头转向，因为这意味着接受同美国的联盟，而这个军事组织一直被党描绘成是针对苏联的。

党的工作人员设法向党员解释也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有一点无法解释清楚：党原先坚持意大利应该退出北约，现在又赞成留在北约，这两者是矛盾的。两个完全相反的结论之

间怎么能够没有矛盾呢？党的干部在解释这些自相矛盾的观点时，运用了前所未闻的逻辑推理，但给基层只留下一个印象：这些自作聪明的知识分子完全是在诡辩。

这些党的中层干部大部分来自过去参加学生运动的青年，他们讲话含糊其词、转弯抹角。基层把他们当作外人。乔瓦尼·贝林格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许多人讲话令人费解，或是缺乏艺术性，或是政治术语太多，其原因有的是思想不够明确，有的则是根本不关心别人是否听懂。在一些支部里流行一种左派语言，这种语言可以使青年人之间进行可怜的交际，但却不能成为同志们之间进行交际的适宜工具。”但这时党的新一代干部力量正在日益增长，并正在把工人置于党的领导的次要地位。正象贝林格兄弟承认的那样，已经形成了“把劳动者排挤出领导地位的自然机构。”

因此，基层仍然无法理解。他们非但不接受贝林格的建议，甚至认为那些来讲解这些建议的新人是不可靠的，他们讲话的口气象是给别人讲课一样。贝林格的党正在变成企业党：走廊里装饰着华丽的灯具，电梯上下如飞，但是也沾染了意大利大企业的各种缺点：职工们不再清楚地了解生产的各种目的；干部唯唯诺诺，但能力有限；总经理认为纪律是企业效率的首要因素，因此他周围的人全是应声虫。领导同基层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然而，对贝林格来说问题不在这里。基层迟早是会理解并赞成他的计划的。需要向他们表明他的思想不是空中楼阁，而是行得通的。他认为，欧洲社会主义的想法并不象看上去

那样不现实；意大利共产党人应该立即投入工作，以表明为了在这个领域取得积极成果有多少事情要做。而且，已经取得了一项成果：正是由于贝林格的调解，两个德国才接近起来。正是意大利共产党人让维利·勃兰特实行同东欧国家寻求谅解的政策才改变了整个欧洲的政治气候。应该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使欧洲其他共产党接受意大利共产党的立场。

首先，就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贝林格对阿尔瓦罗·库尼亚尔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这位葡萄牙共产党领导人支持入侵布拉格，承认莫斯科的最高领导地位，并恰好在那几天把葡萄牙天民党^①排除在竞选运动之外。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曾以经久不息的掌声热烈欢迎他。愤怒的范范尼命令天民党代表退出会场。贝林格发言的目的是教训库尼亚尔，也是教训意共党内具有同样想法的人：葡萄牙共产党人正在犯错误，搞宗派主义是长久不了的，“应该确保所有党派都享有政治权利，无论它们是左翼的，中间的，还是右翼的”。这也是为了安慰范范尼。

实际上，贝林格利用这个庄重的正式机会表明，对西欧各国共产党来说，他的政策是唯一可行的。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乔治·马歇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他指责贝林格攻击葡萄牙共产党人出于“生意经”，纯粹是为了捞取选票。马歇说：“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对一个兄弟党进行毫无道理的批评，

^① 社会民主中心党，贡萨尔维斯执政时该党处于非法地位，贡下台后该党在1976年大选中成为第三大党。

即使这样做有可能使我们增加百分之十的选票。”对贝林格的欧洲共产主义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当然，贝林格并不象马歇怀疑的那样仅出于“生意经”才那样做，但由此在选举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6月15日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共产党夺得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成果：一千零十五万张选票对天民党人的一千零七十万张选票。现在两党的选票几乎相等。但如果把各左翼党的选票计算在一起，就更加使人震惊，共产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正好拥有百分之五十一的选票，即绝对多数。如果再加上自由党、共和党和无产阶级团结民主党的选票，世俗阵线的选票就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八、实际上同一年前举行离婚法公民投票时得到的选票一样多。

贝林格现在可以说取得了胜利，他认为这是历史性妥协政策起了作用。基层党员也都欢欣鼓舞，但又在琢磨，向往社会主义的各党终于得到了期待多年的百分之五十一选票，但为什么偏偏现在贝林格放弃组阁的前景呢？

美国人对选举的结果最为注意。现在布热津斯基的计划正在实施当中，卡特已是总统选举的正式候选人，共和党由于水门事件把尼克松搞得狼狈不堪而陷入危机。权力现已垂手可得，布热津斯基把亲信派往意大利，以便同意大利共产党人进行接触。这位使者叫兹格蒙特·那戈尔斯基，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意大利办事处，即贝拉焦的塞尔贝洛尼别墅会见了意大利共产党的外交部长塞尔焦·塞格雷。谈话时间很长，涉及到各方面问题。这位美国人得出的结论是积极

的，而且他确信，意大利共产党人不是正统的共产党人：“当他们对我说，他们愿意同其他政治力量分享权力，坚定不移地维护反对派新闻自由，维护舆论自由，要求政府的决定必须征求选民的同意，建议社会改革应完全在议会制的范畴里进行，当他们这样说时我不得不相信，他们不是共产党人，而更象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人，或英国的工党人。”布热津斯基的这位使者以美国人特有的政治直率向意大利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建议：由于共产党这个词在美国看起来非常刺眼，为什么他们不向前跨出最后一步，改变党的名称，这样可以消除一切疑虑。如果不再叫共产党，一切都变得非常简单。但意大利共产党人回答他说，这很难，因为党的名称不是标签，而是历史进程的产物。

就在同美国人的接触正在进行的时候，贝林格在意大利的里窝那会见了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圣地亚哥·卡里略，并诞生了欧洲共产主义第一个正式文件。贝林格赋予会谈公报以“历史意义”：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人赞成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主张西欧社会主义力量，社会民主党力量和天主教力量达成谅解。这是在欧洲搞历史性妥协。

几天以后，莫斯科就发起了攻击。《真理报》提醒西方共产党人记住列宁的教导：通过革命而不是通过选举才能掌握政权，需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贝林格同卡里略的会晤，以及法国的马歇开始转向意大利共产党人的立场，这些使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深为不安。如果出现欧洲共产主义中心，莫斯科的国际地位和威望将一落千

丈。这还没有把强大的西方共产主义运动可能对东欧国家造成的影响计算进去。在东柏林、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莫斯科已经看到发生了多起罕见的骚乱，更不用说南斯拉夫了。

显然，贝林格正在悄悄地推行陶里亚蒂在赫鲁晓夫时期提出的多中心论，这个理论当时曾被莫斯科宣判为异端邪说。而且，正是隆哥宣布正式放弃多中心理论的：“多中心论的概念被认为是含糊不清的。把关于需要在一些共产党之间建立地区领导和组织中心的观点归咎于我们党是错误的。”请注意隆哥用词的微妙之处：他没有说多中心论的概念是含糊不清的，而只是说“被认为”是含糊不清的。被谁认为呢？当然是被苏联同志认为。无论如何，从那时起，多中心论这个词就从意大利共产党人的辞典里完全消失了。今天贝林格又把这个伤口打开了，这就有造成感染的危险。

同莫斯科的对立

1975年对贝林格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以他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终于提出了他的战略而开始，接着赢得了选举的成功，这使范范尼身陷困境，而贝林格提出的对天民党施加压力，以迫使该党内愿意同共产党对话的力量占上风的策略却声誉倍增。事实上，天民党人选举诚实的扎卡尼尼当书记，他表示愿意改变对意共的态度。天民党的实权掌握在对重视共产党的策略越来越坚信不移的莫罗手里，他愿意同共产党就所有重大问题 进行协商，只要共产党人保证坚持“建设性的反对立场”。大家公认，贝林格实际上已经站在了政府的门前。美国极为认真地听取意大利共产党人发表的各种意见。由于贝林格同卡里略的会晤，欧洲共产主义已向前跨出了重要的第一步。还从未有过一条政治路线如此迅速地取得如此惊人的成果。

1975年以或许是最为轰动的成果而结束：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乔治·马歇转变到意大利共产党立场上来，他同意前往罗马同贝林格一起发表一项共同声明。这一次，这一事件又被

赋予历史意义：“发表一项阐明我们对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立场的声明，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由两位领导人签署的名符其实的欧洲共产主义宪章就这样诞生了。两位领导人承认西方共产党有它们自己的问题，欧洲社会主义只能在民主和自由中诞生。

这不仅是贝林格的胜利，而且结束了两党之间长期存在的，特别是在陶里亚蒂和多列士时期存在的严重对立。法共是欧洲一个非常重要国家的大党，但它一直非常顺从莫斯科的领导。现在贝林格说服马歇，终于割断了同莫斯科的休戚相关的联系。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共产党人取得一致后，欧洲共产主义的确成为一种重要力量。远东的日本共产党也表示赞同意大利共产党的路线。

贝林格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正像莫斯科担心的那样，意大利共产党正在成为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甚至东欧国家共产党的楷模。当杜布切克要人们不要忘记入侵布拉格事件的牺牲者时，他给写信的人正是贝林格，尽管贝林格说他从未收到过这封信。连苏联国内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也给他写过信。

与铁托和毛泽东不同的是，贝林格暂时没有同莫斯科断绝关系。当他意识到弦拉得太紧时，他就松一松，以防崩断。1976年2月，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代表大会时，欧洲共产主义的两位新教友马歇和卡里略拒绝出席，以表明他们同苏联断绝了关系。法国共产党领导人拒绝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代表大会，这还是第一次，因此引起了轰动。相反，

贝林格却前往参加，他从代表大会的讲台上再次宣布，西欧社会主义业已成熟，但这是另一种社会主义，一种独立的，多元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

贝林格的所有言论都是正统的，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都可以找到。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尽管所有思想本身无懈可击，苏联人也可以同意，但是这些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却成为一种混合炸药，因为它们同东欧国家的所作所为是矛盾的。事实上，苏斯洛夫在那次莫斯科党代会上对他进行了攻击，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与革命理论风马牛不相及的民族的和地区的解释”的人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苏联人说，请你们注意，你们的这种立场可能使你们得到眼前的好处，但从长远来看将给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主义运动造成损失。

需要有撒丁人那种顽强的性格才能对莫斯科的指责进行如此毫不动摇的抵制。陶里亚蒂本人也从未如此坚定过。在意共历史上，只有葛兰西才有过这种顽强精神，他也是一个撒丁人。贝林格确实深信，他走的路是正确的，无论如何历史将证明他是正确的。历史是衡量他的尺度。对他来说，给党留下自己的印记的时刻已经到来。正因为如此，他把能很好地领会他的思想的人安排在身边工作。和这些人在一起工作起来比较方便。他们并不是党内最出色的智囊，这一点他很清楚。但他们效率高、守纪律、忠于他，尽管有人称他们是他的追随者。如果仅相信那些老权威和一贯吹毛求疵的人，他们每个人的头脑里都有一套已经形成的理论，那

么，他在改革的道路上又能采取多少有效的步骤呢？有人指责他把一些尚缺乏经验、同工人阶级没有任何联系青年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但贝林格亲眼看到，陶里亚蒂1945年重新建党时也是这么做的，他周围全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人。陶里亚蒂认为他们比那些老干部更能理解新形势。贝林格清楚地知道，並公开讲过，这些青年人有可能成为官僚主义者，他们身上还存在许多缺点，但是他们对他有用。

贝林格应受到的责怪是，他的宏伟的、历史性的、长远的、直至建立世界政府的蓝图，在具体政策方面却囿于微小的交易、可怜的不同反对立场、难以琢磨的对政府措施的弃权政策、对民族团结政府和卑微追求——例如对分得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几个肥缺的追求——的失望。好一个世界政府，却进行短途政治交易！

由于贝林格在推行历史性妥协和欧洲共产主义时坚定地宣布独立于莫斯科，因此，他的思想在意大利国内外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深刻的反响。意大利知识分子对1968年事件感到震惊，当时他们已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是僵化的教条。当时谈论的是“解脱义务”，正如今天谈论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样。1968年的风暴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估价。现在，贝林格提倡不那么教条主义的理论讨论，这就使意大利知识分子重新满怀兴致地注意起意大利共产党来。不仅传统的知识分子转向共产党，而且科技界知识分子和企业领导人也注意听取共产党人关于效率和合理性的谈话。

经理、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和企业家已认为他们的处

境是无法容忍的。他们看到，他们的地位越来越不重要。今天，当提高效率这个首要目标已变得渺茫的时候，职业能力又能起什么作用？如果公共企业、国家机关和团体、庞大的经济官僚体系不把提高效率作为主要目标，而一味地追求政治好处，有能力的人又能起什么作用？不仅不能起作用，而且由于他们追求效率，可能成为实现企业真正目标的障碍。

这些新的知识阶层的支持有助于贝林格把共产党塑造成有知识、有文化的党的形象，这个党知道为了提高效率需要些什么和怎么做。这种支持还能引起广大中间阶层对共产党的关注和同情，因为中间阶层最容易受到知识分子的影响。国际威信的提高和国内广泛的支持使贝林格在1976年6月20日选举中获得了比前次选举更为轰动的胜利。

欧洲共产主义的黄昏

在竞选期间，贝林格前往巴黎对马歇进行回访。巴黎的所有墙上都贴着印有贝林格彩色肖像的宣传画。在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上，当唱完国际歌、意大利国歌和法国国歌以后，贝林格发表了讲话，并首次使用了欧洲共产主义这个词。两位领导人的讲话赞美了将在欧洲诞生的自由社会主义。美国未来总统吉米·卡特说，如果意大利人愿意共产党进政府，美国政府将不加干涉。与此同时，天民党人已成功地迫使詹尼·阿涅利不作候选人，并且把他的弟弟翁贝托作为人质列入天民党的竞选名单。这样，天民党人避免了一场使他们胆战心惊的失败，但是并未能阻止贝林格的党向前跨出新的一步：共产党得到了一千二百多万张选票，即百分之三十五的选票。群众举行游行集会，世俗意大利现在改变了同天主教意大利的力量对比。

从巴黎凯旋和选举胜利后，贝林格深信，在中央委员会里大家将一致欢呼刚刚取得的胜利。不料，他却令人难以置信地被泼了冷水。隆哥决定亲自参加中央委员会工作，并立

即严厉批评说，工作没有任何值得满意的进展。显然，他对选举胜利在党内引起的狂热气氛感到不快。他说，“任何盲目乐观主义都是无益的和危险的”，选举结果作用不大，更何况是付出过高的代价才取得的，现在“在党内和舆论中存在着对我们的路线的疑虑和保留，我们应该想一想”。显然，隆哥这时反映了基层的情绪：宁肯选票少一点，也要基层更加坚信党的政策。他注意到，用君子协议和在蒙特齐托里奥宫的走廊里挤眉弄眼的办法进行罗马式的政治活动的趋势在党的高级领导人中越来越盛行。他说：“我宁愿我们党的现行政策受到人民群众的更加坚定的同情和支持，而不是得到安德烈奥蒂和拉马尔法的承认。”继续要求劳动群众作出牺牲的紧缩政策得到贝林格的支持和阿门多拉的称赞，这使隆哥感到不安，特别对他们“一马当先”的支持政府感到不安。既然共产党不在政府里，它怎么能够变成简直比天民党还要坚定的政府党呢？一个时期以来，基层一直在这样议论。

显而易见，对贝林格的批评还涉及到他的工作方法，他被一些使他孤立于所有其他领导人的应声虫包围。党的书记处进行了改组，在青年联盟时就同贝林格合作的最忠实于他的佩基奥利和特里韦利被槟斥于书记处之外。这是一种严重的不信任行动，因为通常党的书记处只在代表大会之后改组。这两个人刚刚被贝林格提拔到书记处，他们被除名还意味着否定了贝林格自己的行动。

这是怎么回事？只是基层的不满情绪不可能使隆哥如此惊恐不安。这里有苏联的黑手在暗中活动。莫斯科对在美国

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它完全清楚，欧洲共产主义问题已列入美国国务院的重要议事日程；它知道基辛格即将离职，他曾保证过，任何时候也不在东欧做任何给苏联人制造麻烦的事情；它知道不久卡特的人将掌权，他们的想法恰好相反，他们把欧洲共产主义看成是一张使东欧国家陷入危机的王牌。对莫斯科来说，这笔赌注实在太大了。贝林格的欧洲共产主义是一种伟大的思想，但对莫斯科来说可能变得非常危险。难道意大利共产党人想利用美国这张王牌吗？

奇怪的地下活动开始了。苏联记者在意大利会见对贝林格路线持不同意见的共产党员。他们进行试探，如果莫斯科把贝林格革除教门，他们是否准备建立另一个共产党？当一位共产党记者问翁贝托·泰拉奇尼，苏联人是否可能进行某种活动来反对欧洲共产主义时，他的回答是意味深长的：“我的确认为，苏联人可能采取某种步骤，只要他们得出结论，堵塞欧洲共产主义漏洞的所有努力都落空了的话。以苏共为首的共产国际在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方面曾做出过戏剧性的榜样，而且取得了很大成功。今天，类似的活动很可能已在进行中，或者将要进行。”总之，贝林格的处境非常危险，他可能成为意大利的杜布切克。幸运的是，意大利是北约组织成员国，苏联坦克不可能象开到布拉格一样开到罗马来。经过许多天的认真思索，贝林格讲出了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说的确是逆不道的话：在北约组织的保护下在意大利搞社会主义要比在苏联的影响下搞社会主义容易得多。这位倔强的撒丁人把他的想法也对苏联人讲了。

对贝林格来说，形势越来越严重。在新的中央委员会里阿尔曼多·科苏塔对贝林格发难，他讲了一句著名的话：“这些五六届小神甫与现代某些机会主义者相比称得上是角斗士。在党内阿谀奉承和唯唯诺诺已畅行无阻。”科苏塔说，欧洲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们忘记了党的性质，还忘记了陶里亚蒂教导的党同苏联一直存在的无法分离的联系。党内不少有威信的领导人同科苏塔站在一起，他们对那些怀疑同莫斯科的关系和东欧国家取得的成果的人提出了警告。贝林格更加孤立了。

面对这种形势，贝林格应该采取对策。科苏塔抱怨，党有失去自己的特点的危险。贝林格在米兰讲话时做了回答，他告诫说：“我们应该注意，不要认为团结可以通过对原则让步和冲淡我们党的突出特点来实现。”这即是说他承认，尽管东欧国家有些方面是不自由的，但它们取得了不可抹煞的成果，确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成为和平的一个堡垒。这是贝林格可以向自己的对手做出的最小让步。而这时卡里略在讲话中却在宣传：在苏联既不存在社会主义，也不存在共产主义。

从那时起贝林格开始避免使用欧洲共产主义这个词。党的其他领导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都用“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当贝林格、马歇和卡里略在马德里会晤时（他们三人聚在一起这还是第一次），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卡里略已经准备好了一份应由他们三人共同签署的反苏声明。贝林格读后立即告诫卡里略打消他可以在这样的声明上签字的念头。马

歌同意贝林格的意见。这次会晤结束时只发表了一项笼统的声明。卡里略极为恼火，他觉得自己被出卖了。在美国，这时卡特已当上了总统，新国务卿赛勒斯·万斯说，欧洲共产主义是令人感兴趣的，因为它可以给东欧集团制造困难。现在连美国国务卿都这样说，苏联越来越感到惊恐不安。

苏联召开东欧共产党会议，以协调对欧洲共产主义的立场。他们知道，贝林格和马歇在马德里拒绝签署由卡里略起草的声明。在这三个党中，最弱的是西班牙共产党。不应当同时攻击三个党，应先拿卡里略开刀，给他当头一棒。

猛烈而持久的宣传运动开始了。卡里略的欧洲共产主义被说成是服务于美国和帝国主义的工具。卡里略被说成是反苏分子。谁主张欧洲既独立于美国也独立于苏联，谁实际上是要分裂欧洲大陆的共产主义运动。后面这点说的正是贝林格的主张。记者们蜂拥到黑店街意共总部，想知道对苏联的攻击他们是怎么想的。

回答是明确的，他们同卡里略毫不相干。卡里略只剩下只身一人。欧洲共产主义呢？那只是“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大概根本不存在这种主义。正象卢卡·帕沃利尼说的，可以肯定，欧洲共产主义“这个词不是我们发明的。”后来《团结报》正式宣布，欧洲共产主义是一个高贵的陌生词，也是“一种不存在的理论，实际上，既不存在组织中心，也不存在全面的章程”。巴叶塔强调，贝林格、马歇和卡里略多次聚会只是为了随便谈谈。他们没有建立新的组织中心，也没有签署欧洲共产主义宪章。不久，巴叶塔前往莫斯科向苏联人做

了解释，在他回来时声明不同意卡里略的立场。当有人问隆哥对欧洲共产主义的看法时，他生硬地回答说：“我不喜欢欧洲共产主义，也不存在欧洲共产主义。”意共中头号欧洲主义者阿门多拉本人在公开讲话中郑重宣布：“欧洲共产主义不存在。”苏联人得到了所期望的结果。从今以后，贝林格、卡里略和马歇之间重又怒目而视。

知识分子的离散

欧洲共产主义衰落后，历史性妥协依然存在。然而，这时历史性妥协也变得可怜了。它在国际上失去吸引力和前途以后，就成为一种地方性的、仅限于意大利的渺小现象，其核心是同天民党人达成平庸的协议，对政府采取“非不信任”态度。这种态度再次激起基层的强烈不满。“非不信任”是什么意思？要么是信任，要么是不信任。贝林格抛出的这种第三条道路是支持天民党一党政府的一种形式，但又要保住面子。难道齐声高呼的选举胜利只是为了支持一个天民党一党政府和期待在政府多数中捞到一个席位吗？难道为了换取这点东西，共产党就要求实行严峻的经济政策和做出牺牲吗？共产党报纸的态度令人不安，它们比天民党报纸更坚定地维护政府所做的一切，似乎这些都是它们自己的事情。共产党人读这些报纸时直摇头，宣言派报刊经常嘲弄他们。

除了基层的不满之外，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新情况：知识分子的失望。哲学家卢乔·科莱蒂开始认为，如果贝林格感到没有能力对付推行欧洲共产主义政策所带来的人人皆知的

困难和危险，那么，他为什么要在这条道路上冒险？当贝林格本人对左翼知识分子说意大利文化界的任务是支持严峻政策时，不满情绪达到了高潮。我们好像在看滑稽戏。不久，卢恰诺·拉马郑重其事地宣布，意大利知识分子应该支持历史性妥协政策，正象美国知识分子支持罗斯福的新交易一样。这还是那种文化应辅助党的政策的观念。知识分子纷纷离去。战后初期，维托里尼^①曾反对应该为革命唱赞歌的思想。但至少那关系到革命。现在他们却要求艺术家为严峻政策和历史性妥协唱赞歌。

共产党人同天民党人的协议似乎取得了使意大利知识界惊恐不安的结果：两种信仰在压制文化这个观念上联合起来。不久，当里帕·迪·梅亚纳决定这次威尼斯双年节^②的题目是东欧国家的不同政见问题时，这一点就得到了证明。苏联驻意大利大使立即提出强烈抗议，意共接二连三地指责梅亚纳，甚至企图阻止向双年节提供经费，以使这次活动流产。这种毫不容忍的态度只有在陶里亚蒂同维托里尼和抽象派争论时才表现出来过。难道这就是新许诺的自由吗？意大利文化界极为痛心，看来，日丹诺夫主义是一种不治之症。不同政见这个题目是一种使人不舒服的题目吗？的确是，但正因为如此才应该接受这个题目。因为令人舒服的题目所有人都会轻松愉快地接受。

① 维托里尼，意大利小说家，1945年加入意共，后同陶里亚蒂等人就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展开论战，1951年退出意共。

② 在威尼斯举办的两年一度的现代艺术展览。

有时人们几乎产生一种印象，似乎共产党有意同知识分子决裂。正在就双年节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时，夏侠^①事件发生了。当时，对红色旅的审判应该在都灵进行，但找不到人民陪审员。所有人都拒绝充当陪审员，报纸指责他们是胆小鬼。诗人蒙塔莱讲了一句很普通的话，“不能要求任何人都是英雄”，就受到了攻击，结果夏侠为他辩护。

这时乔治·阿门多拉出场了。他说：“在意大利文化的各领域中，市民的勇敢精神从来不是一种普遍的品德。”阿门多拉不喜欢夏侠，当提名他作为共产党竞选名单上的候选人时，阿门多拉曾表示反对，但贝林格坚持要选他。现在贝林格的亲信对他也恼火了。首先，他当选后又辞职了，因为他不同意历史性妥协；其次，当贝林格发表那篇著名的要求过严峻生活的讲话时，夏侠的评论是最为尖刻的，他说这是一篇“当权者的讲话”。

阿门多拉发起攻击后，意共所有文化发言人争先恐后地发表谈话对他进行谴责。似乎又回到了过去进行严厉的思想批判的时代。所不同的是，过去以党和工人阶级的名义对大逆不道者进行批判，现在是以国家、宪法和反法西斯主义的名义进行批判。于是产生了新的偶像，但毕竟只是偶像。由于种种原因，意大利知识分子对正在建立的新制度充满了新的疑虑和担心。共产党人对国家和宪法的赞美非常象东欧国

^① 又译沙沙，意大利作家。1921年生于西西里，其作品多以西西里为背景，描写黑手党的罪恶以及各党利用社会混乱谋取私利等。主要作品有《各得其所》、《千方百计》等。

家的舆论着魔似地对党的赞美。

知识分子的离散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知识分子向来是传播群众严重不满情绪的天线。共产党不是寻找发病的原因，而是对标明高烧温度的体温计发火。人们感到失望，因为选举的胜利变为一种使安德烈奥蒂政府不倒台的宫廷协议。共产党让提高石油价格、增加税收、部分冻结随着物价指数上升而进行的工资调整以及结束企业劳资谈判等措施获得通过。共产党历史学家萨尔瓦托雷·塞基说：“当国家的多罗泰伊主义^①的狂欢节还在继续时，严峻的紧缩政策只会引起人们对斋期讲道越来越愤怒的反响”。

安德烈奥蒂政府成为“反法西斯民主革命”的代名词，批评政府的人被视为国家的敌人或法西斯分子。攻击政府就象攻击共产党一样遭到回击。劳动群众为抗议安德烈奥蒂政府的法令上街游行示威，而这被谴责为极左行动。由于共产党拒绝反映民众的不满情绪，自主派和极左集团才有了活动余地。这是劳动群众同共产党领导人之间出现最深刻裂痕的时期。拉马在罗马遭到反对，群众吹口哨哄他。波伦亚市长赞盖里被群众抗议行动赶下台，抗议行动使这座城市变成了游击战场。共产党说他们是挑唆者和暴徒。确实他们当中有这样的人，但群众的愤怒情绪却是真诚的。在民众的不满中寻找挑唆者的活动，就象苏联人在波兰工人的抗议行动中寻找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活动一样。

^① 天主教民主党内的多数派称为多罗泰伊，他们的主张故称多罗泰伊主义。

贝林格看到《共和国报》刊登的福拉蒂尼画的漫画后勃然大怒，据说那是一次不折不扣的休克。这张漫画维妙维肖地描绘了当时的普遍情绪。当时机械工人正在罗马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漫画上的恩里科·贝林格脚穿便鞋坐在安乐椅上，他以一付南方伯爵的神态慢慢地品着茶，机械工人在街道上的喧闹声使他感到非常厌烦。意共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党的所有头脑再次被动员起来回击这位可怜的漫画家。这种场面如同高级神职人员集会同声谴责敢于攻击宗教领袖的人，并把他革除教门一样。

只有共产党进政府才能使劳动群众充满信心和改变国家的形势，贝林格这种预见并未变为现实，甚至适得其反。对天民党百依百顺的态度在党内引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对。翁贝托·泰拉奇尼说：“我不知道我的党的政治路线有什么发展。但我知道（而且这一点非常重要）对历史性妥协的疑虑在增加而不是减少。社会不仅继续受到原有的流弊的毒害，而且更坏的是，在某些方面有丧失某种解决前景的危险。”泰拉奇尼同英格拉奥一样认为，正是由于前景渺茫，才出现绝望的极端的反抗行动，这种情况在青年中尤为普遍。人们指责共产党对社会的呼声充耳不闻，把一切都归到给青年人找工作的问题上。于是真正的怪胎，关于青年工作的法律降生了。在这个问题上泰拉奇尼仍是最清醒的。他说：“不能指望历史性妥协会使社会现实停止不前，将发生一系列无法控制的行动。”

贝林格想通过采取坚决行动，即要求进政府来解决这些

困难。如果这个目标得以达到，对历史性妥协的各种批评终将销声匿迹。然而，总的形势发生了变化：阿涅利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欧洲共产主义已经衰落；看来卡特对这场赌博已不再感兴趣，他声明美国不愿意意大利共产党人进政府。莫罗要彻底地利用这张牌，即共产党最多只能进入支持政府的议会多数。公开投赞成票支持安德烈奥蒂政府，而不是以弃权的形式支持。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胜利，一点也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而贝林格却把它看成是巨大的进展和成功。

贝林格只提出一个条件，新政府中不全是天民党人，还应有许多技术人员。扎卡尼尼表示同意有五到六个技术人员。但在制定政府部长名单时，掌握实权的莫罗只安排了一个技术人员，其余全是天民党人。莫罗和扎卡尼尼之间发生了严重冲突。诚实的扎卡尼尼想要遵守诺言。莫罗态度强硬，最后还是贝林格吞下了苦果。

就在新政府应该同议会见面的那天，红色旅绑架了莫罗。这个民族悲剧为进行反法西斯和维护宪法宣传提供了一个新机会。多年来执政阶级一直并继续使之受到损害的国家突然间成为至高无尚的绝对的实体。然而，不正是这个国家在菲乌米奇诺机场发生谋杀案之后让犯人逃往国外的吗？对这些事情莫罗一清二楚，他从囚室中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对国家的崇拜表示惊讶。他说，难道我们自己不总是代表国家吗？难道我们自己不总是为所欲为吗？

共产党报纸《国家晚报》的社长认为给知识分子另一次教

训的时刻到了。莱奥纳尔多·夏侠一个时期以来一直沉默不语，悠闲度日。《国家晚报》故意把他牵连进去，象是对他挑战：夏侠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出来捍卫国家？烦恼的夏侠回答说，我不支持红色旅，但也不支持这个国家。这成为他们期待已久的导火线，于是故伎重演了。夏侠成为众矢之的，他象一个反国家的巫婆一样当众受到蔑视。

历史性妥协的尾声

对意大利文化界采取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实际上是企图消除一种贝林格不能理解，也不能纳入自己轨道的社会现象：知识分子做为群众出现在社会舞台上。这一切并没有写入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规章。对夏侠的严厉惩罚使众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疏远了党，而青年学生的激进思想还感染着青年工人。这里存在着一个新的认识上的差距。青年工人站到青年学生一边，并不象共产党人认为的那样是因为他们受到了青年学生的影响，而是因为他们代表新型的更加知识化的工人阶级的崛起。贝林格不理解的正是这个工人阶级，把他们当成“工人贵族”。他认为，工人阶级仍然是，并将永远是指三十年前的老式冶金工人。他抹煞并拒绝承认这种现象，他坚信那是一种弊端，注定要消失。正是这些认识上的差距，这种把知识分子再次看成附属工具的观点阻碍共产党人在一个工业发达社会里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集团”。他们甚至不能理解应该组成这个集团的力量性质，而仍然停留在认为只有冶金工人和农民才属于这种力量的阶

段。

卡尔·马克思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对现实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不是指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而是指马克思的更科学和更成熟的思考。他甚至预见到将来会出现自动化，工人由繁重的体力劳动者变为机器管理人。这种工人非常象古时候看管奴隶的人，只是管理生产工具。马克思主义学院派已经把这种工人从他们的记忆中勾消了，正象现在他们力图从现实中把这种工人除掉一样。

自动化改变了生产方式，并将继续改变生产方式。文化和科学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并改变工人阶级本身的性质。意大利共产党多年来抵制技术进步，也就抵制这种变化。贝林格不理解这一点，这不是他本人的过错。作为他的党的基础的全部文化使他无法理解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学院派哲学并非相同。贝林格的所有革新，所有理论创见都没有超出学院派哲学的范畴。

有人要问：这些文化上的错误有什么了不起？它们对于政治目标能有多大危害？相反，这些错误危害极大，因为它们导致党同青年运动的分离，导致党同新的工人阶级的隔阂，导致工会运动的危机，导致任何可能的社会集团的完结，而眼前则导致共产党支持的安德烈奥蒂政府同大部分舆论的冲突。共产党支持的安德烈奥蒂政府的任何一条法令都未能赢得舆论的赞同。人们期待共产党人有所作为，但现在大部分罪过都加到他们身上。不仅工人感到不快，因为他们听到要他们过严峻生活和做出牺牲，中间阶层也普遍感到不快，因

为这个阶层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他们意识到新政策首先是针对他们的，是针对那些最缺乏自卫能力、组织上最涣散的阶层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派认为，中间阶层是不稳定的，然而这个阶层非但没有消失，相反继续扩大。他们拒绝成为紧缩和严峻政策的最大牺牲者。痛苦的现实是：国家财富没有增加，而是在减少。财富的重新分配只有两种办法：或是拆除国家的寄生机构，即天民党的领地，它们每天挥霍大量的国家财富，或是加害于最软弱的阶层。由于天民党政府接受共产党的支持仅仅以不损害它的领地为限度，维护工人的工资收入就只能以中间阶层为代价。贝林格认为，这样更好，因为中间阶层按定义是非生产阶层，从理论上来说是注定要无产阶级化的。所有那些抛弃天民党以寻求职业和进行反浪费斗争的人现在发现，他们将承受新政策的最沉重负担。

其后果立即显示出来：一部分新型工人阶级和失望的中间阶层离开了共产党。1978年的选举对贝林格来说是第一次巨大的选举失败。意共很快做出了正式解释：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在执行中出了错误。这是最惬意的解释。自伽利略以后人们都知道，只有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思想才是正确的。坦率地说，历史性妥协的实践是不成功的。过错在于基层不理解吗？然而，一条只有用基层的腿才能走路、而基层又不理解的政治路线，怎么可能是正确的，即政治上行得通的呢？正确的但不被人们理解的思想对于死后注定要被重新估价的哲学家来说是可行的，但对党的领袖是行不通的，因为他的政策应该立即取得具体成果。

选举失利后，对贝林格的批评更加厉害了。有人指责他无所作为；有人指责他重犯1947年陶里亚蒂犯过的错误：同一些文化人士闹僵后他制止了群众运动，毫无希望地等待德·加斯佩里给他打电话叫他进政府。当整个新闻宣传都指向利昂纳总统，指责他腐化受贿时，正是《团结报》为他辩护，甚至写到在这些攻击后面隐藏着反共的阴谋活动。这真是闻所未闻。贝林格已经到了不仅做天民党的挡箭牌，甚至做利昂纳这样的人的挡箭牌的地步。维护国家还说得过去，因为莫罗为它付出了生命，但现在进而维护一个人们议论纷纷的人物，尽管他是国家元首。党的领导机构进行激烈讨论时，贝林格面对的就是这种形势。领导机构终于做出要求利昂纳下台的决定。但没有一个人向基层解释，为什么几天以前谁要求利昂纳下台就被说成是反共分子。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天民党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利昂纳。如果是牺牲它的一块领地，它不会后退一步。现在是牺牲一个已经孤立了的人，这毫无问题。利昂纳的迅速辞职，贝林格同扎卡尼尼的频繁接触，以及他们对整个局势的控制使克拉克西大为恼火，他感到自己处于次要地位，不能参与做出重大决定，相反，贝林格却可以利用这种形势促进历史性妥协。现已证明，可以迫使天民党发生变化，而且天民党已经发生了变化，它已被迫让由自己党的人担任的共和国总统下台。需要同天民党继续合作，这样一定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共产党领导机构投票反对利昂纳，听起来是对历史性妥协的批评，贝林格却把它变为历史性妥协的一项成就。

在进行意识形态争论时，克拉克西的愤怒情绪立刻表现出来。社会党这位新书记写道：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马克思和列宁的道路，还有蒲鲁东的另一种社会主义，现在是放弃列宁主义的时候了。在意识形态方面，克拉克西的文章是可怜的，题目陈旧，论据陈腐。然而在政治上这一行动对贝林格却是非常危险的。克拉克西实际上是宣告独立，这可能成为他的党重整旗鼓的主要道路。他声明要搞左翼取代，这就使贝林格在基层面前感到为难，因为基层已不愿支持同天民党人结成联盟。同时克拉克西向世俗左翼发出了信息：如果你们需要的是工党政策，并为此而支持贝林格的话，那好，我愿意推行这种政策。一个列宁主义的党不能保证实行这种政策。

克拉克西有本事，甚至不择手段激怒贝林格。他的性格同贝林格恰好相反：喜于外露，傲慢自负，善于雄辩，过于冷酷。对贝林格来说他是魔鬼的化身，令人难以容忍。然而，克拉克西正在关注被共产党人忽视的领域：青年，极端主义者，被社会抛弃的人和中间阶层，并正设法得到他们的赞同。克拉克西正在赋予社会党以新的生命力，这个党被贝林格的“小圈子”看成是社会渣滓，即可恶的工人贵族的残余的代表。德·加斯佩里曾经抱怨陶里亚蒂在罗马在朝，在公众场合在野。克拉克西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在罗马他同天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一起属于议会多数，但在报纸上和公众场合他反对天民党—共产党轴心，以争取民众的支持。他还着手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知识分子现在正在衡量天民党同共产

党的协议对文化界的影响。“克拉克西的政治行动并不是新东西，”乔治·博卡写道，“或许是无可挽回的旧的平衡的危机才为社会党，或是工党，或是社会民主党打开了权力之路。当我们看到克拉克西的汽车通过时，我们并没有重复黑格尔评价拿破仑的话：我看到世界灵魂骑马而过。我们只是说：这个人之所以动是因为他周围一切都在动。就连他也不知道我们的结局是什么；但他不考虑这个问题，他只是让令人恐怖的波涛把自己推向浪头。”

这就是给外界留下的印象：共产党停滞不前，而克拉克西却很活跃。共产党一位年轻领导人对《共和国报》记者说：“多年来在黑店街占上风的想法是，中左形式失灵后，社会党开始走向瓦解。现在已是一股微不足道的力量，只能依附于意共。我认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出现克拉克西现象时，我们开始没有重视，后来则怒不可遏。”

克拉克西扰乱了未来的前景，一种被佛朗哥·罗达诺生动描述的田园诗般的前景。罗达诺被称之为意大利的苏斯洛夫，他是贝林格的顾问，历史性妥协的发明者，他期望天民党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团结在一起，手拉着手，逐步地摧毁资本主义，并在节衣缩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由天民党人、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形成的唯一政治组织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仔细分析罗达诺这位天主教共产党人，不难看出，他这个政治组织既有点像统一党，也有点像万能的宗教。然而，就连圣萨伏那洛拉^①也未能使佛罗伦萨人长期忍受严峻的生活困苦，而最终被处以火刑。

民众的不满情绪，以及贝林格看到克拉克西变为主角并巧妙地利用人们的这种情绪时心理上受到的打击，使这位共产党书记得出结论，必须摆脱无所事事的局面。贝林格好似一个反刍动物，他先用一个胃消化某种思想，然后再送入另一个胃进行第二次消化，需用几个月时间才作出决定。1979年初他召开党的领导机构会议，建议向天民党发出最后通牒：除非天民党接受共产党直接进政府，否则共产党将转为反对派。显然，前面的假设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是想要转为反对派。这个决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纳波利塔诺、布法利尼、佩尔纳表示反对，他们看到这有使党的近几年的全部工作毁于一旦的危险，还担心党象在陶里亚蒂那段最困难时期那样锁步不前。贝林格向他们保证，这不是放弃历史性妥协，而是要进政府，真正实现历史性妥协。党不能继续忍受天民党的凌辱，永远在前厅里等待；而应要么进，要么出。党的左翼英格拉奥支持贝林格，最后决定提出最后通牒。这是民族团结政府的结束。正象报纸描述的那样，“全党的反应是松了一口气”。

① 萨伏那洛拉(1452—1498)，佛罗伦萨宗教改革家，曾领导该市平民反对富人统治的起义，后遭教皇和美第奇家族的迫害以“异端”罪被杀害。

严峻政策的神话

撤回对政府的支持后，贝林格并没有放弃历史性妥协战略，特别是没有放弃对严峻政策的赞美。他深信这是一把能打开进入政府之门的钥匙。他认为，向意大利领导阶级担保建立基于严峻政策，即基于控制消费，从而逐步减少劳动收入的社会联盟，是对那些将同意共产党进政府的人的最有诱惑力的诱饵。

正象贝林格常说的那样，严峻政策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应该伴之以可以逐步改变意大利社会，直到使它“脱离资本主义”的相应措施。这是佛朗哥·罗达诺的思想，贝林格早就接受了。罗达诺曾是陶里亚蒂的顾问，现在是贝林格的顾问，他使贝林格走上了历史性妥协的道路。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主张过最清贫的生活。他的思想同贝林格的僧侣式气质和对生活的严肃观念完全吻合。贝林格把严峻生活看成是一种到处是公共汽车的人间天堂，每一个公民都乐于放弃个人主义地有害地使用自己的汽车。他对集体消费的热忱就象天主教徒对上帝的热忱一样。这种神妙的看法象魔鬼一样出现

在他所有的讲话中。他甚至做过计算，仅在罗马，如果大家
都乘公共汽车，每年可以节省价值六千五百亿里拉的汽油。如
果把所有其他有关开支都计算在内，节省额将达到一万亿里
拉。贝林格说，这还不包括放弃使用私人汽车后可以消除
“疯狂的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数以百万计的人为此每天
得花费二到三小时”。一位中世纪讲道神甫，一位苦行修士，也
不可能讲出比这种汽车地狱的看法更奥妙的话来，至于奢侈，
他要求公众加以谴责。这无异于为禁欲主义招魂，而禁欲主
义从梭伦^①时代到中世纪一直是行不通的。甚至有人自问，
自己是参加了共产党还是参加了共产党人的圣修会。还有些
人的讽刺更尖刻，他们用《白花歌》^②的曲子唱《红旗歌》^③的
歌词，或者用《红旗歌》的曲子唱《白花歌》的歌词。

退出支持政府的议会多数，全党都松了一口气，在这种
形势下贝林格可以心平气和地准备三个月后召开的新的党代
会。他还处于渡船上，还未达到政府的彼岸，但他也不愿意
使党重新回到毫无出路的反对派道路上。涉及到党的特性的
意识形态危机是深刻的，“或是进政府或是做反对派”的口号
不足以拯救这场危机。贝林格怪罪天民党，因为它没有履行
承担的义务，共产党才退出了支持政府的议会多数。他重申
历史性妥协，并对严峻政策作了一些自我批评。他说这项政
策被理解错了。这是一项具有世界意义的方案，关系到各国

① 梭伦(约公元前638—前559)古雅典政治改革家和诗人。

② 《白花歌》为意大利天民党党歌。

③ 《红旗歌》为意大利共产党党歌。

之间重新分配原料。但这仍是二十年前赫鲁晓夫向苏联人民许诺的，到1981年将达到土豆加牛肉的天堂在意大利的翻版。贝林格的报告是平淡的，重复了过去的观点。党的代表大会就是在这个基调上进行的。

人们越来越不喜欢听的泰拉奇尼的声音是这次代表大会上唯一充满生气、热情激昂的声音。这位老领导人立即谈到了问题的要害：在代表大会的提纲中缺少最重要的一点，即意大利社会发生的变化。这是党的文化修养的薄弱环节，如果不研究社会变化，如何使思想适应这种变化呢？泰拉奇尼指出，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意大利农民从八百多万减少到不足三百万。他说，在农民大量减少的时候，我们仍停留在工农联盟的思想。相反，中间阶层增加到一千万人。党注意到这点了吗？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具体行动上是否注意到了这点？许许多多同志，包括贝林格本人也抱怨可恶的天民党人违反誓约，欺骗了他们，泰拉奇尼严厉批评他们说：“我认为，奢谈失望、欺骗和未有履行诺言只能表明自己多么天真和不成熟。”列宁当年就这样讲过，过分相信敌人的人并不是一个天真的人，而是一个犯了政治错误的人。

代表大会之后，党仍处于紧急的形势之中。距离提前大选只剩下三个月时间。为了避免提前大选，佩尔蒂尼总统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授命克拉克西组织新政府。如果组阁成功，这将是意大利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党人担任政府首脑。给克拉克西以活动余地，这是贝林格最不乐意干的事情。法共领导人马歇因做了类似的事情曾受到意大利共产党人的许多

批评，后来撤回了对密特朗的支持。但贝林格也是这样做的。

选举结果对共产党人来说是非常失望的。共产党实际上是这次大选中唯一失去选票的党。他们减少了一百五十万张选票。不仅中间阶层对共产党的政策感到失望，甚至许多工人也不再把票投给这个坚持严峻政策的党。共产党回到反对派立场并没有起作用，因为安德烈奥蒂政府那些年的伤口还在流血。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没有展开讨论，但在中央委员会内的争论将非常激烈。这一点贝林格很清楚，因此，他推迟召开中央委员会，他希望随着时间的拖延，水面会平静下来。现在党内情绪激昂，所有人都会说：“这我早就说过”，而实际上很少有人说过。贝林格的顾问弗朗哥·罗达诺在《国家晚报》上发表文章，把自己打扮成不被理解的人。他说，我提出的想法是正确的，过错是那些贯彻这些想法的人没有严格遵循“使用说明”。总之，我当时不在场。如果说我在场，那我也是打瞌睡了。

罗达诺开始解释说，共产党人现已明白，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方式不是发动革命或制造混乱局势，而是在医治经济生活的同时改变它，即是说，不能先医治经济，然后再变革经济，这两项工作必须同时进行。这意味着推行严峻政策（为此付出了高昂的选举代价）的同时，还必须实行经济变革，搞经济计划和集体服务事业，这有助于变革社会。仅推行严峻措施不实行经济变革就是保守政策。1976年以来，“一些同志”实际上就是这样干的。但罗达诺没有说“一些同

志”指的是谁。1976年以来党不是一直由贝林格领导吗？他本人在这些年里不也一直是贝林格的“小圈子”的成员吗？

一些同志开始公开谈论取代贝林格的可能性。这种情况尚属首次发生。贝林格那句著名的话就是这时候讲的：“我没有为担任书记做过任何事情，也不想为继续留任做任何事情。”佛朗哥·罗达诺也站出来说，选举的创伤是件好事，因为现在“显然更易于贝林格继续加强反对任何机会主义概念的斗争”。

中央委员会会议终于召开了，贝林格一开始便承认推迟讨论是为了使大家的情绪平静下来。他承认有些同志批评1976年以来的所有政策，即历史性妥协政策。但还有另一些同志批评退出议会多数的作法。这是党的领导人进行调节时所采取的典型的陶里亚蒂式立场。但贝林格承认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不撤回对政府的支持，党有垮台的危险。他说：“必须维护党的自主、特性、作用和未来，使党免于崩溃和变质的危险。”这话说得很重，他公开承认党内存在着比预料大得多的麻烦，甚至使人担心党会崩溃。另外，他还承认，在支持政府时期通过的所有法律几乎全是错误的或不好的，总之是不得人心的。这已经非同小可了。但贝林格说，对激起强烈愤慨的布卡洛西法案，我们是弃权的。贝林格承认，布卡洛西关于可建筑地皮法案，对于想要建造住房的众多劳动者、移民和农民来说，是惩罚性的打击。但是，仅说共产党人弃权，这不是伪善吗？不正是由于他们弃权这项法案才能通过吗？难道基层应该接受他们的党变为永久弃

权党吗？

不想一一谈论贝林格列举的其他错误：对众多的养老金领取者的惩罚性法律，合理房租法，青年就业法，民房法等。这些法律使数以百万计的意大利人受到了惩罚并继续受惩罚。现在承认“我们犯了错误地估计形势、有时是脱离实际的错误”是非常轻松的。正是贝林格的“小圈子”一直脱离实际，如果这个小圈子手中握有实权，他们面前就会出现不是一个，而是千万个意大利的瓦文萨。

最后，他承认了最为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能把民主团结政策归为和降低为组成政府的某种方法或形式。把两者等同起来是对历史性妥协的歪曲和贬低，然而这是对历史性妥协的一种典型的解释。这种解释造成了困惑不安，大概这就是在党内也出现有损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的根源”。他终于明白了这一点。但是，是谁封闭了所有出路？是谁拒绝支持社会党人当总理？又是谁主张“或是同天民党人在一起或是什么也不干”？

看来贝林格也把错误推到别人身上，他再一次走上罗达诺描绘的道路：路线是正确的，但党贯彻得不好，我们队伍中的机会主义敌人毁谤和陷害了我们。但他也不得不含糊其词地承认一切都应该重新研究。他说：“我们应该明确地回答，同今天这种状况的天民党是不可能达成政治协议的，近三年来尝试的道路也是行不通的。”任何人都没有发现，这是贝林格宣布转折的开始。一年半以后，在佩尔蒂尼就地震问题发表讲话后，他完成了这种转折。迄今宣布的各种形式

都公开声明过时了：“我们任何人都不认为，我们在过去不同时期提出的路线和政策是神圣不可触犯的。”就这样，贝林格本人否认了近几年的路线，他甚至承认历史性妥协变成了两党协议，变为一种制度。这位党的书记向后退了很大一步。

党中央委员会对这位风尘仆仆的书记表现出异常的爱戴，尽管象《宣言》报写的那样，“贝林格以批评别人为自己辩护”。一向惟命是听的人开始发言了。特里韦利甚至认为立法活动是好的，佩尔纳要求随时准备重新回到有天民党参加的议会多数。但许多中央委员听到他们的发言哄堂大笑。气候变了。英格拉奥强调，党未能实现直接管理国家的重要目标，这是顺理成章的，预料之中的。他似乎是要对贝林格说：你抱有太多的幻想，现在碰壁了。难道现在不该清醒吗？难道现在不该考虑同社会党建立最紧密的关系吗？一个时期以来我一直这样主张，反对把对克拉克西个人的厌恶变为一条政治路线。

纳波利塔诺对贝林格的领导方法本身提出异议：书记处没有明确一致的意见，领导层内部存在政治分歧，现在是把分歧公布于全党并进行公开坦率的讨论的时候了。负有盛名的知识分子卢乔·隆巴尔多·拉迪切登上讲台的场面是别有特色的。他转向党的书记，叫着他的名字，象对一个小学生似的说：“亲爱的恩里科，我曾经热情地支持你的观点，但这一次我完全不同意你的报告。”他走下讲台的时候拍了一下贝林格的肩膀，似乎是安慰他说：近来你学习少了，但你是

一个能干的青年，你还来得及。米兰市委书记泰尔齐表达了大家的心情：我们给人们留下了要建立一种制度的印象，而模糊了我们党作为取代力量的形象。泰尔齐也愿意同社会党人达成协议，正象他在米兰做的那样。从此，贝林格的追随者在党内常说，他“将是一个很好的领导人，如果他对社会党人没有那些固定的看法的话。”一年半以后，当贝林格进行民主取代转折的时候，泰尔齐颇带讽刺意味地评论说：“但这是米兰式社会主义道路。”几个月以后，泰尔齐被免去了米兰市委书记的职务。

菲亚特的大门口

乔治·阿门多拉虽然已疾病缠身，患上了后来使他丧生的病，但1979年末他在《再生》杂志上发表文章对贝林格、罗达诺和拉马进行了最后一次攻击。他并没有指名，但文章针对谁是显而易见的。阿门多拉说，严峻政策是正确的，但我们不是常见的伪君子，我们不能对人们说要通过严峻政策搞社会主义。国家处于严重经济混乱之中，只要这种局面继续存在，就要求人们做出牺牲。但不要把严峻政策变为一种政治战略，变为左翼文化的中心题目，好似从地平线上升起的光芒四射的太阳一样。此外，我们应该注意；特别要留神工厂中的暴力活动，这类活动有助于恐怖主义；要关心车间主任，他们对某些工会领导人的恫吓和虐待已经忍无可忍；在下令罢工之前，应该让劳动群众投票表决，以便听听他们是否同意；对劳动者的活动原则上不要总说不行；我们必须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以结束国家企业的浪费现象，如果必要就关闭那些无法挽救的企业。

贝林格本人在阿德里亚诺剧院讲话时对阿门多拉作出了

回答：“应该反驳阿门多拉的基本理由是，他在向劳动者和青年发出令人伤心的呼吁、要求他们尽义务和努力工作时，没有提出值得为之做出努力甚至牺牲的目的和目标。”拉马在《团结报》上以同样的措辞回答了阿门多拉：不能把拯救行动同改革行动分隔开来。这是罗达诺主义的最后表现形式：奢望加抽象。但他们确实认为在安德烈奥蒂、比萨利亚和加瓦的帮助下，这样做可以立即给国家机体注入社会主义注射液吗？然而，安德烈奥蒂可以接受的注射液最多是医治他的头疼病的。

一年以后，阿门多拉已经去世，这时发生了菲亚特事件：贝林格在这家工厂的大门口声明，如果工人决定占领工厂他愿意支持他们。“在菲亚特发生的一切关系到整个工人运动，并无情地表明所犯的错误，”阿门多拉一年前说的话大家仍记忆犹新。巴叶塔提醒贝林格要象陶里亚蒂一样谨慎。朱利亚诺·阿马托从贝林格这次行动中看到了他所经历的创伤的后果：“对恩里科·贝林格来说，一切是从十万机械工人在罗马示威游行，抗议民族团结政府开始的。是福拉蒂尼恰当地描绘了共产党书记受到的震动。在他的笔下，贝林格穿着华丽的室内便袍，手里拿着一杯茶呆在屋里，而窗外游行队伍正在通过。贝林格当时确实感到关在楼里脱离了群众，应该走出楼去。然而，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沉湎于过去，看不到工人阶级的现状。他回到古老的神话之中”。瓦伦蒂诺·帕拉托说：“亲爱的贝林格，这样不行，不能象对待无头脑的士兵一样对待劳动者，先让他们在你的严峻政策上排好队形，然

后又让他们改变阵地，这对他们並沒有好处，而是对你有好处。”

“一落千丈，”路易吉·平托尔评论说，“从对选举的巨大进展的赞美，到对近期的失败的嘲讽一落千丈。贝林格象圣塞巴斯蒂亚诺^①一样，被敌人的和朋友的，特别是朋友的无数支箭无情地射中。”请注意“特别是朋友的”。事实上，射向贝林格的箭主要来自黑店街的廊道里，那里有许多人面带痛心的表情，假装难过地摇着头。当贝林格发表电视讲话时，詹尼·阿涅利也摇了摇头。他说：“我担心在都灵发生的事情加强了那些不大相信共产党可能共存于一个民主社会的人的意见。”阿涅利当然知道他说这话的意思。

当都灵发生著名的四万人游行时，大家都想起阿门多拉的文章，而且更加记忆犹新。本来应该是工厂各车间头头的会议，但却变成了群众集会。正是阿门多拉说过的在工厂受到虐待忍无可忍的车间主任们，是贝林格期待消除的工人贵族，是生产领域的中间阶层，民族团结政府的惩罚政策和工会反对多干活、主张压低工资的路线都是疯狂地针对他们的。他们是平均主义的牺牲品，受严峻政策打击最为严重。正象所预见的那样，干活的人不得不承担牺牲，领工资阶层内部进行了财富调整，在各劳动阶层之间制造了深刻裂痕。联盟政策到了土崩瓦解的时刻。今天当共产党人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时候，不再做为众所周知的最严肃、最有效率的人受到

^① 公元三世纪殉道者，文艺复兴时期被描绘成被许多支箭射中的少年。

欢迎。人们的评论迥异：他们“同其他人一样”，他们的“党同其他党一样”。拉马在都灵时工人吹口哨哄他。

大家都在揣摩贝林格在菲亚特大门口采取的行动的动机。显然，他的问题是重新争取基层。他在这时对克拉克西进行了最猛烈的谴责，这不是出于任性，也不仅是出于个人的厌恶。贝林格认为，社会党现已成为同工人运动格格不入的一个党。显然，他力图使基层回到十年前他登上党的最高职务时的状况。党内存在着信任危机，他感到走上了错误道路，他想要重头开始。贝林格没有说，但从佛朗哥·罗达诺这时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危机有多么深刻。他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文化意识：第一种是好的，渴望实现有机的共同体社会，在那种社会里大家对幸福的看法是一致的；第二种是坏的，渴望建立世俗的、多元化的、处于民主对抗之中的社会。遗憾的是第二种文化意识正在占据上风。罗达诺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再也不知道是否存在贝林格多次谈过的第三条道路，如果存在，他不知道是否伸手可得。他向党提出的建议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符合天主教教义：放弃和拒绝；过隐居生活；等待神的恩赐。新的前途只能来自“日益迫近的、令人痛苦和振奋人心的革命。”

乔治·纳波利塔诺早就嗅到了正在形成的气氛。他大声疾呼地警告说：“我们清楚知道，有人希望我们放弃我们的战略，但我们相信这是空想。如果这种愿望在我们队伍里变得强烈起来，就要发生一场公开的政治斗争。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选择看起来更容易走的蛊惑人心的道路，更不会选择

宗派集团的道路。”

在对外关门的同时，内部生活也紧张起来。共产党历史学家萨尔瓦托雷·塞基成为人们攻击的目标，他在选举失败后曾指责贝林格是个专制君主。塞基说：“决定党的生活的所有最重要决定都是未经同中央委员会协商而采取的。”一个名符其实的“雅各宾派执政团”决定一切。“实际上，书记处拥有庞大的帝国君主政体的各种权力和豁免权。”他还说：“从1975年以来，党的领导集团预见工人阶级的巨大变化、群众文化要求的巨大变化的能力，以及自上而下提出重大政治倡议的能力都低于必要的水平。”佛朗哥·罗达诺觉得自己受到攻击就向塞基冲去。他并不想把他开除出党，而是要求他不要重新登记。塞基拒不同意。他说，“在党内可以以不同于贝林格的方式行事，反对他并不是亵渎神物，而是党章给予我的义务。只有把党看成是教会，才不可避免地要在被动的仪式面前屈膝下拜。不是佛朗哥·罗达诺，而是党纲和党章允许我作为一个不悔悟的世俗人留在意共内。”

气氛是阴沉压抑的。贝林格周围的执政团看起来陷入了历史性妥协失败的困境，但仍拒绝接受其他思想。在菲亚特工人罢工那些日子，英格拉奥甚至不得不公开抱怨书记处没有同党的其他机关协商和对话。陶里亚蒂也未到如此程度。内部分歧，各部门头头在都灵游行，前途未卜，这一切在党内滋长了痛苦的失败情绪。

内部纠葛已经如此严重，以致于当贝林格要求共产党议员在议会谴责科西加时，一些共产党众议员和参议员没有按

照贝林格的指示投票。在共产党议员中还从未出现过“自由射手”。菲亚特事件以后，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发言者一致要求贝林格停止同克拉克西的激烈对抗。最紧迫的问题是同社会党恢复适宜的关系。但这时，有一个情节非常有意思。在几天前的一次会议上，英格拉奥说工人运动的一个历史时代结束了，左翼党搞政治的方法本身需要更新。卢恰诺·巴尔卡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批评“那些开辟和结束历史阶段并对民族团结政策表示怀疑的同志。”英格拉奥走上讲台严厉地回答说：“我听到了巴尔卡同志对一些同志的立场的批评，这些同志对民族团结的未来前途提出了怀疑，并认为一些时代已经结束。由于他热切要求态度明朗，我觉得我必须说，我的想法同他的不一样。我这样说只是为了略加证明，在这些问题上还应使一些同志信服。我就是其中之一。”

大家都声明不同意英格拉奥的意见，重申信任民族团结政策。一个多月以后，当贝林格宣布民族团结政策结束时，大家又声明同意结束这一政策。

政治转折

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如何向后转，如何承认党在历史性妥协的道路上走入了死胡同，但又不公开说出这点来。机会很快来了，这就是地震。山德罗·佩尔蒂尼向意大利公民发表电视讲话时，恩里科·贝林格正在电视机前。佩尔蒂尼说：“意大利男女公民们，我昨天晚上刚从可怕的地震摧毁的灾区回来。我目睹了永生难忘的情景：整座整座村庄被夷为平地，幸存者陷于绝望。地震后四十八小时还没有给这些村庄运去任何必需救援物资。我走近灾区居民，他们向我表示了他们的绝望和痛苦，但也表示了他们的愤怒。”

佩尔蒂尼还提出了一些问题：为另一次地震，贝利切地震的拨款用到那里去了？谁偷走了这笔钱？盗贼关进监狱没有？

恩里科·贝林格立即意识到这篇讲话非常重要。这是国家元首以全国舆论代表的身份发表的讲话，但也是以反对派领袖的身份发表的讲话。

贝林格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走近电话机给佩尔蒂尼通了电

话。他说他完全同意他说的话，完全理解他对政府行动迟缓的愤怒，他还说他讲话的语调使他深为感动。接着他决定，在地震和佩尔蒂尼讲话激起民愤的情况下，实现他正在考虑的政治转折的时刻来到了。他动员黑店街所有办公室的人，必须找到党的领导机构的每个成员，并让他们在第二天下午来到罗马。电话通往意大利各地，预订了机票，甚至派出了总部的汽车去接那些困难最大的领导人，以使他们按时到罗马。

第二天晚上，即11月27日晚上，埃马努埃莱·罗科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宣布：“历史性妥协结束了。意共领导机构今天下午举行会议，建议成立一个没有天民党参加的政府，一个由各党或党外有能力和诚实的人组成的民主取代政府。”成千上万的积极分子听到历史性妥协结束的消息好似获得了解放。他们急忙吃完晚饭，立即冲向各支部办公室，想知道消息是否确实，可恶的历史性妥协是否真的结束了。一个时期以来，由于支部总是不停地讨论民族团结问题，更糟糕的是讨论严峻政策，这些积极分子中有许多人已停止参加支部活动。

许多支部象过节一样挂起了红旗。办公室里充满了好长时间没露面的同志。只有支部负责人处境尴尬，他们直到昨天还忙于解释必须迫使天民党同意共产党进政府；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历史性妥协。

贝林格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早就知道，党内形成了不同意历史性妥协路线的“沉默多数”，他们疏远组织，甚至不参加

支部生活，也不能理解他们的领导人使用的越来越含糊的、反复推敲的、模棱两可的语言。他们不理解历史性妥协、也不同意历史性妥协。这种现象在党内以前从未出现过。

贝林格还知道基层主要归罪于他。八年前，他们满腔热忱地欢迎他担任书记，现在失望了。这也是必须实行转折的原因之一，以恢复自己在党的基层面前的形象。

但不久又泼来了冷水：基层的情绪高昂，但党的高级领导却受到这个行动的伤害。每个领导人都自作解释，总的倾向是认为这不是转折，仍是从前的政策，只是做了修改。贝林格本人在萨莱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是否是转折的提问的回答含糊其词，他否认这是同历史性妥协战略的决裂。当佛朗哥·罗达诺发表文章说转折有助于重振历史性妥协时，人们的思想混乱到了极点。罗达诺说，共产党人只建议进天民党一党政府，期待着天民党决定超度出来。至于社会党人，最好离他们远一些，以免“染上目前的腐败和投机毛病”。这种说法简直无异于胡言乱语。基层比从前更加涣散了，他们被这些迂阔之论弄得失去信心和不知所措。

在贝林格最后决定承认这是转折，甚至是转弯之前，有一个月时间处于犹豫、失望和反复思考之中。

危机的根源

我们正在经历的经济危机是典型的萧条，国际生产秩序全面调整的每个阶段都具有这种特征。1873到1895年间的第一个人次大萧条导致了迅猛的机械化、泰罗制^①和铁路大规模发展，埃菲尔铁塔是这个阶段的象征。1929到1945年之间的第二次大萧条后出现了各种经济奇迹，第二次工业革命和新资本主义。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第三次萧条，它恰好始于第一次萧条一百年之后，即1973年。如果这次萧条持续的时间同第一次一样长，那么，要到本世纪末才能结束。但这次萧条将导致第三次工业革命，即自动化革命。日本已经开始为这场革命做准备。他们预见未来世界在消费方面电子计算机将取代汽车。美国和日本是技术革新这个领域的两个最先进国家。意大利则是最落后的国家。我们的工业中仍然吃得开的部门只有那些要求新技术较少的部门，即服装和食品工业。多年以来，包括搞民族团结那几年，意大利国家工业挥霍了

^① 美国工程师泰罗(1856—1915)首创的一种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和生产管理制度。

大量国家财富以补贴天民党的领地和满足最强有力的集团的要求。这些财富根本没有用来革新我国的工业技术，使它拥有面对未来挑战的适当手段。我们的科研费是微不足道的。

各工会对意大利工业的技术落后也负有责任，它们在左翼文化的影响下多年来一直抵制技术进步。企业的过分严厉的规章制度和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的捍卫就业的斗争阻碍或束缚了革新，我们似乎处于把维护现状作为理想目标的社会之中。这同阿门多拉期待的恰好相反，他最终同拉马冲突起来。

维护过去意味着逆历史潮流而动。维护旧的生产方式和老式工人就是使意大利脱离最先进工业国家的行列。这如同在工业革命蓬勃发展时维护老式农民一样。在意大利，农民已降为三百万，自动化必将给工人队伍带来同样的变化。其他阶层的力量在增长，特别是在我们眼前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即群众知识化，出现了一种近似于技术人员的新式工人，自动化使工人越来越知识化。

对于这些新事物，贝林格象陶里亚蒂一样，这些年来没有引导全党去认识。英格拉奥敦促他的同志们注意社会的变化，正象他说的那样，否则一切都变为政治游戏，但他的话没人听。正如隆哥抱怨的那样，一切都变为由于取得安德烈奥蒂和拉马尔法的赞同而得意洋洋。英格拉奥的话是对的，他说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已经开始，他要求对党的两位不可触犯的伟人陶里亚蒂和葛兰西重新展开讨论，因为在他们身上，特别是在陶里亚蒂身上，也有一些东西同落后的社会观念有联系。英格拉奥同意南尼的意见，“应该从大处着眼。”

相反，这些年来党一直从小处着眼。被描绘成重大新闻和重大转折的事物，实际上只不过是在一潭死水中搅起的波浪，待波浪平息后，仍变为一潭死水。

贝林格多年来一直处于陶里亚蒂的保护之下，由于对陶里亚蒂的崇敬，他也接受了他的不足之处——陶里亚蒂主义。陶里亚蒂也选择了意大利社会主义道路，他说过不要革命，但代之以他从未公开承认的东西：等待世界平衡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等待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发展缩紧对西方世界的包围圈并迫使它投降。还一直等待着资本主义经济崩溃，资本主义神奇的毁灭。贝林格丝毫没有偏离陶里亚蒂道路，最后也象陶里亚蒂一样碰了壁。

彼得罗·英格拉奥力图比陶里亚蒂看得更远一点。阿门多拉也是这样做的。尽管他们出于看来是相反的立场，但他们两人都提出了新的同样正确的要求，有时甚至互换了各自的地位和作用。虽然进行了二十年的剧烈斗争，党从未能够使阿门多拉和英格拉奥不再提出他们的要求，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些要求深深地扎根于现实之中，扎根于在社会上活动着的各种有生力量之中。但贝林格未能起到自己的作用，即综合而不是调合这两种倾向。

给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以更多的活动余地并进行更坦率的辩论的问题，在转折、更确切说是大转弯之后立即表面化了，就民主集中制这个永恒的题目的讨论也激烈起来，这些绝不是偶然的。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这样一种深刻信念的产物：工人阶级

本身不是革命阶级，它自己不能超越简单的工资要求。工人阶级要变为革命阶级，需要外部的帮助，即革命的真正传播者知识分子的帮助。他们应该把工人组织起来，并指导他们夺取国家(政权)。一个基于这种信念的党，一个由负责向群众传授真理并率领群众的最高使者组成的党，不可能不具有教会的特点，不可能不拥有自己的教条和专制体制。民主集中制是这种专制体制的组织形式。

葛兰西在狱中就知识分子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的全部研究以及他关于党是现代君主的理论，是列宁这种提法的产物。列宁以当时唯一可能的方式提出了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关系问题，因为当时知识分子的人数非常有限。然而，今天我们面临一种新现象，而且随着我们向自动化世界的前进，这种新现象还会越来越明显：知识分子的人数越来越多，工人阶级趋向知识化。他们的利益越来越紧密地趋于一致。以少数知识分子把真理传给工人为前题的民主集中制变得越来越不适宜了。象路德时期的信徒一样，他们宁愿自己阅读译成白话的圣经，而不愿听神职人员的讲解。

当英格拉奥认为出现了“闻所未闻的问题”时，他指的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危机，特别是政党本身的危机。共产党不足之处正是对未来社会缺乏全面研究。因此英格拉奥认为，如果贝林格的转折只停留在事实本身，如果不伴随以对未来社会的广泛的令人陶醉的研究，这次转折将变为一场政治游戏，而不是面向未来的、鼓舞人心和得到广泛支持的、并能团结各种新的社会力量的伟大计划。

新的社会力量

这时，贝林格的处境同珀涅罗珀^①颇为相似：白天继续织布，夜晚又把布很快拆掉。他打过两张王牌：历史性妥协和欧洲共产主义，但没有改变牌局。显然他赌注押的地方不对。认真地总结一下，党实际上仍然处于隆哥离任时的局面。

菲亚特事件后，英格拉奥首先提出警告：一个历史时期已经结束，今天工人阶级本身的作用值得讨论。贝林格本人以党的书记身份所作的第一篇报告曾重提工人阶级和工人贵族的阶级差别，这显然是一种陈旧的思想理论。为了争取失去的地盘应该怎么办？

背离正统理论的思想开始出现了。在《团结报》上可以读到从前会使教条卫士们毛骨悚然的文章，只要引几句话就足够了：“未来的技术可以急剧地改变整个工人阶级的人数及其社会作用……工人阶级将不再是基本生产力，因此也不再是

^① 希腊神话中英雄奥德修斯的忠实妻子，奥去特洛伊远征时，她一直守在宫里，拒绝了无数求爱者，终于等到丈夫归来。

最优秀的社会革命阶级……工人意识仍是革命的，但严格来说工人阶级不再是从前那样的工人阶级……”

都灵四万人游行表明，新的正在崛起的社会力量——技术员、部门头头和普通知识分子——神气十足地登上了社会舞台，使工人阶级和各工会陷入了困境。党突然意识到它的知识分子政策全错了，但这并没有使它理解新的社会力量涌现和站住脚的原因。

实际上，党并不是从现在起才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犯错误的。早在战后初期党就开始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当时陶里亚蒂同维托里尼之间就知识分子问题发生争论，导致了社会文艺刊物《工艺》的停刊。从那时起，没有对陶里亚蒂的错误政策进行过任何实质修改，贝林格本人也毫不偏离陶里亚蒂的足迹。多年来，党在维托里尼事件上一一直固执原来的立场，毫无改悔之意，现在它却象个未治愈的伤口一样又发作起来。

1981年12月中央委员会开会讨论知识分子问题。一个被抹杀和徒劳地掩盖多年的问题重新提了出来。贝林格本人在他的报告中承认：在我们周围存在着一个新世界，存在着重要的运动着的事物，但我们没有发觉。

贝林格说：“各种专门脑力劳动长期以来不断增加，但现在变得越来越广泛，增加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这种情况的出现，过去和现在都是由于生产结构改革、新的理论科学发现和日益更新的技术的不断发展。”

他说：“因此，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从事名符其实的

研究工作和非体力劳动或主要是非体力劳动(例如“先进的第三产业”。我没有引证其他重要部门,如学校和卫生部门)的人数越来越多。”

“这样就提出了各种涉及左翼力量、工人运动、特别是我们共产党人同这几个范畴的关系问题,这几个范畴昨天还不存在或微不足道,据我看,某些从前有效的概念对他们是不适用的”。贝林格继续说。

“不能把这几个新范畴同那些组成所谓中间阶层的社会集团等同起来。我们不要忘记,对中间阶层我们应该继续有专门的政策和倡议。这些新范畴的人是独立劳动者,但这不是说,在他们当中会出现与我们迥然不同的思想倾向和政治态度。”

贝林格还说:“这些新的技术人员和脑力劳动者,今天在生产过程(指的是广义的生产过程,即包括制约它的科研工作)中、在整个经济活动过程中具有近似于工人阶级迄今一直起着的作用。他们同工人阶级一起並像工人阶级一样可以建立变革社会斗争的牢固的社会基础,可以是我们党的基本核心,正象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党的基本核心一样。”

“因此,我们对待这些范畴的方法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基本点,在制定政策,确定结构和工作方法时必须认真注意这一点。不能认为这是我们在宣传上或选举上争取这些新的技术人员和脑力劳动者的或多或少的灵活行动;我们必须进行更深刻、更广泛和更持久的工作,以使社会生活中的这些

新主人公明确意识到他们在促进变革和国家领导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意识到我们完全理解他们的地位，正象当时对工人阶级一样”。

贝林格现在不再把工人贵族拒之门外，承认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拥有“当时”工人阶级拥有的地位。知识分子不再是中间阶层。他在措辞上也发生了变化，开始使用统一提法“独立劳动者”，力图把一切重新纳入轨道，把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归入工人阶级，属于同一范畴。

对新的社会现实的这种认识不可能到此为止，这意味着党的政策和组织将发生深刻变化。事实上，这次就知识分子问题讨论之后几个星期，中央委员会于1982年1月又召开了会议。波兰军管的突然行动给他们提供了机会。

贝林格认为，波兰事件证实了东欧国家的紊乱，这些国家对我们来说已没有什么经验可汲取了。现在已完全表明：

俄国1917年走过的道路对处于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今天的西方的革命是不适用的；

以苏联模式为基础建立的政权制度不能搬到西方来；

不仅如此，这种制度今天在一些东欧国家里已陷入危机。

“这就是我们提出社会主义斗争第三阶段的理由”。贝林格说。但当时他指出的第三条道路还没有固定形式和准确的定义，他只是说，这既不是社会民主党道路，也不是苏联道路。再多他也说不出来。

只有一个人起来表示反对，他就是阿尔曼多·科苏塔，

他曾对贝林格周围的“小神甫”做过严厉的批评，贝林格曾不同意他担任副书记。

科苏塔说：“这彻底违背我们的路线和整个方针政策”。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他说：“研究新事物常常从启蒙学派或社会学前题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前题出发”。

科苏塔说，这是一条取消路线，“这是以取消路线对近三十五年工人的光荣斗争进行的难以置信的、不可接受的历史性解释”。

在对东欧国家的评价上，科苏塔怒气冲冲。他说：“人们坚持认为，可以而且应该承认它们在世界革命进程中的历史功绩，而不是现在的作用。这不是违反，而只是发展了代表大会通过的论点，代表大会认为它们的作用是根本性的”。

他的指责是强硬而严厉的：抛弃马克思主义，执行取消主义的政治路线，背离代表大会确立并只有代表大会才能改变的路线。

辩论异常激烈。科苏塔在中央委员会里遭到孤立，但却得到曾使历史性妥协流产的党内“沉默反对派”的支持。贝林格利用多种机会反驳他，重申自己的立场：“只有为数极少的意大利工人渴望在苏联那样的国家里生活”。不仅如此，“十月革命的推动力现在已经枯竭”。

几天之后，从苏联传来了官方的强烈谴责。《真理报》攻击意大利共产党领导集团，指责它亵渎神灵，是“传染病的传播者”，并蔑视他们说：“意大利共产党人已站到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及和平的敌人的营垒一边”。一句话，对莫斯

科来说，贝林格已走上背叛道路。

科苏塔不失时机地再次发起攻击，重申对贝林格的谴责。党派他去佩鲁贾，在那里他发表了一篇非常强硬的发言。这一次他指责贝林格堕入了社会民主党立场。贝林格不是说只有为数极少的意大利工人希望在苏联生活吗？科苏塔公布了党做的内部调查的数字：在一百个工人党员中有三十七人声明愿意生活在苏联；在一百个职员党员中多达六十一个人做了同样的声明。这即是说：你们好好看看，我并不孤立。

如果说科苏塔从前的发言看起来可能是表示个人的不同意见的话，他在佩鲁贾的讲话却清楚表明，他不仅是以个人名义讲话的。这是公开的党内斗争，这一切使人感到斗争将是非常激烈的。这一次显然是向基层发出呼吁：请领导集团不要变成“多数派”；诚实地对待今后在党内出现的反对派。科苏塔说：“然后在代表大会上再算帐”。

在战后意大利共产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党内出现如此重大的分歧意见。《团结报》决定惩治科苏塔，没有发表他的讲话。但第二天所有其他报纸都刊登了他的讲话。由此发生了争论。为什么党的机关报扣发党的一位领导人的讲话？是谁做出的决定？在《团结报》上不断出现反对宗派主义的呼吁，党的领导集团担心这种局面进一步恶化。终于在几天以后，《团结报》被迫发表了科苏塔的讲话。与此同时，莫斯科对贝林格的党接连不断地进行严厉的谴责和猛烈的攻击。《共产党人》杂志（它发起过对铁托和毛泽东的攻击）发表社论

说：“贝林格要在意大利实现的那种共产主义，会使权力仍然掌握在垄断资本手里。关于十月革命的推动力已经枯竭和中心移到西欧的理论，充满欧洲共产主义的味道，更坏的是还有地方主义的味道，这正是陶里亚蒂当年已经警告过的两种危险”。社论最后说：“贝林格遵循的路线是放弃科学共产主义，同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的路线背道而驰，解除思想武装以把意大利党置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

前途未卜

攻击党的领导集团的不只是科苏塔一个人。历史性妥协的启迪者，直到昨天还是贝林格最信任的顾问弗朗哥·罗达诺也对党进行了同样的指责，说党正在滑向社会民主党立场。

罗达诺说，更多的独立于莫斯科是正确的，但为此而否认十月革命的推动作用却是错误的，这注定要促使工人运动分裂。

他说，第三阶段，或第三条道路“政治上是幼稚的，是明显违背历史的”。党的道路正在从实际的历史进程移向理智主义和折衷主义的办公室计划。他指出：“沿着类似的趋势和错误滑下去，唯一可能的终点是变为社会民主党”。

这时，贝林格也来到鲁比肯河畔^①。他得决定是否孤注一掷。显然，他有从理论上为工业发达国家的共产党指明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雄心壮志。问题是要看他的志向是否能落

^① 意北部流入亚得里亚海的小河，凯撒曾在那里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

实，是否能用党的腿走路，或是党的腿把他拖入死胡同，然后迫使他向后转，正象过去发生过那样。

贝林格已经承认，只有在工业发达国家出现社会主义那天才能看到真正的社会主义。但列宁也是这么说的：“德国工人掌握政权那天，他们将教我们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斯大林断然宣布社会主义已存在于苏联之后，上述内容就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记忆中删掉了。

贝林格走得更远。他说社会主义不是必不可少的。这不符合任何马克思主义概念。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出路。说社会主义不是必不可少的，就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可能不存在社会主义，这已属于异端学说。

对于指责他落入社会民主党立场，贝林格辩护说，社会民主党不使先进社会摆脱资本主义，而他的第三条道路正是以此为目的。但迄今他未能解释的是第三条道路的内容，至少是基本要素是什么。在这方面，共产党历史学家萨尔瓦托雷·塞基的批评是非常正确的，他说，如果贝林格正确，科苏塔也是正确的。塞基说：“党员不得不依赖党的文化的已有事实，就象依赖有条件反射一样。很难指责他们落后、愚昧或无知。反面的证据是，在苏联存在社会主义，它有具体内容，即产生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而第三条道路预示的社会主义迄今仅是一种想象，一种笼统的，因此不是积极的方案”。

为了避免空泛，这时贝林格不得不回答另一个问题(理

论探讨已如此深入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不可能不提出来)：“从历史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发展到什么水平摆脱资本主义的努力才是可行的，即才不是列宁完成的那种意志行动？”

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马克思说过任何社会在完全充分地发挥它包含的所有潜在生产能力之前是不会灭亡的。今天能说资本主义的所有潜力都发挥殆尽了吗？第三国际的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基于这些潜力已耗尽的论点上，热切地期待着资本主义的大崩溃。对于这个问题，贝林格从未给予明确的回答，也从未采取过明确的立场。然而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如果贝林格回答说我们处于资本主义极其成熟的阶段，这就不可避免要支持第三国际的理论分析，那末，他的为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而进行深刻的理论革新的全部愿望，他对新的社会力量的崛起的全部认识，都会象科苏塔和罗达诺责怪他的那样变成纯粹的智力游戏。

注意到新的社会力量的崛起，还意味着注意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动化和信息的发展造成的新的不同的发展条件正在成熟，意味着这个社会还没有耗尽其所有潜力。在这种情况下，给第三条道路下定义，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非常困难的。接受有关资本主义近些年来正表现出新的发展可能性的论点，就意味着承认马克思主义党的任务是支持这种发展直到它彻底成熟。显然，科苏塔和罗达诺就是根据这点才指责贝林格滑到社会民主党立场的，因为本世纪初社会民主党承担的任务正是如此。

贝林格难以说出第三条道路的更具体的内容，也难以对所有这些问题做出更具体的回答。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于信心十足地生活的党，他只能提出疑虑和问题。毫无疑问，这种方法可以改变宗教党的形象，但这又是他的及其党的政治理论危机的深刻根源。

封面
书名
目录
正文